

李大钊

诗文选集

1005/10  
1310

# 李大钊诗文选集



2079584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705844

## 前 言

### 一

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编选出版李大钊同志的诗文，让人不禁想到当十月革命的烈火从北方照耀到黑暗的旧中国时他的那种特别喜悦兴奋的心情：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他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是这样热烈地发出欢呼，同时预言今后人间的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

他骂那些不出一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居然也跟在那些发狂庆祝欧战胜利的“联合国士女”的后面“夸功耀武”，说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没有一点趣味”。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盗和强盗抢夺不正当的资产，胜利的不是他们双方的哪一方面，而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的武力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面前”，他说这个胜利结局，与其说是美国威尔逊等人的功绩，不如说是列宁、李卜克纳西等人的功绩，是马克思的功绩。他说：“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诺阿以后的一场最

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至于中国革命应该怎么办呢？他说：

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到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要知道，那时候苏联革命胜利的火光要照到“黑暗的中国”来是多么不容易；军阀政府封锁革命消息，造谣诽谤，把布尔什维克党叫做“过激派”，把共产主义诬蔑为“洪水猛兽”；而在渴望找到真理的先进的人们看来，遥望那革命的火焰却象在沉沉深夜中看见了一颗明星一样。这不是一颗普通的明星，而是一颗北斗星。他们的兴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力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随后又爆发了群众性的全国反帝爱国运动。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象毛主席的正确论断：“五四”运动是在俄国革命的号召之下，在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在列宁的号召之下发生的。李大钊同志以最大的热忱迎接了人类“新纪元”的曙光；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他又忠心耿耿地为了推进中国革命而工作。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随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熟识大钊同志的人，都说他为人谦虚和蔼，待人诚恳，生活俭朴，急公好义，党内的同志都乐意同他接近。他平素给人的印象是温柔敦厚、和蔼可亲的，相处日久，或者打开他的全部著作来看，你就会发现他同时又是一个刚毅不屈，有着高度的革命

原则性的人。他自己也说过：“一方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方面更要有自信独立的操守”。他是中国第一个欢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人，同时也是旧社会的最勇敢、最坚决的叛逆者。为了“把中国人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而且“联合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庶民，拿他们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个建设自由的乡土”，他从来也不怕有什么加害于自己的危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几个月内，他正告那些鬼鬼祟祟的“顽固派”，请他们采取光明磊落的态度，站出来用道理来辩论，不要靠“抱伟丈夫的大腿”，企图用强暴的势力压倒新派思想。他提醒他们：“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当年在俄罗斯的暴政下“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如今也不知那里去了！”不久，北洋军阀因为仇视新文化，乱加“过激派”的罪名，有些进步教授一时“人人自危”，胡适露出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狐狸尾巴，赶快出来表明态度，取媚军阀，向马克思主义者开火；他却在驳斥胡适的谬论的时候，公开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他是为了真理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的，也就无所畏惧。早年他就曾经写过一篇《真理之权威》，其中说到，凡是他认为确实合乎真理的，虽然社会上暂时不听他的意见，甚至不容他存身，为了爱真理的缘故，他也绝不敢“逡巡嗫嚅”来迁就社会上的看法；假如他的意见确实与真理不合，虽然社会上暂时欢迎他的看法，甚至很看重他，但为了爱真理的缘故，他也绝不敢随声附和，趋承当时的社会。他很赞美列宁不怕说出真理而遭到侮辱的精神。他的这种敢于背叛旧社会，有勇气追求真理的精神，始终是一贯的。在他的第一篇名文《青春》里，他一方面反复咏回地歌颂青春，要创造一个“青春的中国”，另一方面又那样气势冲天地表现了他与黑暗的社会相抗衡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青年锐进之子，坐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

他又说：

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有我、有我之现在而足恃。堂堂七尺之躯，徘徊回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何待他人之援手，始以遂其生者，更胡为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

这些话还是他早年间在日本进行反袁抗日运动的时候写的。可以说，以后当他成为一个有了明确理想、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直到他最后走上敌人的刑台的时候，他仍然还保持着他的这种藐视敌人、忠贞不屈的英雄气概。作为一个大学教授，那时候在他面前摆着两种生活：一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种是走无产阶级的道路；他选择了后一条路。他在选取了这条革命道路的时候，他是满怀信心，充满了乐观战斗精神的。他有趣地说，历史的道路好比一条长江大河，有时到了宽阔的地方一泻千里；有时遇到丛山峻岭，就有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段崎岖险阻的道路上，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而这种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人是不能感觉到的。他自己已下定决心，要“高唱着进行的曲调，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的，他说：“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他还劝青年们要甘于寂寞，因为冬天过后就是华美的春天；要到黑暗的地方去活动，因为一日中最光耀的曙光，是从黑夜中发出的。他感叹地说：“世间果然到了光明的机运，无一处不是光明，我们在这光明中享尽人生之乐，岂不是一大幸事！无如世

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同胞，都陷在黑暗中间！”因此，应当是象古话所说的：“先忧后乐。”他还号召青年们到痛苦的地方去，寻着那有痛苦悲惨的声音的地方走，因为那时候最痛苦、最悲惨的人，就是劳动人民。而且他说在这种寂寞的日子中要“乐得过”，而不是“耐得过”；不要把它看作“忍苦受罪的日子”，而要把它看成是“有趣的日子”。这就是他的乐观的战斗精神，或叫做“雄健的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寻求真理和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使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当他还只能幻想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他的革命热情已经是那样高涨；那么当他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认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时候，他的喜悦兴奋和勇气百倍的心境，就是很自然的了。

大钊同志对于坚持真理自信极高，但他也是一个虚怀若谷的人。这一点同他待人能够推心置腹，真诚相见，是紧相联系的，同时也是因为他对人对事态度比较客观。他对于许多社会现象惯于进行冷静的考虑分析，寻求根本原因；他绝不轻易随声附和、随波逐流，而又能在探索真理中改变自己的不恰当的看法。他说：“人各有其智力所能达到之境”。这话一方面是他鼓励人们要有自信，同时也说明他对自己、对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所能够达到的程度要有比较冷静的判断，他认为：“自己认为是真理的未必是真理，或虽为真理也未必全为真理，但要有自信”；同时，他主张要有“容人的雅量”，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五四”时代，他在青年们的心目中是当代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自己并没有因面骄傲；相反的，他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的公开讲演会上，就说他不敢说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有

什么研究；他抱着满腔热忱向听讲的青年们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他的这种心境，是不难理解的。

大钊同志生活的俭朴，和他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他身为教授，每月的薪金收入不算少，但他的妻子也常常为油盐柴米发愁。他经常接济穷苦青年，或把钱用在革命工作上；只有书算是属于他的财产，后来也都被军阀政府剿去了。他常常深夜工作，但家中没有安过电灯，而用的是煤油灯；他却一定要安一个电话，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上所不可少的。他非常赞美列宁生活俭朴，说列宁的功绩“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而他被狙击以后，卧病半年，薪金的数目不够维持他在病中的生活；以后国家虽然给他加了薪金，每月也不过二百元左右。他说：只就这一点说，已经使我们感到“惭愧无地”。他在谈到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说：“一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属的。”他还赞美列宁“是人民的忠仆”，而他自己也正是一个“人民的忠仆”。

在大钊同志的身上，保持着中国劳动人民和历史许多先进人物的这样一些传统的美德：勤劳勇敢、舍生取义、先忧后乐、克己待人、虚怀若谷、威武不屈，等等；所不同的就是，他是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之一。他思索着人生，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和他的同时代的先进的人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怒斥万恶的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和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他痛恨地说：“凡不事生产的都是强盗。”他梦想建立“人人做工”的自由



幸福的乡土，又有趣地说：

从前常听有“联邦政府”的话，近来又恍惚有“联省政府”的声音。什么名词，尽由你们去说，我总是梦想那联人社会。（《联人社会》）

李大钊同志是河北乐亭大黑坨人。生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幼年时代读过四年私塾。一九〇五年入永平府中学堂；在中学只念了两年，没有毕业就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一三年毕业。同年冬天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日本时，他组织过秘密的革命团体“神洲学会”；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透露了袁世凯和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以后，他奔走呼号，进行了反袁抗日活动。一九一六年初夏，他中途辍学，回国参加讨袁运动。不久袁世凯死了，他到北京与友人创办《晨钟报》，继续提倡民族革命思想，反对北洋军阀。其后，又在《甲寅日刊》任编辑，这时正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他密切注意俄国革命，写了一些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张勋复辟事变，仓皇走出北京。一九一八年一月，他被北京大学聘为该校图书馆主任，后又兼任经济学教授；后来，他在好几个大学同时兼课，是当时名教授之一。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一面教书、写文章，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同时亲自领导或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等社团的活动。《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改组后，他参加了编辑工作，同时又与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晨钟报》经过被查封，改名为《晨报》重行出版，在他的倡议和帮助下创办了《晨报副刊》，这是当时国内出现的第一个“副刊”，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五四”过后只有三个月，新文化革命阵营开始出现分裂：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路线，以李大钊为代表；

一条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改良主义路线，以胡适为代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标志。大钊同志那年暑假中从昌黎五峰山寄出一封《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驳斥了胡适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谬论。“五四”以后，大钊同志就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了。一九一九年冬天，大钊同志已经在北京大学领导一部分进步青年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〇年，他在北京各学校发展社会主义研究小组，作为建党的准备。十月，继上海之后，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大钊同志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钊同志在我党第一次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大钊同志在建党活动中首先领导了北方工人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一九二三年，在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中，他是领导者之一。大钊同志又坚决执行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他代表党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一九二四年，他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国共产党援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用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实行联俄联共扶持工农三大政策上，大钊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广州回到北京后，他领导国共两党的工作。同年，他又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钊同志较早重视农民问题，他并且于北伐大革命前在争取国民军中亲自首先抓了军事工作。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后，在北伐军向北推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北方军阀政府猖狂地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他离开学校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秘密的革命活动。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东北进关以后，一九二

七年四月六日，正是在蒋介石残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政变的前一个星期内，军阀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强盗们取得协议，并且在日、美帝国主义的间谍的直接配合下，逮捕了大钊同志。四月二十八日，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和要求，在京师地方看守所杀害了大钊同志，他和同时殉难的十九位年轻战友，光荣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这就是他的简单的生平经历。

## 二

大钊同志牺牲的时候才只有三十九岁，但他一生中除了领导革命斗争和教书而外，也遗留下了不少的诗文，其中有政论，有文艺译作，有杂感，有诗歌，有史学及其它方面的学术性的著作和翻译。实际上这些诗文大都是他从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到一九二七年大约共十七个年头内写的。他的功绩，主要在于为中国人民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领导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和以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工作；他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者。他不是作家。但是，他的带有文艺性的政论，散文，他的诗歌和杂感，成为了他的生命的火花和战斗武器，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他的学术性的著作，特别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社会问题和历史科学的一部分论著，还有散见于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论述中的一些谈到文艺的片断，对于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此外，大钊同志还译介文艺作品，搜集和注释过民间谣谚，但由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他在文学方面不可能做很多工作。我们能够看到的一部分成果，已经是值得珍贵的了。

以前为一般人所注意和经常引用的，是他的政论和散文，大体也只限于最知名的几篇；其它的因为散见于旧时代的报章杂志，没有出版过比较完善的选集，一般人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诗，留下的不多。从前刘半农编过一本《初期白话诗稿》，里面第一首就是大钊同志的《山中即景》，给人留下过一点印象；他的旧体诗，只是解放后经过重新搜罗发表，大家才看到这些作品；我曾经看到过他的一本红格稿纸写的旧诗稿，可惜在抗日战争中寄存在友人家里被烧掉了。至于他的杂感，即《随感录》，因散见于过去的报刊，今天也许很多人都还不大知道。但是这部分杂感，是写得很好的，数量也不算很少。它们大都发表在《每周评论》和《新生活》上；《新生活》上发表的更多一些。《新生活》是一个通俗性的刊物，一般人不注意，现在也很难找到。读这些杂感，不但至今仍会给我们很多启发，也是一种愉快。

无论是他的散文、带文艺性的政论、诗歌或杂感，除了极少的是工作之余用文艺的形式写自己的心境（主要是诗歌）而外，大都是为了参加当前的斗争而写的。散文、政论和杂感，特别是这样。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针切时弊”。因此，多半是火辣辣的，包括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们或者引起人冷静、深刻地思考，或者鼓舞着人们的战斗热情。

从大钊同志的著作里可以看出，就是他的那些篇幅较长的学术性的著作，象《史学思想史》、《论人种》、《土地与农民》等等，也没有一篇不是与现实问题有密切联系和为了系统地解决当前某一个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散文、政论、时评等等，战斗性更为强烈，看来很多都是在战斗的需要中匆匆写出的。在这些文章里，作者的态度、观点和主张，异常明确，而且充满了革命的激情。《青春》是一篇气冲霄汉的战斗宣言；《“今”》、《时》以及

其它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主要是强调为今天而工作，创造美好的未来，反对崇古、复古思想。《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它们所反映的作者的敏锐的时代感，它们对于中国革命斗争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强烈的战斗性，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不消多说了；此外象《新纪元》、《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及其它一些文章，现在看来，也仍然使人感到里面有许多新鲜的、富于引人思考的东西。这些文章，总的说来，让人感到作者写作的时候，有着旺盛的战士的革命精神，哲学家的思考，和诗人的热情。有的同志说，读了《青春》和《“今”》，觉得它们简直就是诗篇。确是这样。如果多浏览一下大钊同志的论著，你就会发现甚至象《告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书》、《民彝与政治》、《土地与农民》那样一些政治论文，里面也有一些富有诗意的片断；不过他的散文和政论里，革命的激情更多，引人思考的东西更多，而不仅仅是说明问题而已，或者说是比较富有文采吧。这些文章，是作者对于当前革命中的问题和社会现象观察、思考的结果；揭露黑暗，批判谬论，说明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引导人们向着革命的方向走。它们武装着人们的思想，而且处处流露出作者的心境，也扣着读者的心弦。

知名的文章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必多举了，让我引用一段他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里说过的话吧，因为这样一个题目看来很象是一篇词严义正而比较枯燥的指示，可是它竟是那样充满了诗意。他说：

俄国某诗人训告他们青年说：“毁了你的巢居，离开你的父母，你要独立自营，保住你心的清白与自然，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你到那里去活动。”这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宝训，真是现代青年的警钟。我们睁开眼看！……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

样丑贱的事情么？卖笑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辱身的贱业么？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作罪恶的事么？他们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恶么？他们所受的刑罚，果真适当他们的罪恶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陷于罪恶或是受了冤枉么？……

显然，他是在带着诗人的心情，向青年们说这番话的。他敏锐地观察了旧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从社会制度上寻求根源，最后愤愤不平地叙述它们，揭露它们，给青年们指出奋斗的方向，要青年们和他一起战斗，改造这个旧世界。他的战斗热情是非常旺盛的。我们说它是思想家，从这些散文和政论里就可以充分感到这个称号的深刻含义。广义地说，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诗人。

这些散文、政论，并不全是文学作品，但是它们有不少带有文艺性，以至有的让人感到是诗篇。这大概和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散文传统是有关系的。作者自己有一段谈到中国的文和史的关系的话，对我们理解这一点很有帮助：

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出于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原故。这些神话与传说的记载，即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故文史不分，相沿下来，纂著历史的人，必为长于文学的人。其实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必为文豪，为诗人；而且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感情，毋宁要科学家的冷静的头脑。至于记叙历史的编者，自以历史文学家执笔为宜。因为文学家的笔墨，能美术地描写历史的事实，绘影绘声，期于活现当日的现实。但为此亦须有个限度，即以诗人狂热的热情，生动的历史

事实，应以不铺张或淹没事实为准。这样编的历史，含有两种性质：一方是历史的文学，一方是历史科学的资料。（《史学要论》）

大钊同志的散文、政论，虽非历史著作，一般都是为了对当前的现实问题发表意见；他自己也不一定有把它们作为文学看的意思；但其中“绘声绘影”的地方和“诗人的狂热”的确不少。事实上“诗人”和“战士”往往是分不开的；诗人是时代感最敏锐的人，诗人常常具有战士的革命精神，而战士即使目的不是写文学作品，有时却会有真正诗的东西在他的笔端涌现出来。而大钊同志的著作，似乎还不止于此，他恐怕确实是接受了不少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的影。这是从他一贯的短论或长篇著作里都可以看得出的，无论是他早期用文言写的也好，后来用白话写的也好。

他的杂感，即随感录，的确象我们普通对杂文已经习惯了的说法，它们很多可以称作匕首。这部分杂感，因为是随时有感便写，内容方面很多；或者是尖锐地抨击反动势力，或者是痛贬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或者是说出自己的希望和看法；而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居多数，并且大都带着“诗人的狂热”。他是这样痛击着无耻的军阀政客，说明广大的劳动人民在旧中国没有地位：

主客是对待的名辞，既有政客必有政主。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混一口饭吃，看不见主人影儿。请问这种客吃的饭是那个款待他们的？共和国的政主到底是谁？（《政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大激战，新思潮被腐朽透顶的封建势力认为是“洪水猛兽”；他在《最危险的东

西》里说：

我常和友人在北京市里步行，每过那颓废墙下，很觉可怕。怕它倒了，把行路的人活活压死。请问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

他就是这样口吻轻松而又心情沉重地抨击着敌人，愤慨的情绪溢于言表。他以诗人的热情向人们说明：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依靠自己来解放自己：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真正的解放》）

他担心有些人虽然外表看起来很进步，但难保不是外面红、里面白，象红萝卜。他说：

俄国的真正红党，说那和日本订立协约的海参威政府，是“红萝卜党”。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海参威的红党，是似是而非的，外面挂上一层红皮，里面却全是白的。这句话可算是“遽而虐”了！遥望中国境内，春风春雨中，仿佛新生出一层小植物，都带着一层红皮，将来难保不是一片红萝卜！（《红萝卜党》）

这几个例子，不须多加说明，已经很能够说明他的杂感里所表现的深刻思想和它们所能够发挥的战斗作用了。

关于他的诗歌还应当说的是：在“五四”初期，他写了几首白话诗，大都是他在昌黎五峰山住的时候写的。昌黎五峰山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他曾经有两次到那里去避难。当他住在五



峰山的韩文公祠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事写作，发出批驳胡适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的公开信的时候，他也轻松地写了几首白话诗。这几首诗，表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股新鲜气息，也是一个革命者在休息时间一种心境的流露。大钊同志虽然一直紧张地参加新文化运动和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但他还是一个爱游山逛水的人，从这几首短诗里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个人的喜爱。他的旧体诗，现在能够看到的一共不到二十首，而且也都是“五四”以前写的，其中早年的作品还要更多一些，没有发现有一首是“五四”以后写的。一九二四年他在昌黎五峰山避难的时候，临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还写过一首悼念他的女孩子锺华的长诗，可惜没有保留下来。是否在“五四”以后还写过别的旧体诗没有，就不知道了。这部分旧体诗也象大钊同志早期的政论、散文一样，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迸发的革命热情的火花，反映了他在那个时期的磅礴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它们是属于慷慨悲歌一类的作品，与祖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格调高亢，风格是比较粗犷的。

### 三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驱者，我们可以从大钊同志的为人和遗作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他的同时代的许多共产主义战士所共同走过的道路。他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模范人物之一。除了上述散文、政论、诗歌和杂感至今对我们还是很有教益的读物而外，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的著作，也有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的地方。这里，我只能把话题仍然限制

在文学方面。

他认为我们的文学应当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而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他还说，“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它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什么是新文学？》）

他指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不赞成用白话作的文章就算是新文学，这一点和当时的胡适的观点恰好相反。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同意胡适派把凡是用白话写的就算新文学或民间文学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了，但说到“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这个论断，就是在今天，也很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作用。

他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只有极少数作品是合乎他所说的新文学应有要求的，他对于那时候文学方面的缺点，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他说：

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来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充塞满幅。

他还提醒人们说，长此以往，将是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险。他所指责的新文学的缺点，一个是“浅薄”，就是光是用白话，

拾掇点新名词、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就算作新文学；不仅如此，还有“名利思想”作怪，有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即把文学看成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而且字里行间，映出他所指出的那些恶劣的心理的斑点，这些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反对，当然完全是正确的。他不满意“新思潮新文艺里边”托出这些科举、商贾气息的旧毒新毒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恶劣心理的斑点，这是因为当时的所谓“新思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所谓“新文艺”应当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即现实主义的文学。可是新文学方面一般状况，并不完全符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五四”以后新文学中所反映的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和许多“恶劣的心理的斑点”，只有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才找到了根本解决的办法，这就是作家们要到劳动人民的火热的斗争中去，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

大钊同志主张“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又提出培养这种文学的土壤的根基，首先是“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大钊同志在“五四”时期常常强调谈“主义”，强调要有“共同的信仰”。虽然大钊同志还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文学的口号，但他的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精神或说是有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因素的。他是要求作家信仰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社会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较深的文化修养，作品里就不可能有“宏深的思想学理”，而只能是很浅薄，即拾掇点新事实、新名词之类。我们常说，一个伟大作家必定是个思想家，也是这个道理。

与此相联系的，大钊同志非常强调文学作品要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理想。他认为新文艺从来都是“新文明诞生的先声”（《晨钟之使命》）。在“五四”时期，民主的呼声高唱入云。他说当时“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是 Democracy 的一种译法）“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沉沉睡梦于专制的深渊里的亚洲，它在现代的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和中世纪罗马教在那时的欧洲一样。”“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它们绝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到群众的讴歌……”他还说当时的情况是：“顺它的兴起，逆它的灭亡”。“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的”（《平民主义》）。他就是这样描写和强调着民主的理想。在这以前，说到新文艺常常是新文明诞生的先声时，他还曾经说：“……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讳，发挥其理想，依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群众的沉梦赖以惊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自己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哲人”，在他身上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觉醒。他在提倡民主革命的理想时，还赞美过海涅、莱辛、雪莱、惠特曼等诗人、作家。他说世人但知海涅是沉哀的诗人，而不知他是为“年轻的德意志”弹唱的人。说到“五四”以后我们的诗人和革命家的时候，他说：“那有诗的心趣的平民主义者，想冲着太阳飞，想与雪莱和惠特曼扶腾上九霄。”他就是这样强调着作家、诗人们对自己的时代所负的责任。甚至在早期的论文里，大钊同志就强调作家要“救人救世”。他不止一次提到旧俄时代有几个作家，在沙皇的暴政下，以诡幻的文学讴歌“死”，描写“死”的尊严，“死”的善美，把自杀说成天国，给了青年们不好的影响（《文豪》《论自杀》等）。他说“文学的示唆的力量也很大”，所谓“文学的示唆的力

量”，也就是说青年们很容易受文学作品的影响，模仿作品里面的人物。在提倡文人有“救人救世”的责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还没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他希望有一二哲人“为自我觉醒之绝叫”和赞美海涅的时候，也还没有这样的世界观。但是，他强调作家对时代的责任，强调作家要有理想，却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而到他在“五四”时期盛赞民主的理想即所谓平民主义的时候，到他主张新文学要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作土壤的时候，虽然这时候赞美的是和海涅在成就上差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和惠特曼，他已经是一个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观察问题的共产主义者了。除了民主的理想，他这时候还有更高的社会主义的理想。

大钊同志还强调文学中要有“博爱的精神”，和他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欢呼“人道的钟声响了”的意思，是相一致的。“同情”、“博爱”，是他促使他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一个基调，在他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里，这种调子弹得最响亮。他虽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显然，资产阶级的这种口号是虚伪的，而他却为了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真理。他所谈的“博爱”，“同情”，是同情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爱劳动人民，并不是对于一切人都爱；他自始至终和中外反动派势力站在反对的地位，而且一开始就对处在“刀火灾祸”的“庶民”深表同情，就是证明。当然，现在提倡作家应当同情劳动人民，就很不够了，应当是把自己改造成劳动者；抽象地提“博爱”也是不够科学的。大钊同志对于新文学运动的主张，基本上是很正确的，而且有着精辟的见解，但是，在提法上当然也还有不够确切和完善的地方；例如他还提到新文学“应当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

东西而创作的文学”。实际上这话在当时的意思，是反对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卫道”思想，反对主张“文以载道”，即反对“载”封建之“道”的封建文学；作为一般的论点，“为文学而文学”当然是不正确的。他的这篇短文的基本论点，就不是要作家们“为文学而文学”而是要他们有“坚信的主义”，也就是要“载”无产阶级之“道”，宣传革命思想。上面说他很早就强调作家要有“救人救世”的责任，也是证明。可见只是在问题的提法上有缺点。

总之，按照大钊同志对于文学运动的看法，可以这样说，他是把文学工作看做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他既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恶劣心理与名利思想深表不满，对讴歌“死”的厌世悲观思想也不以为然，而且还痛骂过颓废堕落的文学，说那种文学是“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女醇酒之中”，与革命的文学相比，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他要求青年们“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新的！旧的！》）他所主张的“为社会写实的”、具有“真爱真美的质素”的新文学，可以说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学。他认为文学应当为革命服务，应当是创造新生活的一种武器而不是其他。这种见解，同列宁关于文学应当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党性原则，也是相符合的。

关于今与古的关系问题，也是大钊同志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对引导青年人献身革命、学习辩证法起过重要的作用。

他的《“今”》，就是进一步发挥他以前在《青春》里所提出的要重视“今日”的意思。他在《青春》里引用了一位叫耶马孙的诗人的话：“你若爱千古，你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他自

己也说：“现在是我们青春中的青春”。可见他是多么看重“现在”了。他在《“今”》里又说：“世间最宝贵的就是‘今’。”理由是：“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与‘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样，从“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和“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看来，“现在”是那样一个可以使得过去、未来都遥相呼应的响铃，它的确是最重要的了。

把这个哲学意味的话运用到文化历史的发展上，他说：“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的时代思潮，凑合而成的。”这里可以看出，他也没有因为“现在”最重要而有轻视过去的意思。他的崇“今”思想表现得尤其强烈的是他的《时》。他说：“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造。”又说：“我们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依它的主动力，向前迈进它的行程……”他的无限的创造精神，可以说是从崇“今”的观念奔腾涌现。后来他有一篇关于“今与古”的讲演；过了一年，他又写了一篇题为《今与古》的文章，叙述了历史上崇今派与崇古派的斗争。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快活地说：“我们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他劝人不要学怀古派天天动怀古的幽情，而要记住耶马孙的名言，“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他实际上是自己列入崇今派。崇今派的看法是：

人类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加，一切今的，都胜于古的，优于古的，即如诗歌艺术，今人所作，亦并不劣于古人，所谓无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

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

他是赞成“讴歌现代，颂祷今人”的。这是因为“今人所作，并不劣于古人”；要以今世为基础创造未来；至于对待古人，只是继承问题，即“承受古人，启发来者”。在“今与古”的讲演中，他批评崇古派的“黄金时代说”是错误的：

同一的太阳光，同一的空气，在古能生的人，在今又何尝不能生？古代生的人，如何能说是万世师表！崇古派所认为黄金时代产生之人，现在也可以产生出来，我们不必去怀古。

他鼓励青年们“不要学张勋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他又说：

他们是想过去的，我们只是想将来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钊同志对古代艺术的评价，对“现在”我们应有的责任和能够作出的事情，是分析得很恰当、很透彻的。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创造精神。不论是封建时代的崇古派是资产阶级的崇古派，在今与古的问题上，我们与他们的确抱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是崇古拜古，是古非今。我们认为今人可以胜过古人，但也不菲薄古人。这些意思，在上面引出的两段话里，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厚今”是肯定了；过去的历史，古人的成就，究竟为什么又不应当轻视而应当尊重呢？这还不仅是因为古人的创造也有我们赶不上的地方，古代的艺术及其它创造，今天仍然是我们的财产；也不只是因为我们需要继承古代人的优良传统，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还必须充分了解为什么只有研究过去，“承受古人”，才能“启发来者”。关于这方面，大钊同志也同样作了明白的回答。

他在《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与人生态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过去的一座高楼，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面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而且他说：“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这些话一方面告诉我们为了看清未来人生的道路，必须研究前人所走过的道路，看看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前人的宝贵经验，要登上高楼才能看得远；同时肯定，不在过去的现实基础上建筑新世界，新世界是建筑不起来的。不能空中楼阁，凭空创造。可见研究历史，继承遗产，对创造新生活、新历史，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是这样，研究古代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也是这样。他还说：“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你看，对于创造新生活说来，过去的东西不过是材料；可又是绝不可缺少的材料。我们应当运用过去的材料和前人的经验，创造我们这个时代所应当创造的新东西，比如新文学，新艺术，

以便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他还说：

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

难道还不够清楚明白吗？我们的学术界，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的倾向，曾经是很严重的。崇古拜古，为古代而古代、为研究而研究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起阻碍作用。因此，提出“厚今薄古”的方针以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正需要“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使对于“一切过去”的研究“都以现在为归宿”。但是，现在也很有必要批评轻视过去，轻视遗产的思想。有些人把“厚今薄古”的方针轻而易举地在任何具体工作上机械地套用。轻视传统作品，随便菲薄古人，甚至达到荒唐可笑、狂妄自大的地步。这是极端有害的。不能算是真正的崇今派。我们也需要站在高楼上，来观察我们的未来的道路，以便更好地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

大钊同志把历史看成是活的，不断发展、变化和进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间的历史是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新、旧矛盾的斗争，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好象一个身子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样。这是他的最根本的观点之一。十月革命以前，虽然他还没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文章里唯心主义的观点也不少，但他那时候的世界观基本上已经是唯物主义的，他的文章里有着丰富的辩证法的观点，这和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读过一些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书大概是有关系的；到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于自然和社会发展历史的看法，就比较完善的多了。有了历史是活的基本观点，他就能够

充分地看到历史的飞跃前进和生活现象的复杂性。他的所谓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和乐观的创造精神，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来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在他的散文和政论里，在他的杂感里，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他遇事总是以冷静的头脑，从社会制度和历史上考察根本原因，好象这成了他的习惯。他是不苟言笑的人，他却常在思索。他在和“顽固派”作战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唯物史观对研究历史的价值，分析了道德的变动和物质变动的关系，分析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沿变和原人社会在文字书契中的反映，等等。这些学术性的著作虽然也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它们对于我们的文学艺术及其它历史文化科学的研究工作，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从大钊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踏实的研究工作，也很可以取得一些借鉴。

历史的变化是复杂的，生活现象也是千变万化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无论是作家的创作也好，无论是历代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也好，自然会呈现出丰富多采，并且有着复杂的情况。因此，考察和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考察它们的发展规律，既要正本清源，又不可失之粗暴和简单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要把历史看成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这就是说，要充分看到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要有辩证法。可是事实上我们往往很容易并不是这样。大钊同志说：“作惯活文章的人，再不愿作死文章了。”（《解放后的人人》）活的历史，丰富多采的生活，自然要用“活文章”来反映；而这“活文章”如何做，首先不能不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生活和问题，力求使自己的见解和描写做到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大钊同志

认为“凡学都应求真，研究历史更加是这样”。他说：“研究史学，要有求真的态度和做踏实的工夫。一要尊疑，二要重据。这就是求真的科学的态度。”（《史学要论》）他在别处也说过，要求得真理而不发生谬误，“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真理之权威》）。这些尊疑、重据的态度和方法，“查事之精”和“推论之正”的踏实的工夫，我认为对于文学艺术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同样是很需要的。

出于这样一些考虑，这本选集里也收入了大钊同志的几篇学术论文。但因为这本书主要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并且偏重从文学方面来考虑，所以象《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它关于政治、经济、历史的重要论著，都没有收入。我的这篇介绍，也没有论述大钊同志的全面的思想发展过程和他在中国革命问题及其他历史、哲学等各方面的贡献。

还应该提到，在大钊同志的著作里，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不够精当的地方。这原因我以为很简单，这是因为它们是过去的著作。他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虽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热心的传播者，在他的著作中有着许多在现在看来依然很有光彩的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是一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求真理，他接受过庞杂的思想影响；他的文章里有民主主义的思想，有空想的社会主义，有托尔斯泰的乡村主义，他还介绍过尼采、泰戈尔等等。这些旧思想，很多他自己后来已经克服了，但是也不免还留有残余。他既然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而且他还没有看见过我们中国出现一个新时代；他是一个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就不可能设想他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要求是不合逻辑的。我们理解他的作品和论著，不能脱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在向他学习的时候

候，当然也需要有所选择。这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陈毅同志说得好，他说：

守常同志的生平，据个人私见，可以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革命先驱，大节不辱”十六个字概括之。他的马列主义论述，其正确和精深的部分已为三十年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同时他与我们同时代的所有先进人物一样，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不可能完全正确解决一切问题；旧时代的思想残余不可能一下剔除净尽，这正是合乎科学逻辑的。（《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

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对历史人物的这种评价，陈毅同志还谦逊地以他自己为例，说明今天我们在革命工作需要中个人的知识是如何地不足，是如何地不能完全认识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式，“便知道先驱者的伟大处和他们认识问题追求真理的艰苦。”他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句话应当细加玩味。”这个意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一切革命先驱者们，而且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和鞭策。

#### 四

在出版这个选集的时候，我不禁还想到有关收藏和编辑李大钊同志的诗文的事情。

今天我们能够读到这些诗文，当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解放以前，在那“黑暗的中国”，李大钊同志的著作在反动政府看来简直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语；北洋军阀还曾经把“李大钊”念成“李大剑”，说看“大剑”这名字，就知道“准是共产党！”从

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都是这样的横暴无耻和无知，他们只知仇视新文化，仇视革命，把共产党人写的文章一概看成“危险品”；他们自然也不会去区别李大钊起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后来才成为共产主义者。反正要禁止。

据我所知，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不幸已经去世的李乐光同志，当时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年轻助教，他就曾经是一个热心收藏和编辑大钊同志的诗文的“危险分子”。在那时编选出版李大钊的诗文，目的当然也就是为了宣传共产主义。他那时在参加革命活动中曾和李葆华同志一块搜集李大钊同志的著作，准备编好出版。他从书报上抄录大钊同志的诗文，起先是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进行的；后来他搬进城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经常到一位西医司药家里继续进行抄录编选工作。以后环境紧了，那位司药朋友不敢再在自己的家里藏这些文稿，就由乐光同志的岳母赵老太太把文稿从司药家里取回埋在院子里的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太太从向日葵下把一包文稿取出来，乐光同志继续来编选；工作完毕，老太太再去把文稿埋到向日葵下。一九三三年，乐光同志被捕了，赵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临到南京去探监时，她们把那些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大体编好的文集送给了星华。以后这《文集》经周启明先生辗转送到上海，鲁迅先生还为这个文集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但是转到上海的只有一部分，而且终因白色恐怖，没有能够出版。直到一九三九年，上海北新书局才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而实际上这还只是原稿的半部，一共只有三十篇文章，解放以后再版时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原稿的后半部，到了解放后才找回来。这就是这半部文集的出版的来历。特别应当说说的是：赵老太太在乐光同志刚被捕以后，怕宪兵把这些文稿和其他文件搜查出来，

还曾经用一夜的工夫在房檐前挖了一个坑，把文稿、文件装在一个罐子里埋在地下。挖坑的时候，老太太怕灯光闪出院墙外，被宪兵、侦探发觉，她只能用小铁铲和双手挖一阵，划根火柴看看。直到天快亮才把一个坑挖好，她的手指尖都磨出了鲜血。而这时，罐子小，文稿、文件多，又盛不下。她用剪刀把稿纸上下剪去了一些，才把它们勉强塞进罐子里。这部分抄稿，解放后还找到了不少。我看到这些抄稿有的还留着被剪得长短不齐的痕迹，有的红格稿纸因为曾经在向日葵下受潮湿而溷得满纸通红，面对这些“危险品”的不幸的遭遇，深深感到愤慨。我们应当衷心地感谢赵老太太；她为了保存大钊同志这些遗作，冒着风险，受尽辛苦。让我们向这位为党作过交通工作的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贾 芝 1959年3月31日上午

## 目 次

前言（贾芝） .....	1
--------------	---

### 第一辑 诗 歌

登楼杂感 二首 .....	3
哭蒋卫平 二首 .....	6
题蒋卫平遗像 .....	9
岁晚寄友 二首 .....	10
吊圆明园故址 二首 .....	12
咏玉泉 .....	14
有感 .....	15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	16
太平洋舟中咏感 .....	18
神州风雨楼 .....	20
送别相无 .....	21
答霍侶白 .....	22
彼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 .....	23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	24
复辟变后寄友人 .....	25
山中即景 三首 .....	27
悲犬 .....	29
岭上的羊 .....	30



山峰 .....	31
山中落雨 .....	31
欢迎陈独秀出狱 .....	32
歌谣选 三首 .....	35
谚语 二则 .....	36

## 第二辑 随感录

北京的“华严” .....	39
新自杀季节 .....	40
面包问题 .....	41
政客 .....	42
过激乎？过情乎？ .....	42
乡愿与大盗 .....	43
放弃特殊地位 .....	43
秘密外交 .....	44
死动 .....	45
普通选举 .....	45
光明与黑暗 .....	46
强国主义 .....	46
混充牌号 .....	47
统一癖 .....	48
白人阀 .....	48
解放后的人人 .....	49
宰猪场式的政治 .....	49
太上政府 .....	50
第五师军人 .....	50

黑暗的东方 .....	51
牢狱的生活 .....	51
不要再说吉祥话 .....	52
新华门前的血泪 .....	52
改造 .....	53
哭的笑的 .....	53
威先生感慨如何? .....	54
赤色的世界 .....	54
最危险的东西 .....	55
光明权 .....	55
我与世界 .....	56
忠告黎明会 .....	56
真正的解放 .....	57
战栗 .....	57
灰色的中国 .....	58
万恶之原 .....	58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	59
日本人听者 .....	59
赤色青色 .....	60
难兄难弟 .....	60
秘密.....杀人 .....	60
大笑话 .....	61
新鲜名词 .....	61
圣人与皇帝 .....	61
黑暗运动 .....	62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	62

文治国庆	64
面包运动	64
时代的落伍者	65
应考的遗传性	65
时间浪费者	66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66
人与禽兽	67
参战军呢？	67
谁是“有实力”者？	68
牺牲	68
妨害治安	68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	69
掠夺物品的遗迹	69
死	70
寺内死了	70
“鼓吹共产主义”	71
联人社会	71
圣裔的恤金	71
那里还有自由	72
一个自杀的青年	73
被裁的兵士	73
归国的工人	74
“一心一德”	74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	75
“用民政治”	76
“中日亲善”	77

主义	77
什么是歪史	78
禁止说话	78
工读(一)	79
工读(二)	79
互助	80
大联合	81
生活神圣	81
物质和精神	82
又是一年	83
忏悔的人	84
哭冯国璋	84
低级劳动者	85
整顿学风	85
真是梦话	86
“特别体恤”	86
知识阶级的胜利	87
好一对兄弟国家	88
山穷水尽的青年	88
精神解放	89
红萝卜党	90
乱七八糟	90
变革的原动力	91
人治与自治	91
民众的新年	92
近来的倒戈运动	92

堕落的法兰西文明·····	93
黄昏时候的哭声·····	94
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	94

### 第三辑 散文、游记、通信

文豪·····	97
青春·····	102
美与高·····	114
真理之权威·····	117
乐亭通信·····	121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124
“今”·····	134
新的！旧的！·····	138
新旧思潮之激战·····	142
现在与将来·····	145
今与古（其一）·····	147
时·····	152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157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162
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	166
黄彪流血记序·····	167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169
自然与人生·····	171
游碣石山杂记·····	176
五峰游记·····	182
从五峰致郁巖信·····	185

致若愚、慕韩信·····	186
关于《新青年》的一封信·····	187
旅行日记·····	189
关于出版蔡和森《俄国社会革命史》的两封信·····	192
挽孙中山联·····	193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	195
列宁不死·····	197

#### 第四辑 政论、学术论文

庶民的胜利·····	201
Bolshevism 的胜利·····	204
祝黎明会·····	211
新纪元·····	213
劳动教育问题·····	216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219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222
过激派的引线·····	225
阶级竞争与互助·····	227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231
再论问题与主义·····	233
什么是新文学?·····	240
史观·····	242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247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254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272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280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	295
今与古（其二） .....	303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	317
社会主义释疑 .....	321
研究历史的任务 .....	324
重版后记（贾芝） .....	331

第一辑

诗 歌





登楼杂感\* (二首) 戊申

(筑声剑影楼滕稿)

一

荆天棘地寄蜉蝣①，  
青鬓②无端欲白头。  
拊髀③未提三尺剑④，  
逃形思放五湖舟⑤。  
久居燕市伤屠狗⑥，  
数觅郑商学贩牛⑦。  
一事无成嗟半老，  
沈沈梦里度春秋。

二

感慨韶华⑧似水流，  
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⑨，  
空著南冠泣楚囚⑩。  
家国十年多隐恨，

英雄千载几荒丘。  
海天寥落闲云去，  
泪洒西风独倚楼。

1913年7月1日

《言治》第4期

\* 一九一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四期，以《筑声剑影楼赋稿》为题，发表了《登楼杂感》、《哭蒋卫平》。《登楼杂感》署名作于戊申，即一九〇八年，是作者留下来的最早的诗篇。“筑声剑影楼”，作者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自用的斋名。筑声，出于春秋时代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大钊同志将自己读书写作的小楼命名为“筑声剑影楼”，表现了当时他忧国忧民，崇尚侠义，立志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强烈愿望。

- ① 寄蜉蝣：蜉蝣，昆虫名，生存期极短，有朝生暮死的说法。苏轼《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 ② 青鬓：黑发。
- ③ 拊髀：拍股，即拍大腿，表示激动。《说文》：“髀，股也。”
- ④ 三尺剑：剑一般长三尺，故名。《战国策》：“曹沫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作者以没有投身军旅，参加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而感到遗憾。
- ⑤ 逃形思放五湖舟：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不愿再在越国作官，遂泛舟五湖，历齐到陶（今山东曹县东北）隐居。作者对清末的现实生活极端不满，想如范蠡一样遁迹江湖。
- ⑥ 久居燕市伤屠狗：《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里是说作者为以屠狗为业，不能达到反抗暴政的目的而伤心。
- ⑦ 数觅郑商学贩牛：郑商贩牛，事见《左传》。春秋时，郑国商人弦高出去贩牛，路遇秦师偷袭郑国。弦高装作郑国的使臣，以十二条牛犒劳秦军，同时派人到郑国告急。秦军遂以为郑国已有防备，不敢袭击郑国，中途退兵。这里是说多次寻求像弦高那样的爱国之士，请教救亡的谋略。
- ⑧ 韶华：春光，青春。
- ⑨ 惊闻北塞驰胡马：北塞：祖国的北方。胡马：指沙俄等帝国主义侵略者。
- ⑩ 空著南冠泣楚囚：《左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曰：‘南冠而縶者谁也？’”

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南冠，楚冠。楚人被俘后，仍戴着南方的帽子，以表示对故国的怀念。楚囚，后被引申为处境窘迫的人。《晋书·王导传》：“何至作楚囚相对泣也。”这里是说为祖国的危亡而悲泣。

哭蒋卫平\* (二首) 辛亥

(筑声剑影楼滕稿)

一

国殇①满地都堪哭，  
眼泪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沈漠北，  
经年骸骨冷江②头。  
辽东化鹤③归来日，  
燕市屠牛④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  
断肠风雨上高楼。

二

龙沙⑤旧是伤心地，  
凭吊经秋只劫灰⑥。  
我入平山迟一步，  
君征绝塞⑦未曾回。  
玉门魂返关山黑⑧，  
华表人归猿鹤哀⑨。

千载胥灵应有恨⑩，  
不教胡马⑪渡江来。

1913年7月1日

《言治》第4期

\* 蒋卫平，作者永平府中学同学，辛亥革命前夕，一九一一年，在黑龙江边牺牲，事迹详见编者附记。

- ① 国殇：古代年不满二十而死叫殇。在战场上为国牺牲的人，称为国殇。
- ② 江：指黑龙江。
- ③ 化鹤：《搜神后记》：丁令威，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千载后化鹤归辽，落在城门华表柱上。有个青年举弓射鹤，鹤起飞，徘徊空中，言说：“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塚累累！”遂冲天而飞。后人以化鹤或鹤化为死亡的代称。
- ④ 燕市屠牛：屠牛，意同屠狗。指荆轲在燕市漂泊，壮志难酬的事迹，见《登楼杂感》注③。
- ⑤ 龙沙：《后汉书·班超传赞》：“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原注：“葱岭、雪山、白龙堆，沙漠也。”后泛称塞外沙漠之地为龙沙。李白《塞下曲》：“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清方式济著《龙沙纪略》，专纪黑龙江事，后东北也称龙沙。这里，指黑龙江以南地区。
- ⑥ 劫灰：劫火后的灰烬。参看《吊圆明园故址》“昆明劫”注。
- ⑦ 绝塞：边塞很远的地方。
- ⑧ 玉门魂返关山黑：玉门，关名，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古时通西域的要道。《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从西域上书说：“臣不敢望到九泉镇，但愿生入玉门关。”这里借喻说，当死者的英魂回到玉门关时，夜幕已经降临，关、山都黑了。
- ⑨ 华表人归：同上“化鹤”注。猿鹤：《太平御览·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死，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后以“猿鹤虫沙”喻死于战场上的阵亡战士。
- ⑩ 千载胥灵应有恨：胥灵，本作灵胥。《文选》左思《都城赋》：“习御长风，狎玩灵胥。”注：“灵胥，伍子胥神也。”世传伍子胥死后为海神。春秋时，楚人伍子胥帮助吴王夫差伐越，大胜。越王勾践请和，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允予议和。后伍子胥屡谏不纳，反而听信谗言，赐伍 剑，让他自刎，伍子胥含恨而死。这里借伍子胥的形象描绘牺牲在江边的蒋卫平，说他以高度的爱国精神守卫江头，不许侵略者渡江。

⑩ 胡马：指沙俄帝国主义侵略者。

#### 编者附记：

蒋卫平，原名蒋慕谭，又名蒋大同。河北永平府蒋家庄（今属滦县）人，生于一八八二年腊月十二日。一九〇五年，与李大钊同志同年入永平府中学。后又在保定陆军速成中学肄业。离校后到东北沈阳在赵尔巽将军器重下兴办教育，但不愿作清朝的官。日俄战争后，沙俄不断策划入侵我国。蒋少有大志，以救国为己任，矢志预防帝俄侵略，曾遍历关外及蒙古各地，并隻身到西伯利亚，了解敌情，被俄国拘留入狱。一九〇八年九月获释，在长春办《长春日报》，鼓吹捍卫国权，抨击伪立宪，受清政府怀疑。他与小时同学商震、陈明侯等在东北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一九一〇年春，熊成基找他与陈明侯等人图谋起事反清，事败，蒋逃至黑河。这时，勘界专员宋小濂正在黑河道为四十八旗屯事件与俄国交涉，见蒋大同来大喜，要他参加工作。蒋又隻身去调查帝俄边界的情况时，又被俄吏逮捕。经宋小濂派人交涉，俄方佯允释放。这年八月五日，俄兵护送蒋卫平过江，当蒋上船时，俄兵在身后忽开一枪，蒋立即倒地，几乎坠入江中，又被砍四刀而死。遗体被俄兵拖入浮屠所。后经陈明侯同俄边界官谈判，才移尸江南，暂时葬于黑水之滨。陈明侯，又名陈幹，他在滦州横山东头偏凉汀虚阁（乾隆行宫）南面，为蒋慕谭修一石碑，上面刻诗一首：“滦水流潺潺，英雄去不还，龙沙埋白骨，风雨哭阴山。”蒋卫平被誉为“关外大侠”，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 题蒋卫平遗像

斯人气尚雄，  
江<sup>①</sup>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sup>②</sup>，  
零泪一杯土<sup>③</sup>。  
不闻叱咤声<sup>④</sup>，  
但听呜咽水<sup>⑤</sup>；  
夜夜空江头，  
似有蛟龙起<sup>⑥</sup>。

1913年6月1日

《言治》第3期

---

① 江：指黑龙江。

② 碧血几春花：《庄子·外物篇》：“莒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相传周朝大夫莒弘忠心为国，因谗言被流放归蜀，自恨忠而遭谗，刳肠而死。蜀人很受感动，将其血藏在柜中，三年后化为碧玉。后世遂称死难者的血为碧血。几春花：碧血化为几个春天的花。

③ 一杯土：指坟。

④ 叱咤声：原为怒声，这里指英雄气概的呼斥声。徐陵《为武帝与北齐广陵城下书》：叱咤而起风雷，吹嘘如倒山岳。

⑤ 呜咽水：呜咽悲泣的流水，含有对死者表示悲悼的意思。

⑥ 蛟龙起：蒋卫平虽已牺牲，但他的英勇气概仍如蛟龙腾空，鼓舞后人。



## 岁晚寄友\*（二首）

### 一

江山依旧是，  
风景已全非。  
九世仇堪报①，  
十年愿未违。  
辽宫②昔时燕，  
今向汉家③飞。  
岁晚军书急，  
行人归未归？

### 二

几载不相见，  
沧桑④又一时。  
廿年余壮志，  
千里寄新诗。  
慷慨思投笔，  
艰难未去师。  
何当⑤驱漠北⑥，  
遍树汉家旗。

1913年4月1日

《言治》第1期

\* 这两首五言律诗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言治》月刊创刊号，写作时间疑为一九一一年末或一九一二年初，即辛亥年的岁末。诗中表现了作者在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时的欢乐情绪和他的革命热情。同一期刊物上还发表了作者相继撰写的《隐忧篇》、《大哀篇》两文，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深表不满。他在《大哀篇》里悲愤交集地说：“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吾唯哀吾民而已矣，尚奚言！”可见他在《岁晚寄友》里所流露的欢乐情绪也不过如昙花一现。这时沙俄趁辛亥革命、中国处在动乱的时机，在北方边疆唆使外蒙独立，发生了边疆战争。

- ① 九世仇堪报：据《史记》卷三十三记载，春秋时，齐襄公为其相隔九世的祖上哀公报仇，灭了纪国。因为纪侯曾在周夷王面前讲哀公的坏话，周夷王遂烹杀哀公。
- ② 辽宫：清朝未入关前，努尔哈齐建都沈阳，称为盛京。辽宫本是盛京的王宫，这里是说清王朝的皇宫。
- ③ 汉家：古代指汉人、汉朝，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辛亥革命时期，汉、满之争十分激烈，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强烈愿望。辽宫的燕子“今向汉家飞”，说明满清王朝已经覆灭，诗末“遍树汉家旗”，当指作者渴望抵抗企图割据我国的外来侵略，由中国人民统一祖国。
- ④ 沧桑：沧海桑田的合称。《神仙传》：麻姑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后以沧海桑田喻世事变化很大。
- ⑤ 何当：何时。
- ⑥ 漠北：当时指贝加尔湖一带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作者在末两句诗里表现了当时在辛亥革命胜利声中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强烈的爱国思想。帝俄当时企图入侵我国的情况，参看《筱觞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一诗的题解。

## 吊 圆 明 园 故 址\* (二首)

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岗，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峙于荒烟蔓草间，欷歔凭吊，感慨系之。

### 一

圆明两度昆明劫①，  
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  
残灰犹共晚烟飞。

### 二

玉阙琼楼②委③碧埃④，  
兽蹄鸟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宫人老，  
空向蒿莱拨劫灰。

1913年11月1日

《言治》第6期

- 
-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言治》月刊第六期又以《筑声剑影楼诗》为题，发表了《吊回塘园》、《咏玉泉》、《有感》、《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等一组诗。《吊圆明园故址》与下一首《咏玉泉》，题目为编者所加，原题改作小序。圆明园遗址，在今北京郊区海淀北的一片平原上，原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修建的一个离宫，包括最初兴建的圆明园与后来扩建的长春园、绮春园，占地五千多亩，外围长达二十华里，习惯上都称圆明园。一八六〇年英法侵略军和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两度纵火焚烧和洗劫，使圆明园变为一片废墟。

- ① 昆明劫：《高僧传》：“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灰洞烧，此灰是也。’”昆明池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
- ② 玉阙琼楼：原指仙人所居的宫殿，郭璞《游仙诗》：“翘首攀金梯，飞步登玉阙。”苏轼《水调歌头》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后泛指伟丽的宫殿。
- ③ 委：托付，这里通“萎”，含有衰败、坍塌的意思。
- ④ 碧埃：碧绿的草地。

## 咏 玉 泉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贯通三海禁城等处<sup>①</sup>，皆溯源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  
阿房<sup>②</sup>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  
耗尽民膏是此声！

1913年11月1日

《言治》第6期

---

① 玉泉：泉水名。在北京西郊玉泉山。泉水流下山来，经颐和园，进入北京市故宫所在地的禁城及三海。

② 阿房：秦始皇修建的阿房宫。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阿房村。唐代诗人杜牧作《阿房宫赋》，描绘阿房宫规模宏伟瑰丽，说它“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土。三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而且揭露封建帝王不惜民财，“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这里将清末慈禧太后祝寿时修筑的颐和园以阿房宫相比。

## 有 感

愁尽人天唤奈何，  
高楼风雨黯<sup>①</sup>笙歌。  
伤心人有伤心泪，  
洒向红颜<sup>②</sup>薄命多。

1913年11月1日

《言治》第6期

---

① 黯：暗淡，言歌声渐渐停歇下来。

② 红颜：美女。

##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 忆天问军中\*

班生<sup>①</sup>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sup>②</sup>。  
去国徒深屈子<sup>③</sup>恨，  
靖氛<sup>④</sup>空说岳家军<sup>⑤</sup>。  
风尘<sup>⑥</sup>河北<sup>⑦</sup>音书断，  
戎马江南羽檄<sup>⑧</sup>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  
连天烽火独思君。

1913年11月1日

《言治》第6期

- 
- 一九一三年九月，作者赴日本留学。这时，南方各省纷纷宣布参加在孙中山领导下的讨袁运动，被称为“二次革命”，但很快就为袁世凯的南下大军所扑灭。所以题中有“南天动乱”，诗中又有“无限伤心劫后话”的话。

① 班生：指东汉班超。班超曾投笔从戎。这里以班生喻从军的友人。

② 曛：日暮。

③ 屈子：即屈原，《离骚》的作者，战国时楚人，做过三闾大夫。因遭谗言去职，被流放江南。后投汨罗江而死。戴叔伦《三闾庙诗》：“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作者以屈子自喻，描述临出国的爱国心情。

④ 靖氛：平定妖氛。当指讨袁。

⑤ 岳家军：南宋初年，岳飞的抗金部队，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敌多畏怖，说：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里是指讨袁军。“靖氛空说岳家军”，作者因讨袁军的失败而深深感到失望。

- ⑥ 风尘：战乱。因兵马所至，风驰尘扬，故云。
- ⑦ 河北，泛指北方。
- ⑧ 羽檄：军书，也称羽书。



## 太平洋舟中咏感\*

乙卯残腊<sup>①</sup>，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sup>②</sup>，  
在太平洋舟中作。

浩淼水东流，  
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sup>③</sup>，  
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sup>④</sup>，  
一夫<sup>⑤</sup>终窃国；  
黯黯五彩旗<sup>⑥</sup>，  
自兹少颜色。  
逆贼稽征讨<sup>⑦</sup>，  
机势今已熟。  
义声起云南<sup>⑧</sup>，  
鼓鞞动河北。  
绝域逢知交，  
慷慨道胸臆。  
中宵出江户，  
明月临幽黑。

鹏鸟<sup>⑨</sup>将图南，  
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  
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  
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  
机失不可得。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期

---

\* 《太平洋舟中咏感》及以下的《神州风雨楼》、《送别相无》等三首诗的题目是编者加的，原标题改作小序。

- ① 乙卯残腊：乙卯，公历一九一五年。按阴历，十二月为腊月，乙卯残腊是一九一五年阴历腊月底。作者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哭沈汉卿君》一文中说：“吾去年岁首，即往上海一次，兼周而归东京。”据此可知这首诗是一九一六年一月作者从日本横滨回上海途中在轮船上的。
- ② 春申：上海。今黄浦江，又名春申江，相传为战国楚春申君黄歇所凿，故名。上海地处春申江头，因此也名春申，简称申。
- ③ 板荡：“板”、“荡”，是《诗经》大雅中的两篇诗名，内容是叹周厉王时代的世乱的，后称世乱为“板荡”。这里是说中国当时在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下风雨飘摇。
- ④ 八表同昏：举国陷于黑暗世界。八表，犹言八方。
- ⑤ 一夫：指袁世凯。
- ⑥ 五彩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以后，民国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条纹，以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 ⑦ 逆贼稽征讨：逆贼，指袁世凯。稽，议。
- ⑧ 义声起云南：指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义讨袁。
- ⑨ 鹏鸟将图南：鹏鸟，传说中的大鸟。《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鹏鸟振翅高飞，飞往南方，意为奋发有为。

## 神州风雨楼

丙辰<sup>①</sup>春，再至江户，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sup>②</sup>，  
高筑神州风雨楼。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期

---

① 丙辰，一九一六年。

② 黄龙府：宋代金人都城（在今吉林省农安县）。南宋初，金人占领黄河流域，岳飞在抗金中途听到金将韩常愿意以五万人归附，大喜，对部下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后以黄龙府喻为敌人的老巢。

## 送别相无

幼蕙行未久，相无又去江户，作此送之。

逢君已恨晚，  
此别又如何？  
大陆龙蛇起①，  
江南风雨多②。  
斯民正憔悴，  
吾辈尚蹉跎。  
故国③一回首，  
谁堪返太和④！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期

- 
- ① 龙蛇起：龙蛇，杰出的人。《左传》：“深山大泽，实出龙蛇。”这里是说，祖国各地的讨袁大军相继而起。
- ② 江南风雨多：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响应讨袁运动。
- ③ 故国：指祖国。
- ④ 返太和：使中国获得太平。

## 答 霍 侶 白\*

一轮舟共一轮月，  
万里人怀万里愁。  
正是黯然回首处，  
春申江上独登楼。

---

\* 霍侶白，广东人，作者留学日本时的友人，曾与作者办《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初夏，作者由日本回国参加反袁运动，临行前夕，霍赠他一诗云：

当年相遇即相知，  
抵掌谈心恨见迟。  
今夕离别却无语，  
独吟风雨一楼诗。

当大钊同志途中到长崎时，给霍寄了一张明信片，说：“濒行蒙惠佳作，但对此好山好水，诗句却迟迟不来，盖由心绪恶劣所致。昨对泽民（张泽民——引者）言：‘古人爱屋及乌，今则憎人及物，此心绪所以恶劣也。俟抵沪后当再奉酬。’”在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又以明信片，往东京寄出了这首诗。题为编者所加。

## 筱觞寿山将往阿尔泰， 诗以赠之\*

一声笳咽一腔泪，  
万里城①环万仞山②。  
最是多情今夜月，  
共君犹自出边关③。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期

---

\* 筱觞、寿山均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筱觞，原名尼鼎云，河北任县尼家庄人。寿山，原名刘锡龄，字绶珊，又名寿山，河北滦县古冶王辇庄人。辛亥革命期间，沙俄图谋趁机入侵我国。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在派军支持下导演了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外蒙独立的丑剧。一九一二年八月，发生科布多事件，在沙俄唆使下，蒙军占领科布多，驱逐我军出境。随后，一九一三年，在俄国军事及各方面支援下，继续进犯内蒙。当年七月，在科布多边区与阿尔泰边区交界上的察罕·东肯附近，与我驻军发生激战，我军失利。帝俄派兵进驻科布多。这年夏天，大钊同志与其友筱觞、寿山等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北京政府陆军总部派尼鼎云、刘锡龄等押运一批军火送往科布多，是用大车运送的，途经潼关、甘肃，出嘉峪关，经过一年多时间，到达哈密。大钊同志赠友人的这首绝句以及下一首《前意未尽更赋一律》，当是一九一三年秋天写的。

① 万里城：指万里长城。

② 万仞山：古代周尺以八尺为一仞。万仞山，极高的山。

③ 边关：当指嘉峪关，自古为去西部边疆地区的交通要道。

##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策马玉门关，  
不为儿女颜。  
悲歌辞易水<sup>①</sup>，  
壮士出天山<sup>②</sup>。  
白草千层雪，  
黄河九曲湾。  
遥知断肠处，  
应有雁飞还。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期

---

① 悲歌辞易水：《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去秦国谋刺秦始皇，临行太子丹及随从到易水河边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歌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② 天山：亚洲中部的大山系，横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西端伸入苏联中亚细亚。

## 复辟变后寄友人

复辟<sup>①</sup>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sup>②</sup>  
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sup>③</sup>，  
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sup>④</sup>空醉梦，  
十年潦倒<sup>⑤</sup>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别万山无语句<sup>⑥</sup>，  
只应共泛五湖舟<sup>⑦</sup>。

1918年7月1日

《言治季刊》第3期

---

① 复辟：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拥立溥仪在北京复辟帝制事件。

② 惺亚：白坚武又名惺亚，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河北交河县泊镇人，曾与大钊同志过从甚密。据白坚武《惺菴日记》原稿记载，民国六年八月六日收到守常从沪来函，并寄见怀诗一首，日记中也抄有这首诗，并评论说：“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白当时在江西督军李纯部下任顾问兼书记处秘书，后又在吴佩孚手下当幕僚。“二七”惨案后，大钊同志与之绝交。



- ③ 英雄淘尽大江流：为祖国流血奋斗的英雄们不断涌现，正如长江后浪催前浪一样，滔滔奔流不息。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 ④ 声华：声誉。白居易《晏坐闲吟》：“昔为京洛声华客，今作江南潦倒翁。”潦倒翁，一作“老倒翁”。
- ⑤ 潦倒：失意、不得志。
- ⑥ 忆别万山无语句：万山，万重山。作者借写景抒怀，以万山比喻重重艰难险阻，说回忆过去历尽艰险，而今天结果如此，只有告别，无话可说。
- ⑦ 只应共泛五湖舟：只有一道去浪迹江湖。范蠡泛舟五湖事，参看《登楼杂感》注⑤。

## 山中即景\* (三首)

### 一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 二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 三

一年一度果树红，  
一年一度果花落；  
借问今朝摘果人，  
忆否春雨梨花白？

- 
- 这首诗是一九一九年夏天作者在昌黎五峰山写的，刘半农根据所藏原稿收入昆云堂影印的《初期白话诗稿》，列为第一首。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发表了两节，与刘半农所发表的原稿墨迹一致。白坚武在《怪菴日记》原稿中记了这首《山中即景》，内容则略有出入。白在八月十九日日记中载：“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为记之；

《山中即景》：（一）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二）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外。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三）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

据此可知这首诗是在这年八月间写的。看来大钊同志寄给白坚武的是诗的初稿，后来发表时作了修改。第三首则从没有发表过。这首诗是从白坚武的日记里发现的。据李葆华同志回忆，他随父亲在昌黎五峰山时，韩昌黎祠有时就在云中，确是“人在白云中”。院里到处是白云，伸手可以把云彩抓住。他还记得父亲常到附近半山的果园里去，找果农闲谈。

## 悲 犬\*

我初入山，  
犬狂吠门前；  
我既入山，  
犬摇尾乞怜；  
犬战犬哉！  
何前倨①而后谦②！

---

\* 这首诗是从白坚武《惺菴日记》原稿中发现的。在白坚武民国八年八月十九日日记中，同《山中即景》一块抄有大钊同志寄给白的这首诗。诗里所讲的“入山”，就是来到昌黎五峰山的韩昌黎祠。

① 倨：傲慢。

② 谦：音廉，与诌通用，这里是谄媚的意思。

## 岭上的羊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  
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  
看呵！岭上的羊，白的掺着黑的。  
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  
羊啊！我细听你的声音里：  
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带着战栗，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  
天天只傍着那山水，  
吃些草叶或草子；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  
我不怕你，而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

1919年9月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 山 峰

一个山峰头，  
长着几棵松树。  
片片的白云，  
有时把它遮住。  
白云飞来便去，  
山峰依然露出。

## 山 中 落 雨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失了归路。

1919年9月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 欢迎陈独秀出狱\*

###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sup>①</sup>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②！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1919年11月1日  
《新青年》第6卷第6号

- 
- \*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大钊同志与陈独秀、高一涵等数人到城南游艺园分头散发传单，陈独秀被捕。同年九月出狱。十一月，大钊同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了这首诗。同一期还有刘半农写陈独秀出狱的《D——！》。翌年一月，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发表了一首《答半农的D——诗》。在这三首白话诗里，唯独大钊同志的诗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并描绘了五四运动后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和他对革



命真理的坚定信念。

- ① 只眼：陈独秀的笔名。
- ② 我们手创的报纸，指《每周评论》。陈独秀于九月出狱时，《每周评论》已于八月三十一日被反动政府查封，所以诗中有“只眼”复明“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的话。

## 歌谣选\* (三首)

### 一

瘦马拉搭脖，糠饭秕子活。

直隶乐亭一带，地主多赴关外经商，农事则佣工为之。此谣乃讽地主待遇工人不可太苛，言地主以糠饭食工人，则工人所作之活，亦秕子之类。

### 二

春鳊秋鳙，白眼割谷。

乐亭滨海，产鱼，鳊、鳙、白眼皆鱼名。春时最肥者为鳊，秋时为鳙，割谷时则为白眼。

### 三

不剃辫子没法混，剃了辫子怕张顺。

入民国来，乡间甚传此谣。张顺乃张勋之讹。

1918年10月3日至6日

《北京大学日刊》

---

\* 这三首乐亭谣谚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北京大学日刊》，由刘复选订，原刊署明：“文科教授刘复编订，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来稿。”

## 谚 语(二则)

一

雁叫一声，穷汉子一惊。

(乐亭)

二

高粱晒红米，鳞膀<sup>①</sup>不给你。

(乐亭)

1919年9月28日

《新生活》第6期

---

① 鳞膀：鱼名。乐亭海边，秋天盛产鳞膀，味最鲜美，故云“鳞膀不给你”。

第 二 辑

随 感 录



## 北京的“华严”

北京有个净业湖，是梁巨川氏自杀的地方。不几天又有一位吴梓箴，也在那里自杀。我听得这般事情，就联想起那日本日光山上的“华严”瀑。明治三十六年，有一位京都帝国大学生叫藤村操的，因为人生不可解，起了哲学上的怀疑，跑到瀑边，在树上题了“岩头之感”几个字，就投入那瀑的冷净的怀中了。从此日本青年，因为这件事的暗示模仿，你投入浅间山的喷火口，他死在富士山巅。他们的理由，都是厌世悲观，那投入“华严”的，更是不计其数了。把个华严做成一个唯一的死所，人都叫它为“死之瀑”。这净业湖中的自杀者，若是联接不绝，净业湖也要成了“死之湖”，就是北京的“华严”了。我们把两处的自杀者比较起来，有的是青年，有的是老人，有的是为人生问题而死的，有的是为古人传说而死的。其间虽大不同，我说这种人对于他自己的生命，都比那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

## 新自杀季节

据社会统计学家说，每年五、六、七、八月，是自杀季节，自杀的现象，多发生在这四个月中。近来生活难的结果，年关也成了一种自杀季节。北京这个地方，到了冬天，那些因不耐冻饿自杀的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碰着一位新闻记者先生偶然大发慈悲，登出一二，大家也是不加批评、不加注意的。有人说自杀是壮烈的行为。他们又有什么壮烈？有人说自杀是罪恶的行为。他们又有什么罪恶？以我看来，社会上发生了自杀的现象，总是社会制度有些缺陷。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它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为了免自己或他人的迷惑麻烦，有处决自己生命的自由。

## 面包问题

欧战停止以后，日本大阪的工厂闭锁者日有所闻。据经济学者的推测，到了三月间，才是失业劳工的生死关头。又据东京帝大的森本教授在去年二十二日日本社会政策大会的报告，日本五口的人家，最少生活费，一年也要二千七十六元。有这样收入的，百户中不过二户。其余都是食不能充饥，衣不能御寒，老不能养贍，子弟不能教育。贫富的悬隔，一天甚似一天，大有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样子。一般武人，却是一日跋扈一日，压迫白国的平民，还在不算，更想和别国的武人勾结，害别国的平民。现在米价又涨了。这面包问题不解决，换几个内阁，也是得倒。倒几个内阁，还是不了。因为今日政治问题，就是面包问题。照这样看起来，我很替我们邻邦担忧。

以上 1919 年 1 月 19 日《每周评论》第 5 号



## 政 客

主客是对待的名辞，既有政客必有政主。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混一口饭吃，看不见主人影儿。请问这种客吃的饭是那个款待他们的？共和国的政主到底是谁？

## 过激乎？过惰乎？

人类所以总是这不长进的样子，实因社会上有一种力量作怪，就是惰性(Inertia)。他的力量，实在比进步的力量大的多。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因为他是在惰性空气包围的中间。其实世间只有过惰，那有过激？不说是自己过惰，却说人家过激，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 乡愿与大盗

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

## 放弃特殊地位

日本“万朝报”主张日本应该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真是明白话。这特殊地位，实在是要不得的东西。德国要想在世界上得一个特殊地位，惹起了一场世界大战。资本家、地主要想在产业界占特殊地位，惹起了社会革命。中国有一派人要想在中国保持特殊地位，惹起了南北纷争。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就为日本自身计，也是放弃的好。

以上1919年1月26日《每周评论》第6号

## 秘密外交

俄人提倡世界革命，揭出三大纲领：一，不要皇帝；二，不要常备军；三，不要秘密外交。美国威总统提倡国际大同盟，也主张禁止秘密外交。因为世间一切罪恶，都包藏在秘密的中间，罪恶是秘密的内容，秘密是罪恶的渊藪。我们若想禁绝罪恶，必须揭破秘密。现在战局已终，军事关系已经消灭，中日两国的人民，应该要求两国的政府立时将从前所立的密约在平和会议公布废止。不可听两国的军阀在那秘密里作鬼，惹起世界的猜疑，留下扰乱和平的种子。

1919年2月16日《每周评论》第9号

## 死 动

日本的浪人会，专去逆着世界大势作那拥护国体的活动。彼邦酷评家说他们是“死动”，不是活动。我想这种“死动”，几乎遍中国都是。不是拜倒在偶像之前鬼混，就是倒行逆施往死路走。人家的社会，还有大部分“人的活动”，几个顽冥的“死动”，不至永远成了黑暗的鬼世界。像我们的社会，“人的活动”，很是稀少。起初还是“死动”，后来恐怕就剩下了一个“死”，连“动”也不会“动”了。

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号

## 普 通 选 举

世界上未行普通选举的国，只有我们中国和日本、土耳其。日本现在普通选举的声音，几乎震动了三岛。上杉慎吉也不倡他那凯撒复辟论了，德富苏峰也不说他那贫国强兵论了，大石正己也暂且不提他那大陆膨胀主义了，却都来鼓吹普通选举。回头看看我们中国！你说武力统一，他说武力护法。那有人提到这个问题！那能够提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

以上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号

## 光明与黑暗

听说北京有位艺术家，每日早晨，登城眺望，到了晌午以后，就闭户不出了。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早晨看见的，不是担菜进城的劳动者，便是携书入校的小学生。就是那推粪的工人，也有一种清白的趣味，可以掩住那粪溺的污秽。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他们的生活，都是人的生活。他们大概都是生产者，都能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到了午间，那些不生产只消费的恶魔们，强盗们，一个个都出现了。你驾着呜呜的汽车，他带着凶赳赳的侍卫，就把人世界变成鬼世界了。这也是光明与黑暗两界的区分。

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号

## 强国主义

大战终结，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种名辞，都随着德意志的军阀丧失了他的运命。我们东方的德意志军阀崇拜者，又来讲什么“强国主义”。这个东西，恐怕又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相，又是破坏世界平和的种子！

1919年3月16日《每周评论》第13号

## 混充牌号

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他的牌号的，纷纷四起。王麻子的刀剪好用，什么汪麻子、旺麻子、真王麻子、老王麻子，闹个不清。稻香村东西好吃，什么稻香春、新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闹个不清。茶庄有王正大、汪正大的混杂，也是这个道理。“民本主义”的话，在日本很流行，什么民本的军国主义、君主民本主义，闹个不清。卖药的广告，也说“民本主义”。“社会主义”流行，就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出现。社会上有一二清流学者，很得大众的信仰，一班官僚帝孽，就想处处借他的名字作招牌。这都是“混充牌号”。

## 统一癖

中国人说到国家组织，最怕联邦妨害了统一。说到道德，最愿把孔子拿来定为国教，去统一人心。日本人也是常讲国民思想统一，教育划一。去年全国教育会议，又有人提出人心归向统一案，敬神、崇祖，是他们统一人心的手段。统一！统一！真是东洋人的通癖了。可是中国人的威信统一，武力统一，已经把国家弄得七零八糟，不可收拾。日本人的神祖统一，文教统一，又得什么样的结果？

## 白人阀

“打破白人阀！”“打破白人阀！”这种声音，常从东方吹来。白人如果在有色人种中作了贵族阀，那有色人种自然应该对白人起一种反抗。但是首倡“打破白人阀”的黄人，必须先把自己在黄人中占的贵族地位抛弃，然后才有讲话的资格。

以上 1919 年 4 月 6 日《每周评论》第 16 号

## 解放后的人人

放过足的女子，再不愿缠足了。剪过辫的男子，再不愿留辫了。享过自由幸福的人民，再不愿作专制皇帝的奴隶了。作惯活文学的人，再不愿作死文章了。

1919年4月13日《每周评论》第17号

## 宰猪场式的政治

日本人说他们的政治，是动物园式的政治。把人民用铁栅栏牢牢的关住，给他们一片肉吃，说是什么“温情主义”。我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

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第18号



## 太上政府

呵！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怵”“不怵”。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呵！你是用惯了那年五月七日的哀的美敦书。呵！我如今才晓得你是要作我们的太上政府。

## 第五师军人

《益世报》载近畿陆军第五师步、马、炮、工、辎全师目兵胡龙舒等一万另另八十名通电，“除国贼，……御外侮，……愿以铁血为后盾。”像这种爱国自卫的精神，断断不可以拿干涉政治的话责备他们。

## 黑暗的东方

天明了，曙光现了，光明的境界，没有强盗恶魔们立足之地了，一个一个的都跑到黑暗的东方来。所以边疆上就有谢米诺夫、霍尔瓦特这一流人扰乱治安，内地就有一种外国的外交官替崇拜强权的国家政府捕拿国事犯，摧残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呵！好了！我只替你们祝福。祝你们永远不要回归你们那光明的故土，祝你们永远有个黑暗的东方作你们的逋逃藪。

以上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

## 牢狱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象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 不要再说吉祥话

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这正是我们的大罪。

## 新华门前的血泪

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

## 改 造

交通部的大门，因为曹汝霖被学生们攻击去职，部员都说他的方向不利，请堪輿家为之改造。海军部的围墙，也因为有堪輿家说他不吉利故近来各处舰队时起风波，听说也要改造。我说中国近年南北争哄，民生困苦，到这步田地，也是因为一种大门——阙——建立的不好，也应该改造。可惜我又不是堪輿家，没有人信我的话！

## 哭 的 笑 的

今天（二十八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

## 威先生感慨如何？

昨日（二十七日）巴黎的白宫宴会，法总统举觞祝贺威尔逊及各代表。我不知那位威先生在那庆祝伪平和的席上，如何下咽，感慨如何？

以上 1919 年 6 月 29 日《每周评论》第 28 号

## 赤色的世界

今天一个消息，说某处创了一个劳农共和国。明天一个消息，说某国立了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他们的旗，都是“赤旗”。他们的兵，都是“赤军”。这种的革命，人都叫作“赤革命”。这样演下去，恐怕世界都要变成赤色。请问这个赤色，是什么东西染成的？

## 最危险的东西

我常和友人在北京市里步行，每过那颓废墙下，很觉可怕。怕它倒了，把行路的人活活压死。请问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

## 光明权

北京市民对于电灯公司颇不满意，说电光不足，很妨害市民的“光明权”。嗟！在这黑暗世界中任是生活的那一方面，一线的光明，都没有希望。我们当真要求光明权，应该不止对于电灯公司。

## 我 与 世 界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以上 1919 年 7 月 6 日《每周评论》第 29 号

## 忠 告 黎 明 会

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怪不得堺利彦一辈主撰的《新社会》，老早就劝他们于黎明日本以前，先要把自己的脑子黎明一下。我也劝黎明会中的真正黎明分子，先要在黎明会中作一回黎明运动。

## 真正的解放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 战栗

美国出了怪炸弹案，我听了很替他们战栗。现在日本又跟着出了这样的情事，并且听说主犯，是现在的高等警官。哎呀！高等警官，不是维持治安的么？现在也来作这种危险的运动，这真算是大变人心了！真正令人战栗！



## 灰色的中国

人说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我说无论是白是赤，总在本质稍有光明的国家，才能发现这样鲜明的颜色。像我们中国这样黑暗的国家，对于世界革命的潮流，不问它是白是赤，一味作盲目的抗拒。等到潮流逼进了门，大家仍是昏昏沉沉的在黑尘中乱滚，白革命会变成灰色，赤革命会变成黑色。辛亥以后的军阀政客，已竟把个中国弄成灰色了。盼望以后你们不要把中国再弄成黑色才好。

## 万恶之原

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一个人要是有点知识聪明，一般的亲族戚属，总是希望他去做官僚式的强盗。牺牲了他一个人，供他们大家的荒淫作乐。这样子待人，分明是莫大的冤仇，那里有丝毫的亲义！

##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以上 1919 年 7 月 13 日《每周评论》第 30 号

## 日本人听者

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在东京所开第三回人类的差别撤废期成大会演说，有几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在亚细亚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在亚细亚内有受轻蔑的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能得人尊敬。诸君真愿得世界的尊敬，诸君不可不使其他亚细亚诸国，也为可被尊敬的国。而为他日一切的亚细亚诸国得自由，诸君子不可不先作最初的解放者。因为束缚他人同时自己也受束缚。”药石之言，日本人听者！

1919 年 7 月 20 日《每周评论》第 31 号

## 赤 色 青 色

世界上的军阀财阀怕赤（赤军的赤）色，中国现在的官僚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色，这都是他们眼里的危险颜色。

## 难 兄 难 弟

中国的元老，要亲到大成殿磕头，日本的元老，想在东三省建立一座伊势大神宫。中国政府忙办文、法官考试，日本政府忙设国民文艺会。都是为防止他们眼里口里的过激思想。真是难兄难弟的国家。

## 秘 密……杀 人

中国政府什么事都秘密。现在近畿一带瘟疫流行，死亡很多，官吏都严守秘密，听其自然传染。唉！这秘密二字下，不知又添了多少冤魂！

瘟疫是自然的恶呢，还是人为的恶呢？很是一个疑问。要说是自然的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

## 大笑话

听说政府近来很厌烦“联合会”这几个字，所以图书馆联合会教育部立案，也被批驳了。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以上 1919 年 9 月 28 日《新生活》第 6 期

## 新鲜名词

近来出了许多新鲜名词。例如日本的“帝国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社会主义”，中国某君的“军国民教育社会主义”，德国新组织的“共和帝国”都是。

## 圣人与皇帝

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拚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可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

以上 1919 年 10 月 5 日《新生活》第 7 期

## 黑暗运动

前年有一位元老，半夜三更叩清宫的大门，拉出小宣统来，演了一出滑稽剧。今年又有一位元老，半夜三更跑到大成殿里磕头。这都是支那元老黑暗运动！

##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民国建了八年了。《新生活》出了八期了。用《新生活》的第八期祝民国八年的国庆，两数相合，这样奇巧，足见《新生活》的命运，便是民国的命运，民国的纪元，便是《新生活》的纪元。

民国的国庆日，也叫双十节。凑巧《新生活》的封面上印着一个连环式的双十字。我们就拿这个连环式的双十字，祝我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年年岁岁，循环递嬗，永世相承以至于无穷。

在《新生活》连环式的双十字上，有四大精神，就是博爱、自由、平等、牺牲。这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建立民国的基础。

我们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们相信我能爱人，人必爱我，故爱人即所以爱我。

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国，爱世界的人类，都是这一个“爱”。爱力愈大，所爱愈博。充满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

爱自己的同胞一般，断断不可把这个“爱”字关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总该知道爱世界人类的全体比爱一部分人更要紧，总该知道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

人间共同生活的关系既是以爱为基础，那么人类相互之间，自然要各尊重各的个性。各自的个性，不受外界的侵害、束缚、压制、剥夺，便是自由。真实的自由，都是建立在“爱”字上的。

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在“爱”的水平线上，人人都立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悬异的关系。

这样说来，自由、平等的生活，都是以爱为基础的生活。

实行这个“爱”字，必须有牺牲的精神。爱人道，便该为人道牺牲。爱真理，便该为真理牺牲。爱自由，便该为自由牺牲。爱平等，便该为平等牺牲。爱共和，便该为共和牺牲。爱的方法，便是牺牲，牺牲的精神，便是爱。

有一种美景物美境域在我们眼前，我们不可把他拿来作我们的牺牲。因为牺牲了他，决不是爱了他。我们当真爱他，应该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他的美善，才能真为我们所享受，所获得。爱的法则，即是牺牲的法则。

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民国，究竟从何处来的？是由先烈们博爱的精神创造来的，是用先烈们为自由平等而牺牲的血培植成的。我们纪念双十节，应该纪念《新生活》上的连环双十字。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是不断的创造。《新生活》上的双十字，是无尽的循环。愿民国的双十节和这双十字一样循环无尽！愿今年双十节看《新生活》的人，都永远抱着《新生活》封面连环双十字上的四大精神！——博爱，自由，平等，牺牲！去不断的创造新生活！

## 文 治 国 庆

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做邪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 面 包 运 动

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

以上 1919 年 10 月 12 日《新生活》第 8 期

## 时代的落伍者

时代是最残酷的东西，时代的落伍者是最可怜的人。时代的进行像电光一样的快，人间的思想总是在过去和现在上恋着。这个中间就发生了许多的落伍者。他们的生活与时代不相应，就发生了许多的怨恨，怨恨时代，怨恨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学、艺术及至人身。唉！他们实在是悲哀苦痛，可怜呵。

## 应考的遗传性

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是甚么残酷的制度，把我们的民族性弄成这样的不自然！

以上 1919 年 10 月 26 日《新生活》第 10 期



## 时间浪费者

中国人都是时间浪费者，都是生命牺牲者。若叫中国人牺牲他的生命，他是万万不肯的。可是他天天都在牺牲，终身都在牺牲，却一点也不爱惜。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我们每日生活的时间，平均总是自己浪费了一半。别人为我浪费了一半。在我自己浪费时间的时候，还要浪费些别人的时间。这样核算起来，全社会浪费的时间该有多少？全民族的生命牺牲的该有多少？唉！中国人的生命真贱呵！

##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惹得主张调和的人天天忙，天天担忧，天天夹在新旧之间，受些闲气，结果还是两不讨好。我劝主张调和的人歇歇罢！那进行不息的时代，才有调和的真本领呢！戊戌前后的康有为，人都嫌他太新，可是时代变了，能把他的弄旧。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请他走开。

主张调和的人自问若没有这么大的本领，请把这件功业，让给时代罢。

## 人与禽兽

人类的妄自尊大，真是讨厌，动不动拿禽兽来形容他的高超。这种非科学的态度，口吻，实在不对。以我所知，禽兽里比人类德性优良的很多，人类比不上这些优良禽兽的更多。现在我们作伪的黑幕，已经揭穿了。不要再拿那些良善的生物形容我们自己的优越欺骗同类了。

## 参战军呢？

宣统年的禁卫军替溥仪守门去了。洪宪朝的拱卫军替袁世凯守墓去了。参战军呢？将来不知又作什么去？

以上 1919 年 11 月 2 日《新生活》第 11 期

## 谁是“有实力”者？

有人说“胜利终归有实力者”，这话诚然不错。可是到底谁是“有实力者”呢？是那些有钱的人么？若是工人不甘作他的奴隶了，他那“实力”又在那里？是那些带兵的人么？若是兵士不愿听他的指挥了，他那“实力”又在那里？

## 牺 牲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 妨 害 治 安

“妨害治安！”“妨害治安！”在这句话的声音里，常常有言论

出版的自由被剥夺了，有自由公民被囚禁了。但我要问，这个“治安”，究竟是谁的“治安”？妨害大多数“治安”的，到底是谁？我们大多数人的“治安”，并不太奢，并不过分，也只求个穿衣吃饭而已。

我们“治安”范围，减到穿衣吃饭，应该无可再减了。你们还不答应，还要把我们穿衣吃饭的“治安”都牺牲了，供你们少数人奢侈淫乐的“治安”。你们拍拍良心，到底是谁妨害谁的“治安”？

##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

文官考试，听说三千元可以买得一个。你愿得官，我愿得钱，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也算是一个公平买卖，我们没得可说。独有那应考诸君的神圣人格，被蹂躏到这步田地，我实在为他们抱憾！

## 掠夺物品的遗迹

一群告化子拥着一顶红轿，帘幕封得紧紧的，几个人抬着飞跑，好象掠夺来的物品一样。这是中国结婚的仪式！这是中国女子的人格！

## 死

胆小的人总是怕死，卑劣无聊的人总是盼反对他的人死，咒反对他的人死，阴贼阴狠的人总是想法把反对他的人置于死地。死是什么东西？死是这样可怕的么？死是这样有用的么？罗素说过，“你可以杀一个艺术家，或思想家，但你不能得他的艺术或思想。你可以因为一个人爱他的同类把他置于死地，但你不能由这样的行为得到造成他的愉快的爱。”死不是那样可怕啊！置人于死，于你不是那样有用啊！造谣咒人死，更是卑劣无聊之极啊！

## 寺内死了

寺内是日本军阀的元老，他生前作的罪恶不少。用军阀的势力压服他本国的平民，用酷厉的手段虐待朝鲜的民族，最后他的内阁更与我们军阀勾结，弄得我们南北交哄，生民涂炭。而今寺内虽死，他那一把罪恶的枯骨，还在为我们军阀所凭依，这一段孽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了解！

以上 1919 年 11 月 9 日《新生活》第 12 期

## “鼓吹共产主义”

近来有很多的印刷物，被政府用“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禁止了。可是政府举行的文官考试，却出了“共产主义”的题目，给考试文官的人以大鼓吹而特鼓吹的权，我侪小民，真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感慨了！有人说那是官家的共产主义，孔子的共产主义，毫不带着危险的性质，与你们小百姓们所研究的不同。我想这话也不错。

## 联人社会

从前常听有“联邦政府”的话，近来又恍惚有“联省政府”的声音。什么名词，尽由你们去说，我总是梦想那联人社会。

## 圣裔的恤金

圣裔死了，听说政府又要发给恤金了。何以吾侪小民痛心疾首的五折票子，还没有提高一点的消息呢？

## 那里还有自由

约法上明明有言论自由，可是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约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随便被干涉，背反约法的管理印刷法可以随便颁布，邮局收下的印刷物可以随便扣留。约法上明明有书信秘密的自由，可是邮电可以随时随意派人检查。可怜中国人呵！你那里还有约法！那里还有自由！

以上 1919 年 11 月 16 日《新生活》第 13 期

## 一个自杀的青年

听说北大有位学生，在万牲园投水自沉。他的自杀的原因，是痛苦，烦闷，救国运动的积劳，境遇的困迫种种。这些都是由社会制度的缺陷暴露出来的。一个活泼泼的青年，既然承认了生命的崇高，决不愿受这卑污苦恼的生活的束缚。噫！社会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有高尚志趣的青年啊！

## 被裁的兵士

裁兵是一件好事，因为驱可怜的同胞去杀可怜的同胞，是我们最痛心的。不过我们要问：这兵究竟是谁招的？招了为甚么又要裁呢？呵！我知道了，招兵的人，现在官也到手了，财也发足了，国家的粮饷也弄空了，现在你们才知道要裁兵了。但是裁兵后兵士的生活问题，你们也曾想过没有呢？

以上 1919 年 11 月 23 日《新生活》第 14 期



## 归国的工人

海外的华工，渐渐被人家送回来了。加上被裁的兵士，人数很是不少。这一大批失业的人，骤然散布在社会里，发生甚么影响？应该怎样安插？很是一个大问题。我很盼望官僚式的政客、新闻记者先生们，破一点工夫来研究研究。不要单是摆着架子，说什么“隐忧”、“隐患”、“大乱之道”呵！

## “一心一德”

参谋部的大参案，结果是把几个告发的部员免职，并且下了一道谆谆告诫的命令，令他们“一心一德”。这个意思，就是叫全国的大官小吏，都要“一心一德”的保住官僚团体，“一心一德”的……不要揭破自家的黑幕。

##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

近日观象台有人报告说，“五星联珠”的天象，主“文运大昌”。我听了此话，联想到“五世其昌”、“文治派”两句话，就想这不分明是一幅活人造的新推背图么？他们并引据历史说，“汉高祖入关时，五星聚东井”，“宋太祖开国，五星聚奎”的故事，来证明如今五星由东南方向西北方成一直线，长约二丈，“分明是南北统一的意思”，“分明是五族共和，不可涣散的意思”，“从明年起，文运大昌，国家富强，升平约有六十年”。这些吉祥话、鬼话、梦话，我倒不愿批评他。但是我却担心着又要“入关的汉高祖”，“开国的宋太祖”啊！但是我的担心，却又不是从“天垂象”看出来的。前些日子，地上忽然铺了黄土，孔庙忽然开了大门，我就早有这个忧虑了！

## “用民政治”

“用民政治”这个名词，是山西的产物。我看见了他就以为奇怪。因为在“民治”的国家，有人出来要行“用民政治”，这不是可以令人奇怪，并且觉着危险万分。可是“用民政治”这个名词，到底是怎么解释？用民的人是谁？用民要作什么？我还是不知。我只听他们说“用民政治”就是“道德金钱主义的政治”，只知道这是山西阎锡山氏特别发明，得文治总统头奖的制品。

以上 1919 年 11 月 30 日《新生活》第 15 期

## “中日亲善”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 主 义

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锡山又来非主义。究竟如何是好呢？

以上 1919 年 12 月 7 日《新生活》第 16 期

## 什么是歪史

前几天看见文治总统出了一道命令，说某人作的《元史》是“名山盛业”，“应入正史”。我想出版自由，载在《约法》，判断一切史传文史良否，自有社会上公允的批评在。不但不劳政府当局，用法令来断定哪个是正史，哪个是歪史，而且政府当局，实在没有这个权利，如果政府硬要妄行此种权利，以文饰文治的昌运，那就无异于侵犯人民的著作自由权，出版自由权。我们不可把这事看作无关轻重的事情。

## 禁止说话

报载某督军请政府禁止白话文，广义地解释，就是禁止人说话了。秦政是一代的专制魔王，不过禁止偶语；如今并白话也要禁止，真是秦政的知己。

以上 1919 年 12 月 14 日《新生活》第 17 期

## 工 读(一)

中国乡村里有句旧话说得很好，就是“耕读传家”。现在家族制度渐就崩坏，“传家”二字已没用了，可以改为“耕读作人”。是一句绝好的新格言。

## 工 读(二)

现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都主张缩小工作的时间。从前还主张八小时，现在有主张六小时的了。在我们懒惰的人看来，多以为省出来的时间，只是为休息休息，那知人家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 互 助

中国乡村里多悬着“守望互助”的旗子，路上推的那一轮车上，也常帖着那“借光二哥”的纸条，这都是互助的精神，可惜他只在旗子上和车子上罢了！

以上 1919 年 12 月 21 日《新生活》第 18 期

## 大 联 合

“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 生 活 神 圣

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



## 物质和精神

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

以上1919年12月28日《新生活》第19期

## 又是一年

时光似箭，糊里糊涂的又是一年！我们身当这无终无始大自然的冲流的断续关头，觉得杂着些悲哀、恐惧和欢喜。我们看许多的朋友们，因为走的步数稍微慢了一点，就赶不上进步的潮流，成了过去的人了。过去的人，看着现在和将来，都和他的生活不合。现在和将来，也没有一点的幸福和希望给他，所能给他的，只是些悲哀、烦闷和苦痛。我们眼望着他们落后，受些悲哀烦闷和苦痛，也觉得十分悲痛，十分伤感。我们实在怜惜他们，精神上已成了过去的人呵！我们自己呢？也是危险的很。时间总是在我们前面走，总不停留，我们的惰性，总是想不跟着他走，一不小心，也和我们所悲痛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作了时代的落伍者，岂不可怜！岂不可怕！一年是一段生活的结束，我们应该有一回总计算。一时一刻，也不该令他零下去，我们的生活，才能和大生命联结上。不零下去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创造新生活。我今天只有欢天喜地的祝福诸位又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 忏悔的人

最可敬的，是忏悔的人。因为他是从罪恶里逃出来的，所以他对于罪恶的本体和自己堕落的生活，都有一层深严而且透彻的认识，以后任是罪恶怎样来诱惑他，他绝不会再上当了。我们对于忏悔的人十分尊敬，我们觉得忏悔的文字，十分沉痛，严肃，有光华，有声响，实在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福音。

## 哭冯国璋

冯国璋死了！我对于他的死十分哀痛！冯氏一生的成绩，遗留在世界上的，除去汉阳的焦土，新华宫的残梦，和些累赘子孙的金钱，还有什么！冯氏的人生，也是一幅很洁白的画幅，怎么糟蹋到这样！而且就是这样结局了！回头看来，我们总觉得他是空空的掷掉了一生，我们总觉得他的身后，只剩了空虚和寂寞。什么丧礼咧，国丧咧，大人先生的哀吊咧，全国公私机关的下旗咧，那里和冯国璋的真人生有丝毫的关系！我真不禁为冯国璋痛哭！更为别的冯国璋痛哭！

以上 1920 年 1 月 4 日《新生活》第 20 期

## 低级劳动者

有一种自命为绅士的人说：“智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这话很是奇怪。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 整顿学风

“五四”以来，学界的自由思想风起云涌。有些卑鄙无良的人，觉得这种思想的变动，对于他们作恶的生活不甚方便，乃妙想天开，说要整顿学风。我说：你们胆子好大，居然要整顿超越一切的思想了！好！我且看你们整顿的结果如何！

以上1920年1月18日《新生活》第22期

## 真是梦话

上海某报说，“俄国的兵力，可以当数国至二年之久”。这真是梦中的梦话。若论兵力，从前德国的兵力恐怕比现在赤军的兵力强大得多，何以终于瓦解冰消了。须知战胜强德的，绝不是协约国的兵力；战胜联军的，也不是俄罗斯的兵力。看他使日本军队退却的，不是赤军的枪弹，乃是日文的传单，就可以知道了。

## “特别体恤”

傅嶽棻复北大校长，论薪水发现事的信里，有一句“特别体恤”的话。这全和那“开导……”的话，是同一口吻。我现在奉劝傅先生！教职员的精神上知识上比你丰富的多，恐怕你老先生配不上说开导他们呢！他们劳精瘁口，教育这一班青年，很辛苦的。公家给的薪水，是他们高尚劳作的代价，是他们当然的权利。谁配对他们说“体恤”的话？国家银行发出的纸币，不能兑现，他们忍受了好几年了。他们真是“特别体恤”了你们！

## 知识阶级的胜利

“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穷。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以上1920年1月25日《新生活》第23期

## 好一对兄弟国家

中国的最高学府，闹过新旧思想的冲突；现在日本的最高学府，也闹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国的学生和警察格斗，日本的学生也和警察格斗。中国和日本，真正是兄弟国家！可是军阀的兄弟，财阀的兄弟，官僚的兄弟，曲学阿世的兄弟，他们已经亲亲热热的在那里携手或作同一步骤向同一方面走；独有那心地纯净的老农、工人、一班老实兄弟们，和那天真烂漫的青年学子，一班小兄弟们，还不知道互相携手，还在甘心作军阀学究的奴隶，反对自己的兄弟。喂！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觉悟啊！

## 山穷水尽的青年

如今各处的青年运动，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没有可走的路了。像我这种爱力不厚的人，只是替青年灰心！可是青年兄弟们，还是一点不懈，在无路的地方寻路。他们的爱力固然很厚，但是我要问大家一句，“那全是他们的责任么？”

## 精神解放

现在是解放时代了！解放的声音，天天传入我们的耳鼓。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人类活泼的生活，受惯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自然渐成一种猜忌、嫉妒、仇视、怨恨的心理。这种病的心理，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把愉快幸福的光华完全排出，完全消灭。这种生活，我们岂能长此忍受！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

以上 1920 年 2 月 8 日《新生活》第 25 期



## 红萝卜党

俄国的真正红党，说那和日本订立协约的海参威政府，是“红萝卜党”。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海参威的红党，是似是而非的，外面挂上一层红皮，里面却全是白的。这句话可算是“谗而虐”了！遥望中国境内，春风春雨中，仿佛生出一层小植物，都带着一层红皮，将来难保不是一片红萝卜！

## 乱七八糟

西南七总裁，自己捣起乱来了；恰好又有北方的八省联盟出来，和西南的残局唱对台戏。真是“不南不北”，“乱七八糟”。

以上 1920 年 5 月 13 日《新生活》第 35 期

## 变革的原动力

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今年北方旱蝗并作，灾区很广，才是初秋，已经饿殍满野了，等到明春，更不知惨到甚么样子！军阀、财阀、政客们，还是旁观坐视，依样横行。将来恐不免要造一回大变革。

## 人治与自治

近来流行一种“某省人治某省”的运动，鄂人有“鄂人治鄂”的运动，苏人有“苏人治苏”的运动，其他各省，也都有这种倾向。这总算是有点进步的动机了。可惜只脱不净“人治”的观念！为什么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省自治呢？为什么还要一个本省的人来治大众呢？

以上 1920 年 10 月 17 日《新生活》第 41 期

## 民众的新年

民国以来，改了阳历，这亦是中国人加入世界的生活的一端，我们并不反对。可是这几年来的感验，总觉得阳历新年不如阴历新年热闹，阳历新年不如阴历新年趣味浓厚；阳历新年不过是少数官场学界勉强的庆祝的虚礼，阴历新年乃真是大多数民众无老无少从心坎儿里欢欣庆祝的第一令节。从这一点看，我还是爱这民众的新年。

## 近来的倒戈运动

段祺瑞命吴佩孚攻打西南，吴佩孚却倒戈回来铲除了段系；岑春煊派陈炯明攻打福建，陈炯明却倒戈回去驱逐了桂派；唐继尧、刘显世派顾品珍、王文华等征讨四川，顾却倒戈回滇驱逐了唐继尧，王却倒戈回黔接替了刘显世；这是中国最近的倒戈运动。

## 墮落的法兰西文明

十八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受了法兰西文明的賜；连这次战后中欧以东诸国的社会改造，亦是承袭法兰西革命潮流的系统而来的。但是今日的法兰西，却是日趋黑暗；在东方的法兰西人更是倒行逆施，不惜作些摧残自由悖反人道的事。吾们不禁叹息咨嗟，回想当年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如今那里去了！

以上 1921 年 2 月 20 日《新生活》第 45 期

## 黄昏时候的哭声

北京市内，每到吃晚饭的时候，有一种极悲惨的声音送入市民的耳鼓，这就是沿街叫苦乞怜于阔绰人家的残羹剩饭的呼号。这种声浪，直喊到更深，还断断续续的不绝。一家饱暖千家哭，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能忍心下咽吧！

## 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

日昨我同三五朋辈，到宣武门外长椿寺妙光阁一带，吊祭一位死友，很深的动了些生死别离之感。归途沿着城根走，看见铁轨上横着一辆车，载着些烧残的煤渣，几个苦工带着满面的灰尘，一锹一锹的往下除，几十个贫苦的女人孩子在那里拿着小筐在灰尘里滚，争着检个一块半块的还未烧尽的煤渣。这也是北京的贫民生活的一瞥。

以上 1921 年 3 月 5 日《新生活》第 46 期

第 三 辑

散文、游记、通信



## 文 豪

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盖文之入人者深，而人之读其文者，展卷吟哦，辄神凝目炫于其文境。潜移默化，观感旋殊，虽旷世异域，有千秋万里之遥，而如置身其间，俨然其时其境也者。文字感化之伟，充其量可以化魔于道，化俗于雅，化厉于和，化凄切为幽闲，化狞恶为壮伟。三寸毛锥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则夫文豪者，诚人类之福星也矣。

长天一碧，万木葱森，人影在山，樵歌出谷，科学家视之，殫石枯木之类耳；而一经文豪之点缀，则觉清风习习，透人肌骨焉。枫叶萧萧，江滨渔火，钟声夜半，月落乌啼，科学家视之，声光变动之象耳；而一经文豪之绚绘，则幽深潇洒，万念俱息焉。尽文豪之眼界灵机，悠悠宇宙之间，形色万殊，无不可为发舒性灵，感触兴趣之资。造物者降生万物，而不能使其所生之物，各自直觉其生机之大本，局部自限，缺陷靡穷；文豪本其直觉，发为文章，俾人天物我之实相，稍能映露万一，以通消息于其间，而补造物者之缺陷，斯其有功于造物者不小也。

嗟嗟！古今文豪，其身世何多在怨悲凄苦、飘零沦落之中也。征之东西，如出一辙。文王錡居羑里，寂寞铁窗，乃演《周易》。左邱失明，乃传《春秋》。屈灵均忠爱缠绵，而蔽伤于谗，憔悴行吟，卒沈湘水，而《离骚》《楚辞》，诗亡而后，此其继音。马迁身被宫刑，填胸愤慨，《史记》之作，模式来兹。乃至少陵忧国，血



泪挥干。白也无家，佯狂弃世。放翁有种族之痛，渔洋有故国之思。他如金圣叹、李温陵之流，千古奇才，竟罹惨祸，杀其身而不足，更毁其书。中土文豪，大抵有身世悲凉，家国陵夷之痛者。而环稽西乘，唐德<sup>①</sup>系出名族，中年漂泊，流寓天涯，神曲之作，为意大利文学之警钟。杰尔邦德士<sup>②</sup>少年投笔，荷戈从军，雷邦特之战，伤中左腕，展转归途，虏于海寇，五载穷岛，困苦为奴，僧侣救之，始返故国。潜心著作，致西班牙文学得济于英、德之林。汉伯德曼<sup>③</sup>目击社会，悲惨痛心，阶级制度之不良，发愤著书，有十九世纪沙翁<sup>④</sup>之目。伊普逊<sup>⑤</sup>以贫商之子，生于北欧，寂寞荒寒，贫且不能自给，童年供使，药屋愉闲，辄事文学，大学毕业，伤祖国文学之不振，闭户著书，对兹缺陷社会，不惮口诛笔伐，文章声价，重于全欧。士多林贝尔西<sup>⑥</sup>幼时，无力求学，艰苦卓绝，著书自活，为文伤时厌世，颇极深酷凄切之致。瑞典奄无生气之文学，至是始有新机。托尔斯泰<sup>⑦</sup>生暴俄专制之下，扬博爱赤帜，为真理人道与百万豺豕，巨家阅阅，教魔权威相搏战，宣告破门，杀身之祸，几于不免，而百折不挠，著书益力，充栋汗牛，

① 唐德，今译但丁·阿里盖利(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文艺复兴前期的意大利著名诗人，著有《新生》、《神曲》。

② 杰尔邦德士，今译西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以小说《唐吉哥德先生》著名。

③ 汉伯德曼，今译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德国著名剧作家。

④ 沙翁，即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名剧作家。著有《罗米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剧本。

⑤ 伊普逊，今译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挪威名剧作家。

⑥ 士多林贝尔西，今译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名作家。

⑦ 托尔斯泰(Л.Толстой, 1828—1910)，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风行一世。高尔基<sup>①</sup>身自髫龄，备历惨苦，故其文沈痛，写社会下层之黑暗，几于声泪俱下。凡此者类皆艰苦备尝，而钜帙宏篇，独能照耀千古者也；是岂文章憎命，才华有以使之然欤？抑遭时不遇，荡析流离，余兹历劫之身，乃得优游以事文学，故其言之深长足以动人欤？嗟嗟！江山故宅，文藻空存，册籍千秋，声华不朽。吾侪生兹末世，不见古人之面影，不闻古人之效誉，徒对陈编，怅维遗迹，叹文豪之遭遇，不禁掩卷失声也矣。而于彼古人，虽躯尽骨灰，一点灵光，尚能岿然与天地终古，亦安庸吾辈之歔歔慨感为者！文豪之幸不幸，夫岂在瞬息百年之遭遇也哉！

吾尝论文豪与世运之关系，其见重于社会，不在盛世，而在衰世。盖当承平之世，物阜民康，群德日进，饮食各适其宜，作息各得其所，凡属圆颅方趾之伦，均得优游歌舞于熙皞和乐之天，击壤鼓腹之歌，曲巷流俗之谚，何莫非盛世元音，粉饰太平，文章祝颂，岂必俟夫文豪者。若夫世衰道微，国风不作，举世滔滔，相率而趋于罪恶之途，百物丧尽，民不聊生，天地有晦冥之象，群众无生人之趣，倘无文豪者应运而生，奋生花之笔，歌离黍之章，则蚩蚩者不平之诉，呼吁何从，而精神上之优美高尚之感化，忏悔之念，亦无自而发。人心来复之机既塞，惟日与禽兽暴掠强夺，相残杀以自活，其类将绝灭于天地之间也久矣。文豪之于衰世也，顾不重哉！顾不重哉！

抑吾闻之，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盖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昔人尝有“诗以穷而益工”之语矣。夫喜怒哀乐，同为心理之变象，胡以一时感性之殊，发为文章，遂有声韵工拙之别。盖尝考之。其因缘有二：一世界观，一同情心也。

<sup>①</sup> 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 1868—1936)，俄国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著有小说《母亲》、散文诗《海燕》等。

吾人幻身于兹，假现世界，形躯虽间物我，精神则源于一。故优美高尚之文章，每为世人所同好。作者执笔之际，愁思郁结，哀感万端，悄然有厌倦浊世之思，精神之所倾注，恍然若见。彼真实世界之光影，不自知其流露于声气之间。人天物我，息息相见以神，故能得宇宙之真趣，而令读之者，有优美之感。若彼欢愉之词，大抵囿于兹世，纷纭人事，幻妄尘缘，乌从窥宇宙之美，又乌能深动乎人者，此愁苦之辞易动世界观者一也。人之生也，一切苦恼，环集厥躬，匆匆百年，黄粱梦冷，无强弱，无智愚，无贫富，无贵贱，无男女，生老病死，苦海沉沦，必至末日，忏悔始有解脱之期。芸芸有众，夫谁无隐痛者，平居特未尝以示人耳。一旦读愁苦之词，哀怨之什，觉满腔热泪，洒泄无从者，作者已先我而淋漓痛切出之，安能与作者无同情之感者？骚人之怨，秋士之悲，幽恨缠绵，有展转不忍释手者矣！此愁苦之文之易动同情心者二也。

嗟嗟！世之衰也！怨气郁结，人怀厌世之悲观，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使更以愁怨之声，凄怆之语，痛其心脾，断其希望，则求一瞑而自绝者，将接踵以闻也。暴俄肆虐，民遭荼毒，一时文豪哲士，痛人生之困苦颠连，字里行间，每含厌世之彩色。凶生赞死，厌倦人间，如苏罗古夫<sup>①</sup>、阿尔慈巴塞夫<sup>②</sup>、载切夫<sup>③</sup>等，各以诡幻慑人灵魂之笔墨论“死”，致一

---

① 苏罗古夫，今译索洛古勃(Ф.Сологуб, 1863—1927)，俄国颓废派作家。

② 阿尔慈巴塞夫，今译阿志巴绥夫(М. Арцыбашев, 1878—1927)，俄国反动作家，作品充满颓废主义倾向。

③ 载切夫，今译扎依(Б. Зайце, 1881—?)，俄国印象派作家，一九二二年流亡国外。

般青年厌世，自裁者日益加多。虽文学本质，在写现代生活之思想，社会黑暗，固无与于作者，而社会之乐有文豪，固将期以救世也。徒为厌世之文，不布忏悔之旨，致社会蒙自杀流行之影响，责又岂容辞乎？

嗟呼！嗟呼！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宜知所慎择，勿蹈俄人之覆辙，度人度世，其在兹矣。

《言治》月刊第一年第六期

1913年11月1日出版

## 青 春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人事万端，那堪回首，或则幽闺善怨，或则骚客工愁。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颠颖，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贡其柔丽之姿于吾前途辽远之青年之前，而默许以独享之权利。嗟吾青年可爱之学子乎！彼美之青春，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脩能也，怜子之劳，爱子之才也；故而经年一度，展其怡和之颜，饯子于长征迈往之途，冀有以慰子之心也。纵子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圣神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而夙兴夜寐，不遑启处，亦当于千忙万迫之中，偷隙一盼，霁颜相向，领彼恋子之殷情，赠子之韶华；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饴尝青春之甘美，浹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人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

块然一躯，渺乎微矣。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其得永享青春之幸福与否，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

无尽？如其有尽，纵有彭、聃之寿，甚且与宇宙齐，亦奚能许我以常享之福？如其无尽，吾人奋其悲壮之精神，以与无尽之宇宙竞进，又何不能之有？而宇宙之果否为无尽，当问宇宙之有无初终。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于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质言之有而已矣。庄周有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云：“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夫晦朔与春秋而果为有耶，何以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而菌蛄独不知也？其果为无耶，又何以菌蛄虽不知，而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也？是有无之说，亦至无定矣。以吾人之知，小于宇宙自然之知，其年小于宇宙自然之年，而欲断空间时间不能超越之宇宙为有为无，是亦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耳！

秘观宇宙，有二相焉。由佛理言之，平等与差别也，空与色也。由哲理言之，绝对与相对也。由数理言之，有与无也。由《易》理言之，周与易也。——《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宋儒罗泌尝论之于《路史》。而金氏圣叹序《离骚经》，释之尤近精微。谓“周其体也，易其用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大千本无一有，更

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圣人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尘尘刹刹，无不普遍。又复尘尘周于刹刹，刹刹周于尘尘，然后世界自见其易，圣人时得其常，故云周易。”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同异之辨也。东坡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造物与吾皆无尽藏也。”此变不变之殊也。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其色者差别者青春之进程，其空者平等者无尽之青春也。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抗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周执其易，以其无持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道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遽研物理。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之有高下而后流也。今太阳本热常耗，以彗

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冈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斯能耗热耗力。故大宇积热力，每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天地且有时而毁，况其间所包蕴之万物乎！漫云天地，究何所指，殊嫌茫漠，征实言之，有若地球。地球之有生命，已为地质学家所明证。惟今日之地球，为儿童地球乎？青年地球乎？丁壮地球乎？抑白首地球乎？此实未答之问也。苟犹在儿童或青年之期，前途自足乐观，游优乐土，来日方长。人生趣味益以浓厚，神志益以飞舞；即在丁壮之年，亦属元神盛涌，血气畅发之期，奋志前行，亦当勿懈；独至地球之寿，已臻白发之颓龄，则栖息其上之吾人，夜夜仰见死气沉沉之月球，徒借曜灵之末光，以示伤心之颜色于人寰，若以警告地球之终有死期也者，言念及此，能勿愀然。虽然，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于地球之责任。虽明知未来一刹那之地球必毁，当知未来一刹那之青春不毁。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犹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未来一刹那之我，仍有对于未来一刹那之地球之责任。庸得以虞地球形体之幻灭，而猥为沮丧哉！

复次，生于地球上之人类，其犹在青春乎？抑已臻白首乎？将来衰亡之顷，究与地球同时自然死灭乎？抑因地球温度激变，突与动植物共死灭乎？其或先兹事变，如个人若民族之死灭乎？斯亦难决之题也。生物学者之言曰：“人类之生活，反乎自然之生活也。自妇人畏葸，抱子而奔，始学立行，胸部暴露，必须被物以求遮卫，而人类遂有衣裳；又以播迁转徙，所携食物，易于腐



败，而人类遂有火食。有衣裳而人类失其毛发矣，有火食而人类失其胃肠矣。其趋文明也日进，其背自然也日退，假假有舟车电汽，而人类丧其手足矣。有望远镜德律风等，而人类丧其耳目矣。他如有书报传译之速，文明利器之普，而人类亡其脑力。有机枪四十二珊之炮，而人类弱其战能。有分工合作之都市生活，歌舞楼台之繁华景象，而人类增其新病。凡此种种，人类所以日响灭种之途者，若决江河，奔流莫遏，长此不已，劫焉可逃？”此辈学者所由大声疾呼，布兹骇世听闻之噩耗，而冀以谋挽救之方也。宗教信士则从而反之，谓：“宇宙一切，皆为神造。维护之任，神自当之。吾人智能薄弱，惟托庇于神而能免于罪恶灾厄也。如生物家言，是为蔑夷神之功德，影响所及，将驱人类入于悲观之途。圣智且尚无灵，人工又胡能阙，惟有瞑心自放，居于下流，荒亡日久，将为人心世道之忧矣。末俗浇漓，未始非为此说者阶之厉也。吾人宜坚信上帝有全知全能，虔心奉祷，罪患如山，亦能免矣。”由前之说，固易流于悲观，而其足以警觉世人，俾知谋矫正背乎自然之生活，此其所长也。由后之说，虽足以坚人信仰之力，俾其灵魂得优游于永生之天国；而其过崇神力，轻蔑本能，并以讳蔽科学之实际，乃其所短也。吾人于此，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更宜悚然于生物学者之旨，以深自警惕，力图于背逆自然生活之中，而能依人为之工夫，致其背逆自然之生活，无异于顺适自然之生活。斯则人类之寿，虽在耄耋之年，而吾人苟奋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返于无尽青春之域，而奏起死回生之功也？

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

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异族之视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洪荒而后，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蹒然其不可纪矣。粤稽西史，罗马、巴比伦之盛时，丰功伟烈，彪著寰宇，曾几何时，一代声华，都成尘土矣。祇今屈指，欧土名邦，若意大利、若法兰西、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荷兰、若比利时、若丹马、若瑞典、若那威，<sup>①</sup>乃至若英吉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迥溯往牒，是等国族，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躯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其较新者，惟德意志与匈牙利。此次战血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才矣。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支那自黄帝以降，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历世久远，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稽其民族青春之期，远在有周之世，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过此以往，渐向衰歇之运，然犹浸衰浸微，扬其余辉，以至于今日者，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夫人寿之永，不过百年。民族之命，垂五千载，斯亦寿之至也。印度为生释迦而兴，故自释迦生而印度死。犹太为生耶稣而立，故自耶稣生而犹太亡。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黯

<sup>①</sup> 荷兰，今译荷兰；丹马，今译丹麦；那威，今译挪威。

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吾青年之骤闻斯言者，未有不变色裂眦，怒其侮我之甚也。虽然，勿怒也。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赧赧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与吾并称为老大帝国之土耳其，则青年之政治运动，屡试不一试焉。巴尔干诸邦，则各谋离土自立，而为民族之运动。兵连祸结，干戈频兴，卒以酿今兹世界之大变焉。遥望喜马拉雅山之巅，恍见印度革命之烽烟一缕，引而弥长，是亦欲回其民族之青春也。吾华自辛亥首义，癸丑之役继之，喘息未安，风尘瀕洞；又复倾动九服，是亦欲再造其神州也。而在是等国族，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建国伊始，肇锡嘉名，实维中华。中华之义，果何居乎？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吾辈青年之大任，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中以前之历史，不过如进化论仅于考究太阳地球动植各物乃至人类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者，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也。中以后之历史，则以是为古代史之职，而别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更生回春为其中中心之的也。中以前之历史，封闭之历史，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洁白之历史，新装之历史，待施绚绘之历史也。中以前之历史，白首之历史，

陈死人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华与实相为轮迴，即开敷与废落相为嬗代。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白首中华者，渐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有渐即废落之中华，所以有方复开敷之中华，有前之废落以供今之开敷，斯有后之开敷以续今之废落，即废落，即开敷，即开敷，即废落，终竟如是废落，终竟如是开敷。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斯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溉之、赏玩之、享受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与归矣？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宜有即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敷，开敷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抑吾闻之化学家焉，土质虽腴，肥料虽多，耕种数载，地力必耗，砂土硬化，无能免也。将欲柔融之，俾再反于丰穰，惟有一种草木为能致之，为其能由空中吸收窒素肥料，注入土中而沃润之也。神州赤县，古称天府，胡以至今，徒有万木秋声、萧萧落叶之悲，昔时繁华之盛，荒凉废落，至于此极也，毋亦无此种草木为之文柔和润之耳！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畴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顾人之生也，苟不能窥见宇宙有无尽之青春，则自呱呱堕地，迄于老死，觉其间之春光，迅于电波石火，不可淹留。浮生若梦，直菌鹤马蜩之过乎前耳。是以川上尼父，有逝者如斯之嗟。湘水灵均，兴春秋代序之感。其他风骚雅士，或秉烛夜游，勤事劳人，或重惜分寸。而一代帝王，一时豪富，当其垂暮之年，绝决之际，贪恋幸福，不忍离舍，每为咨嗟太息，尽其权力黄金之用，无能永一瞬之天年，而重留遗憾于长生之无术焉。秦政并吞八荒，统制四海，固一世之雄也，晚年畏死，遍遣羽客，搜觅神仙，求不老之药，卒未能获，一旦魂断，宫车晚出。汉武穷兵，蛮荒慑伏，汉代之英主也。暮年永叹，空有“欢乐极矣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之慨。最近美国富豪某，以毕生之奋斗，博得\$式之王冠。衰病相催，濒于老死，则抚枕而叹曰：“苟能延一月之命，报以千万金弗惜也。”然是又安可得哉。夫人之生也有限，其欲也无穷，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坐令似水年华，滔滔东去，红颜难再，白发空悲，其殆人之无奈天何者欤？涉念及此，灰肠断气，厌世之思，油然而生。贤者仁智俱穷，不肖者流连忘返。而人生之薪向荒矣，是又岂青年之所宜出哉？人生兹世，更无一刹那不在青春，为其居无尽青春之一部，为无尽青春之过程也。顾青年之人，或不得常享青春之乐者，以其有黄金权力一切烦恼苦恼机械生活，为青春之累耳。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岂惟无处购买，邓氏铜山，郭家金穴，愈有以障翳青春之路俾无由达于其境也。罗马亚布达尔曼帝，位在皇极，富有四海，不可谓不尊矣。临终语其近侍，谓四十年间，真感愉快者，仅有三日。权力之不足福人，以视黄金，又无差等。而以四十年之青春，娱心不过三日，悼心悔憾，宁有穷耶？夫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以吾人之生，

洵如卡莱尔所云，特为时间所执之无限而已。无限现而为我，乃为现在，非为过去与将来也。苟了现在，即了无限矣。昔者圣叹作诗，有“何处谁人玉笛声”之句。释弓年小，窃以玉字为未安，而质之圣叹。圣叹则曰：“彼若说‘我所吹本是铁笛，汝何得用作玉笛？’我便云：‘我已用作玉笛，汝何得更吹铁笛？’天生我才，岂为汝铁笛作奴儿婢子来耶？”夫铁字与玉字，有何不可通融更易之处。圣叹顾与之争一字之短长而不惮烦者，亦欲与之争我之现在耳。诗人拜伦，放浪不羁，时人诋之，谓于来世必当酷受地狱之苦。拜伦答曰：“基督教徒，自苦于现世，而欲祈福于来世。非基督教徒，则于现世，旷逸自遣，来世之苦，非所辞也。”二者相校，但有先后之别，安有分量之差。拜伦此言，固甚矫激，且寓风刺之旨。以余观之，现世有现世之乐，来世有来世之乐。现世有现世之青春，来世有来世之青春。为贪来世之乐与青春，而迟吾现世之乐与青春，固所不许。而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遽弃吾来世之乐与青春。亦所弗应也。人生求乐，何所不可，亦何必妄分先后，区异今来也？耶曼孙曰：“尔若爱千古，当利用现在。昨日不能呼还，明日尚未确实。尔能确有把握者，惟有今日。今日之一日，适当明晨之二日。”斯言足发吾人之深省矣。盖现在者吾人青春中之青春也。青春作伴以还于大漠之乡，无如而不自得，更何烦忧之有焉。烦忧既解，恐怖奚为？耶比古达士曰：“贫不足恐，流窜不足恐，囹圄不足恐，最可恐者，恐怖其物也。”美之政雄罗斯福氏，解政之后，游猎荒山，奋其饕腕，以与虎豹熊罴相搏战。一日猎白熊，险遭吞噬，自传其事，谓为不以恐怖误其稍纵即逝之机之效，始获免焉。于以知恐怖为物，决不能拯人于危。苟其明日，将有大祸临于吾躬，无论如何恐怖，明日之祸，万不能因是而减其毫末。而今日之我，则因是而大损其气力，俾不足以御明日之

祸而与之抗也。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有我、有我之现在而足恃。堂堂七尺之躯，徘徊回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何待他人之援手，始以遂其生者，更胡为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惟足为累于我之现在及现在之我者，机械生活之重荷，与过去历史之积尘，殆有同一之力焉。今人之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羶，蛾之投火，究其所企，克致志得意满之果，而营营扰扰，已逾半生，以孑然之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殒毙耶？盖其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者也。《圣经》有云：“富人之欲入天国，犹之骆驼欲潜身于针孔。”此以喻重荷之与青春不并存也。总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罣，全其优美高尚之天，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唯一之薪向，青年唯一之责任也矣。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尔欲享兹幸福，当死于少年之中。”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评鹭锡札曰：“彼由青春之杯，饮人生之水，并泡沫而干之。”吾愿吾亲爱之青年，擎此夜光之杯，举人生之醞醐浆液，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役于物，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自我之青春，何能以外界之变动而改易，历史上残骸枯骨之灰，又何能塞蔽青年之聪明也哉！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乃示以去累除忧之道。有曰：“吾愿君

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舟车。”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此其谓道，殆即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吾文至此，已嫌冗赘。请诵漆园之语，以终斯篇。

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 美 与 高

蔡子民君归自巴黎，刻来京就北京大学校长任。前于政学会欢迎会中，演说欧洲战争所以持久之原因，归本于科学与美术之发达。其论美之与高，尤为精辟。中有一段曰：

……然则德、法两国不信仰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又有道德心也？此即知之作用。大凡天地间之生一物，无一而不有知。夫婴儿无知也，而知哺乳。植物无知也，而知吸收养料。若矿物之有重量之能互相吸引，皆系知之作用。由一分推而极之，则为气德，所谓美之与高。所谓美者，即系美丽之谓；高者，即有非常之强力。假如描写新月之光，题诗以形容其景致，如日月如何之明，云如何之清，风又如何之静。夫如是始能传出真精神，而有无穷乐趣，并不知此外之尚有可忧可惧之事。此即美之作用。又如驶船于大海之风浪中，或如火山之崩裂，最为危险之事。然若形容于电影之中，或绘之于油画，亦有极为可观之处。而船中人之惊怖，火山崩裂焚烧房屋之情形，亦足露于图中，令人望之生怖，此即所谓高。至于喜悦飞鸟而思置之于笼中，遇美人而欲与之相亲，以及我国女戏园较男戏园能受一般人之欢迎之故，皆美之作用。然此种之美，确为一种欲美，而非真美也。现今世界各国，如希腊民族，即近于美，日耳曼民族多偏于高。故德国建筑拿破仑攻普鲁士之石像，颇极伟大，其所绘之图堂，如绘希腊、罗马当时之情形，皆偏于高之一方面。法国近于美。然而美与高于道

德有莫大之关系。凡性质富于美之民族，对于生死问题并不计较，必从容以行素所计划，非于临时所可勉强。至于性质富于高之民族，一经认定目的之后，即竭尽其智力以行之，置生死于弗顾。所以此次欧洲战争，德国军士死亡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无畏惧之心，是以攻比攻法，无往不克。以迄于今，粮缺饷乏，致每礼拜中每人只与半磅牛肉两枚鸡卵，仍坚持不易。以此精神，平时用之于实业，焉得而不发达！且此次战争发生之初，德国已将应先攻某国次攻某国之计划，先事预定。故战争一发，毅力直行，并无畏难之色。法国人民，多近于美，其平时极为从容，不事战争预备，及至战事发生，比京被陷，法国仍不动声色，持其固有之性质。盖法国预算以为法国人民尽不逮德国之众，倘系背城一战之举，自必全灭之。即退一步言之，使两方军士死亡相当，德国元气亦已大伤。所以法国对于德国，必不绝对主战。假使德国军士死亡，军火毁弃，可得相当代价时，法国即将其地退让于德。然而法国又非绝对退让，如遇有机会可乘，仍竭力进攻。故德法两国，能相持两年之久者，皆科学与美术之功也……<sup>①</sup>

是说也，颇足揭出德法国民性特殊之采色。顾一入吾人之耳，而反躬自问，吾之民族性，于美于高，今日果何有者？余闻一国民族性之习成，其与以莫大之影响者，有二大端，即境遇与教育是也。境遇属乎自然，教育基于人为。纵有其境遇而无教育焉，以涵育感化之使其民族尽量以发挥其天秉之灵能，则其特性必将湮没而不彰，久且沦丧以尽矣。伊考吾先民之历史，文学、美术名作辈出。就建筑工程而论，如长城之连绵万里，至今犹为

<sup>①</sup> 见于民国六年一月十日北京《新中华报》。同年，《新青年》第2卷第2号所刊《在北京政学会之演说》（中华书局一九五〇年版《蔡元培选集》）中的这段文字，较简略一些。

世所推称。此以知吾民秉彝之所畀赋者，不惟有美，抑且有高。盖以宅国于亚洲大陆之中，高山峻岭，长江大河，泱泱乎纵横于南北。以言山陵，则葱岭雪山峙于西域，行其间者经三旬而不能逾也。以言河流，则长江一泻，黄河奔流，浊浪滔滔，远望真有连天之概也。以言大泽，则洞庭云梦兰蕙芷茝，皆产于其间也。以言原漠，则燕、齐、鲁、豫，平野漫漫，一望无际。越长城而外，则又黄沙白草，万里无人烟也。衡以地灵人杰之说，以如此灵淑之山川，雄浑之气象，栖息其间之民族，当必受自然之影响，将兼含美与高而并有之宜也。顾何以吾之民族，日即销沉于卑近闇昧之中，绝少崇宏高旷之想。迴视古人，近观他族，稍有心性血气者，当无不愧怍无地焉。或谓大陆平原自然之美，远逊于岛屿近海之区，故其民性亦如之。是殊不然。美非一类，有秀丽之美，有壮伟之美。前者即所谓美，后者即所谓高也。彼岛屿近海之区，山水湖沼，花木园林，楼台村落，种种复杂之象，集于狭隘之域，故其美为常人所易见。乃若大陆之景物，散于殊方，道里辽远，今虽有汽车、轮舟、飞艇等器之发明，但其迅捷之度，去足以缩小自然，使能益显其美之域尚远。故非得具绝大眼光，绝大手笔之文学家艺术家如李白其人者，未足以描写之。然而旷达之象，远迈之趣，固已于不识不知之间，神化于吾民族之性质之襟怀矣。是则吾民族特性，依自然感化之理考之，则南富于美，北富于高，今而湮没不彰者，殆教育感化之力有未及，非江山之负吾人，实吾人之负此江山耳。嗟呼！吾其为美之民族乎？高之民族乎？抑为美而高之民族乎？此则今之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感化牖育之责，而个人之努力向上，益不容有所怠荒也矣！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期

## 真理之权威

余曩在本报著论，谓：“余信宇宙间有独一无二之真理。孔子、释迦、耶稣辈之于此真理，皆为近似得半，偏而弗全。故吾人今日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时贤多以为与目今之社会不相应，颇以为过。余友仲公，著《丁巳杂志》卷首发端，即陈此义曰：“……今日学术社会之不发达，与思想界之窒塞、腐败所由致之使然，其责读者固应分之，即著者亦乌能辞其咎。浅演之群，其智不足与语高深，譬执今之人而劝之，宁崇拜真理，勿崇拜孔子，必将哗然群胥，皆为大逆。虽有至理，其不能以入焉，固也。然彼之不知崇拜真理固愚，而我曰，汝勿崇拜孔子，亦过喻之理而挑之怒，将求我信，宜乎其难。……”似为针砭余言而发者也。余既拜赐良友药石之箴，复喜余崇拜真理之主张，实已得吾友之同情，又进而以其委婉曲谅之言，展转以渐入社会之心趣，而潜消其訾訾固拒之程，益信真理之权威，不以流俗社会之未喻，而有所损削。余此后持真理以发言立义之气，用益壮矣。

言论之挟有真理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嚅喙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

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故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盖背乎逻辑之推论，苟为根于事实而设者，视合于逻辑之推论，其所据全属子虚者，厥失为少。盖事实确而推论妄者，有时而或可合，推论正而事实虚者，则永世而无其果。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

然而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曩乎其难。即令各人竭其所知，以求真理之所在，而见仁见智，又人人殊，此其为道，不几一分而不可复合，一乱而不可复理，将言真理者愈众，求真理者愈多，而真理之为物愈以湮没而不彰乎？曰，此不足以障真理之表显也。吾人各有其知力，即各有其知力所能达之境，达于其境而确将其所信以示之人，此即其所见之真理也。言真理者之所谓真理，虽未必果为真理，即含有真理，而亦未必全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认识其所谓真理者，即或违于真理，真理亦将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故言论家欲求见信于社会，必先求所以自信社会之人，能自信者众，则此自信之众，即足成其社会之中枢，而能轨范其群于进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堕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而葬于幽暗之域，乃为死亡之特征。然则吾人苟有所自信，初不必计及社会之于吾言，或遵为天经地义，抑斥为邪说淫辞。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

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法律禁之，固所不许，社会压之，亦非得宜，使人人皆慑于社会心理之势力，而苟且姑息，以与之因循敷衍，不惜枉其所信以暂屈于现状维持之下者，亦觉于真理之生涯未能彻底。平情论之，社会之进演，进步与秩序宜并重之。即高悬理想与俯就社会之言论，亦当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此立宪政治之所以重乎言论，而言论之所以重乎自由也。虽其立言之旨，不容于当世，要其助益进步之功，亦与渐世之言论为用相等，或且过之。方其一群之中，犹自封于前人先圣之说，骤闻之，或且皆为离经畔道之徒，而于其说乃扞格而不相入。究之自有此离经畔道之说，一于世人之思想，着其痕影，虽受之者期期以为不可，而由斯已得正负相反之意象，并列杂陈，以于不知不识之间，动其坚固不拔之单纯思能，彼纵始终对于斯说，深恶痛绝，而有较为和缓委曲之说，以向之陈说，斯其言之虽不得直接以承其信许者，而间接以收调剂之功，已为不少。即让步言之，此种骇世之言论，直接间接丝毫不为并世之人所用，亦不足以沮立言者之气，而遂默持其所信以终于暗昧之乡。此其事，古人有行之者矣！杨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之旨，固二子所信为真理者也，而孟轲之徒，则距之辟之，不遗余力，以无父无君罪之为禽兽。然自今日观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李卓吾氏究讨内典，得罪儒宗，举世儒生，尽情谤讟，几不侔于人类之伦，卒至囚其人，火其书，然而卓吾当日，固明知其书必遭焚毁之厄，而犹自榜其书曰《焚书》，将其所信，表而出之，而今其书固犹流在人间也。苏格拉底的当其身，尝以慢神不道之罪，而受国人之众推廷鞠，终以受戮矣；耶稣基督，亦以逆天之罪受时人之磔杀，流血于十字架上矣；近代俄之大儒托尔斯泰氏，亦尝见嫉于政府，破门于宗教

矣。然而今世之人，或则崇为哲家，或则尊为教主，或则称为旷代文豪，此以知言论之权威，即不行于当时，犹能存于异代；虽或见阨于社会，仍可自信于良知也。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虽为急进之言论，余并不排渐进之言论，盖言论而发于良知之所信，无论其为急进，为渐进，皆能引于进步之境，而达于真理之生涯也。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

1917年4月17日《甲寅》日刊

## 乐亭通信

抵里以来，纷于亲朋之访问，未遑执笔，为吾报作通讯。兹以少暇，辄择乡间村落中之清新空气，足以舒都市之苦倦者，约略述之，倩邮筒运输于北京，化无用为有用，以羨余补不足，此亦变地利用之经济也。

吾友容君伯挺，尝为余言：真正之舆论，在乡间不在都会。以余之所经验者证之，诚为不谬。民国创建，吾侪以为数千年帝制由兹推倒，不能复萌矣；而乡间父老，独以为未安，谓不久将有皇帝出现，真主出现也。无何，袁氏果称皇帝。时余辈归乡，辄告农村盼皇帝、盼真主之父老，曰：尔等之皇帝、真主，今真出现矣。将施其惠泽及于尔等矣。彼等惊相问，究为谁？某应曰：袁世凯。则复愀然蹙额，交口怨詈，而其望穿秋水之皇帝，及对于皇帝之迷信，至是乃多灰冷失望矣。于是乡间舆论，遂一转其盼皇帝、盼真主之心理，而归于恨<sup>①</sup>袁氏、骂袁氏。万口同音，谓袁氏皇帝之迷梦必不能显诸事实也。无何，袁氏果自毙。此次外交问题，乡间亦颇注意，相见必询以加入有何好处；吾人于此，殊苦无相当之语以答之。而其对黎大总统之爱戴，则又有口皆碑。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不惟不可漠视，且较都市中人，共和则群趋共和，帝制则群趋帝制，徒为

<sup>①</sup> 原缺一字，疑如“恨”字，或同类意思的字。



一时势力之火焰所驱役，以致丧其识察之真知直觉者，真实确正万分矣！

由是言之，则知选举总统，当归其权于国民总选举，不当界之国会议员；为其议员在都城行此，不如国民在乡间行此，于人物之择别，较为确当，于意思之表示，较为自由也。

乡间初夏，四野麦陇青青，遥望村落人家，烟树俱于沈寂清静之中呈出乡间生活之自然趣味。闲尝漫步其间，觉田园之一草一木，鸡犬之一吠一鸣，童叟之一簦一笠，无在不与都市异趣；语其特征，则是等景物声色，均为于应和掩映之间，绚绘点缀，以成乡间沈静之姿之资料而已。

吾乡久旱，麦苗均渐枯槁。农家待雨孔急，争在庙宇神前作祈雨祷，仍无验兆。月余以来，麦粉腾贵，粮价陡涨，农父相见辄为唏嘘，谓今岁麦已丧其有秋；长此旱魃，大秋收获亦将无望。农民惟一之希望，乃在以汗血滴滴之辛劳，易一丰年耳。倘丰作一失，则生计之苦，殊难谋救济之途。以此思忧，忧可知矣！

永郡南部，昌、滦、乐、临一带，皆滨渤海，鱼盐之利颇厚，惜民间无集重资经营之者。盐自袁氏督直时，收归官办，层层剥削，民怨沸腾。永七之民，困于盐祸者有年，居民每有集众抗官毁局之风潮，迁安、乐亭，屡见不一。近闻归盐商包办矣。其积弊病民，恐官商无择也。渔业则绝无振作之象，惟见乡间挑贩呼卖鱼虾而已，厚利坐弃，滋可惜也。

乐亭史香崖先生，学识渊博，藏书最富，闻有《图书集成》一部。先生歿后，此物辗转易人，现储于邑城某当铺中，渐有散佚，似此巨制，应由公家团体购置保存，补其零失，以备文献之征考，否则，宏编巨制，沦为断简残篇矣。惟关心图籍者留意焉。

直隶政团，分为二派：一为公民协会（闻已更名“公民俱进

会”)，由旧国民派及旧民主系、旧政友系联合而成。一为政治研究会，由除去旧民主系、旧政友系之旧进步派组织而成。近以为明年议员改选之准备，纷纷在各县设立分会。乐邑则仅有公民俱进会，已告成立，入会者颇为踊跃，举定刘某为正会长，崔某刘某副之。鄙陋之区，对于组织政团如兹其勇，谁谓吾民无宪政上之进步也哉？

5月23日守常自乐亭寄。

1917年5月28—29日《甲寅》日刊

##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国有一首诗，最为俄人所爱读，诗曰：

俄国犹大洋，文人其洪涛；  
洋海起横流，洪涛为之导。  
俄民犹一身，文人其神脑；  
自由受摧伤，感痛脑独早。

此诗最足道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

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之接近，乃一自然难免之现象。以俄国专制政治之结果，禁遏人民为政治的活动，自由遭其剥夺，言论

---

\*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是作者的一篇遗作，是从胡适的藏书里被发现的。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作者的唯一的一篇原稿。原稿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这篇原稿是钢笔写的，用的是蓝色横格十六开白道林纸，署名李大钊。十多年前，经星华鉴定，确认是父亲的手迹。此外，同时还发现了同一篇文章的墨笔誊清稿，用的是绿格竖写的竹纸，并印有“新青年原稿用纸”字样。不是作者的手迹，还有一些错、漏的字，原稿中凡用外文的地方，一概留下空白未抄，看来是新青年编辑部曾经准备发表而找人抄写的。原稿和抄稿都没有署名写作年月。从内容看，作者介绍俄罗斯文学，强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热烈地赞扬了十九世纪到十月革命胜利俄国著名诗人如普式金、

受其束缚。社会中进步阶级之优秀分子，不欲从事于社会的活动则已；苟稍欲有所活动，势不能不戴文学艺术之假面，而以之为消遣岁月，发泄郁愤之一途。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

更以观其历史，建国之初，即由东罗马帝国即比藏钦帝国<sup>①</sup>承俄罗斯正教之系统，奉为国教，并袭受比藏钦之文明；逮比藏钦灭亡，俄国遂以保护正教自任，故其立国方针与国民信念皆倾于宗教的一面。当彼得大帝时，虽在文学亦浸染宗教之臭味，谣曲传说罔不有然。厥后俄国文学界思想界流为国粹、西欧二派；国粹派即以宗教为基础，建立俄罗斯之文明与生活于其信仰之上，与西欧之非宗教的文明与生活相抗立。西欧派虽与国粹派相反，然亦承认宗教的文明为其国民的特色。西欧派者，不过对于国粹派而言，并非谓其心醉西欧，亦非能表明西欧派人生观之特质。由西欧派之精神言之，宁以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为名副其实。无论国粹派或西欧派，其以博爱为精神，人道主义为理想则一，人道主义因以大昌于俄国。凡夫博爱同情、慈善亲切、优待

---

涅克拉索夫以及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同情人民，反对暴君，献身社会革命运动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与他所写的《文豪》及其他论述的观点是一致的。文末说，“今也赤旗飘扬”，赞美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由此可以推断写作的时间大致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它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强调“俄罗斯人之精神”相比较，可以看出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这篇文章是五四时代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俄国文学的较早的珍贵文献。文中说“今请先论其诗歌”，可见还应有续篇。但是否写了续篇，无法证实。这里按原稿刊用，加了标点，文中凡使用外文的地方都用方弧号注明译文。

① 比藏钦，现通译拜占庭。

行旅、矜悯细民<sup>①</sup>种种精神，皆为俄人之特色，亦即俄罗斯文学之特色。故俄罗斯文学直可谓为人道主义之文学，博爱之文学。

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

今请先论其诗歌。俄国抒情之诗感人最深，所以然者亦不在其排调之和，辞句之美，亦不在诗人情意恳挚之表示，乃在其诗歌之社会的趣味，作者之人道的理想，平民的同情。

俄国诗人几常为社会的诗人，吾人实未见其他国家尚有以诗歌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至于若此之程度者。

当十九世纪全期，社会的政治的动机流行于俄国诗歌之中。有名 Pushkin〔普希金〕<sup>②</sup>者，人称“俄国诗界无冠之帝王”(Uncrowned Tsar of Russian Poetry)，尝作一诗，题曰“自由歌”(Ode to Liberty)。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此外尚有一大诗人 Lermontov〔莱蒙托夫〕<sup>③</sup>，于 Pushkin〔普希金〕氏失败于悲剧的决斗之后，有所著作，吐露其光芒万丈之气焰，以献于此故去诗人高贵血痕之前，痛骂贪婪之群小环绕于摧残自由

---

① 细民，指地位卑下的人。

② 普希金(1799-1837)：俄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著有《叶甫盖尼·奥涅金》、《茨冈》等。《自由歌》即《自由颂》。

③ 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大诗人，著有《诗人之死》、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等名篇。

与时代精神之皇位侧者。同时又有 Ryliev〔雷列耶夫〕<sup>①</sup>氏，于其思想中唤起多数为自由而死之战士，诗中有云“我运命之神，憎恶奴隶与暴君”等，可以见其思想之一斑。Herzen〔赫尔岑〕<sup>②</sup>氏之友人，有称 Ogariov〔奥加辽夫〕<sup>③</sup>者，于一八四八年高声祝贺革命风云之突起。此一骚动，促人奋起于安泰之境，扬正义而抑贪欲，其光明一如纯粹之理性。一八四九年，此诗人之心，几为革命破灭、专制奏凯歌之光景所伤透，穷愁抑郁，常发悲叹。是年，氏尝为伤心之语曰：“欧洲之大，曾无一单纯之所，为吾人可以达其生活于光明和平之状态者。”但自兹十年后，此先圣之心理，又从过去之星霜以俱消。是时氏复告 Herzen〔赫尔岑〕氏曰：

昔时方童稚，品性温如玉。  
忽忽已少年，激情不可屈。  
韶光催人老，渐知邻衰朽，  
入耳有所闻，始终惟一语；  
一语夫惟何？自由复自由。  
音义在天壤，煌煌垂永久。

并乞其友于临终之际，勿令其尸骸已寒，而不以最终神圣之

- 
- ① 雷列耶夫(1795—1862)：十二月党领导人物，秘密结社《北社》的主席，以《沉思》为题写了不少诗，唤起人民进行斗争。这里所说“思想”即《沉思》。起义失败后被判处绞刑。
- ② 赫尔岑(1812—1870)：出身于贵族的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作家。他在国外创办的《警钟》对俄国革命起过重大作用。著有揭露农奴制度的小说《喜鹊贼》、《谁的罪过？》等作品。
- ③ 奥加辽夫(1813—1877)：赫尔岑的战友，一八五六年亡命国外后，曾与赫尔岑在伦敦创办革命刊物《警钟》，以抒情诗著名。大钊同志所引他的诗，原题为《自由》。

一语细语于其耳边。其语惟何？曰：“自由！自由！”

十九世纪前半期之诗人，对于自由仅有一暧昧之概念。直至一八六〇年迄一八八〇年之间，抒情诗派对于自由之概念，始渐减其漠然无定之程度。于是时也，平民诗人之全部勃然兴起，是皆与于其时社会的运动重要之役者。会员中有一名 Plechtchiev〔普列谢耶夫〕<sup>①</sup>者，以诗句表明此派之精神曰：

进进进吾友，勿疑亦勿怖。  
刚勇之功烈，建立惟待汝。  
上帝已昭告，赎罪光且曙。  
吾侪坚握手，猛进以阔步。  
扬我知识旗，缔我同心侣；  
结合日益扩，精神日益固。

此诗至今犹传诵于俄国青年之口，且常高唱合奏于音乐会中。

同时诗人 Minaev〔米纳耶夫〕<sup>②</sup>著讽刺诗甚多，以嘲传说之信条与经义，传布解放妇人与平民之理想，亦一先觉之诗人也。

女流诗家 Barykova〔巴雷科娃〕<sup>③</sup>，其女性的抒情诗曲，既非传写爱情，又非描绘月夜，但以写沉湎于酒、困阨于贫乏与愚昧、罹于疾病之惨苦人民。其时有数辈诗人，但以歌咏为赏心娱志之具，变其天赋之才能而为人类之玩物。此女诗人则为危言以悚

① 普列谢耶夫(1825—1893)：平民诗人，参加过秘密的佩特拉夫斯基革命小组，一八四九年被流放到中亚细亚十年之久。文中所引他的诗是一八四六年的作品。

② 米纳耶夫(1835—1889)：《火星派》诗人，以讽刺诗著名。

③ 巴雷科娃(1839—1893)：俄国女诗人，其作品充满民主主义倾向，曾多方支持民意党人运动。

之曰：“诗人者，保护国家之武器也，……彼为理想之渊源，……彼为贫苦愚钝人民之声音、之喉舌，……彼为晓日之第一曙光。”

此时之诗人，重视为公众幸福之奋斗，而以个人幸福为轻。就中有一诗人，尝训示青年曰：“离尔父母，勿建巢居，其独立自营，……第一须于尔灵魂中扑灭情欲，其冷酷无情于恋爱、财富、荣誉之诱惑，其庄严神圣……保尔心之自然与清粹于尔胸中，然后全以授之于尔不幸之同胞。尔闻悲叹之处，尔往焉，……比大众多受艰苦，……留得清贫与明白。然则尔将成为伟大，举世将为尔叱责之声所扰。”俄人于此无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而有革命的禁欲主义。自我之昇赋，全为竞争，全为奋斗，故其时之诗歌实为革命的宣言，读者亦以是目之。Dobrolubov〔杜勃罗留波夫〕<sup>①</sup>者，诗人而评论家也。其诗句颇足状此派抒情诗家之精神，诗云：

死别告吾友，杀身为忠厚。  
深信故国人，常忆吾所受。  
死别告吾友，吾魂静以穆。  
冀尔从我行，享尔以多福。

简要、鲜明、平易，全足以表示此时俄国青年之心理，此心理与现代中〔产阶〕级精神<sup>②</sup>之精密复杂相去远甚。

俄国之平民诗派，由 Nekrasov〔涅克拉索夫〕<sup>③</sup>（一八二

---

①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年轻文艺批评家、诗人。

② 中级精神，中级即中产阶级，补缺字。现译资产阶级。

③ 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平民诗派最著名的诗人，其代表作有《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过好日子》等。



——七八)达于最高之进步，其所作亦属于不投时好之范畴，故虽墓草已弥<sup>①</sup>，而当其生前所起之议论，犹未能盖棺而定。此等议论，大抵皆关于其诗才之问题，有谓其诗为细刻而成之散文，并诗人之名而不许之者；有推为俄国最大之诗人者。是等议论，几分起于其诗之比喻的说明极重写实主义，但彼不欲认识文学之诗化的俄罗斯，而欲认识施行农奴制时与废止此制最初十五年之实在的俄罗斯者，必趋于 Nekrasov [涅克拉索夫]之侧，彼将以圣彼得堡城之官僚与实业家、诗歌与娼妓、文学与卖报人为材料，为尔描写此阴郁无情之圣彼得堡城，历历如画，然后引尔于空旷之乡间，庶民于此无何情感，亦无何理想，但为面包之皮壳而劳动，陈俄国农夫之心于尔前。

其所为诗亦或稍有所失，然轻微之过，毫不足以掩其深邃之思想，优美之观念。俄诗措词之简易，尤当感谢此公。盖惟所著多平易，故能为一般读者所接近。其诗多谱入音乐，为流行最普[及]之歌曲，传诵于俄国到处。

Nekrasov [涅克拉索夫]之影响于俄国社会，自其生前已极伟大，死之日，执紼从棺而吊者千万人。一诗人之葬仪，乃成极壮大之典礼。彼读者之后裔，常于其著作中寻得人道主义之学派，虽属初步，而能以诚笃真实著。

Nekrasov [涅克拉索夫]预知其诗必能觅得途径，以深入读者之心神，尝于诗中有云：“人能不爱此酷受笞刑、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者，必非俄罗斯人。”“酷受笞刑、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殊非无用之语，是殆指俄国文学与诗歌之进步达于极点也。

---

<sup>①</sup> 原文为“墓草已弥”。弥，同弥，现通用弥。

斯时之俄国社会，实视诗人作者为人生之导师，为预言家，为领袖。斯时之诗人作者，亦皆尝出其最善之努力，以报此荣名。如 Pushkin〔普希金〕自遭放逐，终其身受警察之监视。Lermontov〔莱蒙托夫〕以一官吏而既被褫职，并受遣徙。Ryliev〔雷列耶夫〕以曾与于十二月党暴动之谋而身蹈刑戮。Ogariov〔奥加辽夫〕亦被政府勒令移居。他如雅负时誉之文学批评家 Pissarev〔皮沙烈夫〕<sup>①</sup>，身锢囹圄者四载。著“*What's to Be Done*”〔《怎么办？》〕（流行最广之小说）之批评家 Tchernyshevsky〔车尔尼雪夫斯基〕<sup>②</sup>，亦见逐于荒寒之西伯利亚。而 Dostoyevshy〔陀思妥耶夫斯基〕<sup>③</sup>及较 Nekrasov〔涅克拉索夫〕稍后之著名诗人 Yakubovitch〔雅库鲍维奇〕<sup>④</sup>，皆尝转徙于西伯利亚，置诸惩罚役监狱。即 Tolstoy〔托尔斯泰〕晚年亦曾受秘密警察之侦谍。Gorky〔高尔基〕必生活于异国，始免于放逐或投之坑中。

是皆俄国诗界最著之牺牲者，彼辈为文学之改进而牺牲，为社会之运动而牺牲，此外尚不知凡几。至于读者之受扰害与虐待，与书籍之遭禁止与焚毁者，尤更仆难数。以是因缘，俄国之诗神遂为衰亡纤弱之诗神，遂为烦冤惨苦之诗神；以是因缘，俄国伟大之诗家多以青年而早死，结核病与发狂，乃为俄国诗人常

---

① 皮沙烈夫(1840—1868)：文艺批评家，因秘密印行一篇反对密探攻击赫尔岑、号召推翻专制制度而被捕。他的大部分论文是在狱中写的，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艺批评家，著有《生活与美学》、小说《怎么办？》等。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小说家，著有《罪与罚》、《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

④ 雅库鲍维奇(1860—1911)：诗人，曾为《祖国纪事》写稿，后接近民粹派，因参加民意派的革命组织而判处流刑。

罹之病症。

Nekrasov〔涅克拉索夫〕后，俄国诗学之进步衍为二派：一派承旧时平民诗派之绪余，忠于其所信，而求感应于社会的生活，Gemtchujnikov〔热姆丘日尼科夫〕<sup>①</sup>，Yakubovitch〔雅库鲍维奇〕为此派之著名作者；一派专究纯粹之艺术而与纯抒情诗之优美式例以新纪元，如 Tutchev〔丘特切夫〕、Fete〔费特〕、Maikov〔马伊可夫〕、Alexis Tolstoy〔阿历克塞·托尔斯泰〕<sup>②</sup>等皆属之。但纯抒情派之运动，卒不得青年之赞助而有孤立之象。一般青年仍多自侷于平民诗派之列，其运动之结果，适以增重俄国诗界之社会的音调而已。

十九世纪最后五年间，有一派新诗人崛起，号颓废派（Decadents），多属于新传奇主义派（Neo-Romantics）<sup>③</sup>。一九〇五革命之起也，此派多不安于冷寂，踊跃以诉于革命事变所供给之资料，或且作诗以自誓忠于人民，且宣言甘为劳动阶级社会主义之战士。但此奇异之现象，不旋踵遂归于幻灭。而反动以起，此派复堕溺于神秘主义之中，而不愿废其探究虚伪之素志。观于是派中才名藉甚之 Blok〔勃洛克〕<sup>④</sup>，近年刊布一公函，函中信誓旦旦，谓公众之视颓废诗派与视平民诗派者不同，如颓龄之 Plechtchiev〔普列谢耶夫〕，伸其战抖之腕，劝人以向刚勇之功烈猛进，勿恐勿疑，闻者莫不以诚敬爱之，而在纯粹艺术之代表者

---

① 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9）：曾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诗歌，反对沙皇专制暴政。

② 丘特切夫（1803—1873）、费特（1820—1892）、马伊可夫（1821—1897）、阿历克塞·托尔斯泰（1817—1875），都是脱离现实、追求纯美和纯抒情的诗人。

③ 新传奇主义派应译为新浪漫主义派。

④ 勃洛克（1880—1921），象征派著名诗人，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转向革命方面，其代表作为《十二个》。

为之，则闻者惟以俳优鄙夫弃之。此函中所鸣之不平，殆非无据而云然。盖俄国多数之读者，今犹视社会的诗歌为一种诗才之高贵的表示也。

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sup>①</sup>，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俄罗斯青年乎！其何以慰此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其何以报彼为社会牺牲之诗人？

---

<sup>①</sup> 敷，同放。

## “今”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

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缥缈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

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断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沈

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 新的!旧的!

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

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一粒微尘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质。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就是此都会里最美的市场中所陈设的；一个人的指爪上的一粒炭灰，就是由此都会里最大机械场的烟突中所飞落的。既同在一个生活之中，刹刹尘尘都含有全体的质性，都着有全体的颜色。

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

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的响，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更夫是旧的，巡警是新的。要用更夫，何用巡警？既用巡警，何用更夫？

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什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

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

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其余类此者尚多。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为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不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

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的过处了。

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二十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很觉不安。推一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反说回来，也是一样。新的嫌旧的妨碍，旧的嫌新的危险。照这样层级论，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叠叠的矛盾。人生的径路，若是为重重叠叠的矛盾现象所塞，怎能急起直追，逐宇宙的文化前进呢？仔细想来，全是我们创造的能力缺乏的原故。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路，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却这些笨拙迂腐的器具，来坐迅速捷便的电车，马路上自然绰有余裕，不象那样拥挤了。即有寥寥的汽车、马车、自转车等依旧通行，因为与电车纵的距离不甚相远，横的距离又不象从前那样逼近，也就都有容头过身的道路了，也就没有互相嫌恶的感情了，也就没有那样容易冲突的机会了。

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象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驼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

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 新旧思潮之激战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我们且看今日的日本，新的方面，有“黎明会”一班人士种种的结合，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攻击之列。他们天天宣传，天天游说。这儿一个演说会，那儿一个讨论会。这里立一个杂志，那里创一所日刊。公共结合以外，他们还有自己本着他专究的学理、择选的问题。今天一个小册子，明天一个小册子，散布传播，飞如蝴蝶。他们虽然定了一个共同进行的方向，都向着黎明的曙光去走。可是各人取那条路，还是各人的自由，不必从同，且不能从同，不可从同。那反对一方面，也是堂堂鼓、正正旗来相对应。“桐花会”、“黑龙会”这一般人的思想虽旧，他们也知道走正路，也知道本着自己所信的道理、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正当势力，和新的对

抗。就是那个“浪人会”的行动，在日本社会，已为舆论所不直，他们对于新派的激战，也不过开一个演说会，请反对党的魁领莅会辩论而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新的旧的，都是死气沉沉。偶有一二稍稍激昂的议论，稍稍新颖的道理，因为靡有旗鼓相当的对立，也是单调靡有精采，比人家那如火如荼的新潮，那风起潮涌的新人运动，尚不知相差几千万里？那些旧人见了，尚且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他们总不会堂皇正大的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那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

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那里去了！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

1919年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

## 现在与将来

近来常听人说：“中国人所以堕落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你们只有‘现在主义’，靡有‘将来观念’。”因此，就拿“时间只有过去与将来，绝靡有现在”的话，来劝告他们，也是希望他们抛了“现在主义”，存点“将来观念”的意思。但是我对于这话，却有几个疑问：（一）堕落的生活中的现在，在人生观果然算得现在么？（二）就他们的生活而论，果然靡有他们的将来观念么？（三）时间果然靡有现在么？我想就这几点说几句话。

现在一般堕落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东西。所以从人生上讲，他们不但靡有将来，并且靡有现在。他们的现在，不是他们的人生，是他们发舒兽欲的机会。他们有了工夫，就去嫖，去赌，去拨弄是非，奔走权要。想出神法鬼法，去弄几个丧良心的金钱，拿来满足他们的兽欲。象这样的活动，在宇宙自然的大生命中，在人类全体的大生命中，在他自己一个人的全生命中，有丝毫算得是人生的现在么？依我看来，这种的生活，简直是把人生的活动，完全灭尽。他们的知能躯体，全听兽欲的冲动的支配，若说他们有现在，也是兽欲的现在，不是人生的现在。这种的生活，不配叫什么主义。

这种堕落的生活，固然在真正人生上，不但靡有将来，并靡有现在；而在他们的兽欲生活中，却是不但有他们的现在，并且有他们的将来。试看那强盗军阀，那个不是忙着搜括地皮，扣侵



军饷，拿到他家，盖上些比城墙还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万世之业？那卖国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至少也可以做下半世的过活？就是那最时髦的政客，成日价营营苟苟，忙个不了，今天靠着某军阀，明天靠着某元老，也是总想作回大官，发回大财，又那个不是为他将来的物质生活作预备呢？这样看来，他们虽然靡有真正人生的将来，他们却有他们那种生活的将来。他们固然有他们那种生活的现在，却靡有真正人生的现在。

至于时间是否有现在？是哲学上一大问题。有人说只有过去与未来，靡有现在；有人说过去与未来都是现在。如今我们且不去判断他们的是非，但是我却确信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然在人生命上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一线相贯，不可分拆，不可断灭。我们不能划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我们要想完成这自然的大生命，应该先实现自己的人生。我们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应该把我们生命中过去与将来间的关系、时间全用在人生方面的活动，不用在兽欲方面的冲动。

1919年3月28日《晨报》

## 今与古（其一）

（在北京孔德学校课外讲演）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今与古。今是现在，古是过去的时代。我们现在把今与古来对讲，是要考察现在的人与古来的人有甚么不同之点？现在的人与古来的人有甚么关系？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生活很是重要，所以来大略说一说。有人在文章上发表他的意思，常说：“世道人心，今不如昔”，“人心不古”，“现在的风俗道德人心，不如古来的风俗道德人心”。讲这些话的人，大半都是“前辈”“长者”，他不满意于青年，也不满意现在的一般人，于是发为感叹，而动其怀古的思想，但是我们想想，是不是今人真不如古人？是不是发这样感想的人错误？这是个很有趣味的问题，我们先考究他们所以怀古的原因：

（1）发此种感想的人，对于现在的人心，风俗，政治，道德，都不满意，感觉苦痛，因而厌倦现在，认为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这种厌倦现在的感想，并不是坏的感想，因为有了这种感想，对于各种事务，才都希望改进。有了希望改进的思想，才能向前进步，才能创造将来。若是不满意现在，而欲退回，把现在的世界回到百年千年以至万年前的世界，这不光是观念错误，并且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是伤时之人厌恶现在，而触动他怀旧之心的一个原因。

（2）人大半是羡慕古人之心太盛，如古人在当时不过是一

斤八两的分量，到现在人看来就有了千斤万斤的分量。这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例如，火在人类史上有极大的关系，因自有火的发明，而人类生活遂发生很大的变动；又如农业，也是人类史上一个很大的发明。不过火同农业的发明，是社会的进化，并不是所谓神农燧人一二人的功德。而旧史却不认为是社会的进步，而认为是少数神圣的发明，这是年代距离太远，传闻失实所致。又如黄帝，古代有无其人，尚不敢定，但是世人尊敬他的心，比他本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分量，高的多多。又如某校请一个本国教员，并不见得学生怎样信仰，怎样欢迎，要请一位有与本国教员同等学问的外国教员，就非常的尊敬欢迎，就是出洋留学的，也觉得比不出洋留学的好些。谚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是普通的心理，推想起来，这又是因为受了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过分的崇敬古人，其理亦与此同。我们的子孙对于我们，或现在一般的人，所发生的尊崇心，是我们想不到的高厚，也未可知。

(3) 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世运每由昌明时代，转为衰落时代，甚而至于渐灭，因而许多人以为今不如昔，就发生怀古的思想，那里知道衰落之后，还有将来的昌明哩！

(4) 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之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故崇拜祖先的礼俗，亦是使人发生怀古思想的一个原因。

(5) 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艺术乃是有创造天才的人所造成的，艺术不分新旧，反有历时愈久，而愈见其好者，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

怀古的思想，多发生于老年人之脑际，青年人正与相反。一派以为今不如古，总打算恢复三代以上的文物制度；一派以为古不如今，因此在学术史上就发生了争论。在十七世纪初期文艺复兴后，法兰西、意大利就有今古之争，于文艺（诗歌文学）上，此争尤烈。崇古派则崇拜荷马，崇今派则攻击荷马。此种争论，大众以为不过是文学上的枝叶问题。自孔德出，才以为这样争论，不光是在文学上如此，各种知识，都不能免，才把这种争论的关系，看得很大。这种争论起于意大利，传至法兰西、英吉利，前后凡百余年。

在历史学上进化退化的问题亦成争论。崇古派主张黄金时代说，以为人类初有历史的时期，叫做黄金时代，以后逐渐退落，而为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云云者以此。崇今派以为古代没有黄金时代，古时的人，几同禽兽，没有甚么好的可说，现在是由那种状态慢慢的进化而来的，如有黄金时代，亦必在将来，现在或是银的时代，过去的时代，不过是铁时代、铜时代罢了。其说正与崇古派相反。布丹说：“崇古派说古来是黄金时代，全然错误。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还不如他们所说的铁时代的现在；假使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和现在比一比，那个时代，反倒是铁，现在反倒是金，亦未可知。”中国唐虞时代，今人犹称羨不置，一般崇古的人，总是怀想，黄、农、虞、夏、文、武、周、孔之盛世，但此是伪造，亦与西洋所谓黄金时代相同。他们已经打破黄金时代之说，我们也须把中国伪造的黄金时代打破，才能创造将来，力图进步。这全靠我们的努力。

这个责任我们都要负着。在中国古书里面，亦可以寻出许多今古的比论，如“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其语气在古代，似有新的意味，且近似进化说。书经上说：“人唯求旧，器匪求旧维新”。这又是人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的意思。

中国人怀古的思想，比西洋人怀古的思想还要盛。因为西洋科学早已发明。科学是在自然界中找出一定的法则，有如何的因，便有如何的果，他们能用科学方法证其因果，又能就古来的，而发明古来所未有的。这样，古人的发明，都有明瞭的法则，都遗留给后人，而今人却能于古人的发明以外，用科学方法有所新发明。中国科学不发达，古人遗留下来的多是艺术的，创造全靠个人特有的天才，非他人所能及。故中国人崇古的思想，格外的发达，中国人对于古人格外仰慕，对于古人的艺术格外爱恋。

怀古思想发生之原因，及中外怀古思想不同之点，既如上述，现在我发表我对于这种思想的批评。

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我们看古是旧，将来看今也是古，刚才说的话，移时便成过去，便是现在，也是一个假定的名词。古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在今人生活之中包藏着，我们不要想他，例如现在的衣服，其形式材料，及制造的方法，极其精致，古来次第发明的痕迹，都已包藏在内，象古人所取以蔽体御寒的树叶兽皮，我们又何必去怀想他！

黄金时代说，是错误的，因为人与自然有关系，如太阳光、空气等等，人离开自然就不能生活，古时的自然产生孔子那样的伟人，现在的自然，亦可以产生孔子那样的伟人，同一的太阳光，同一的空气，在古能生的人，在今又何尝不能生？古代生的人，如

何能说是万世师表！崇古派所认为黄金时代产生之人，现在也可以产生出来，我们不必去怀古。怀古的思想，固可打破，但我们不能不以现在为阶梯，而向前追求，决不能认现在为天国。当时时有不满意现在的思想，厌倦现在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再求所以改进之方。如现在中国国势糟到此等地步，我们须要改造，不要学张勋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他们是想过去的，我们只是想将来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要知道历史是循环不断的，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1922年1月8日《晨报》副刊

## 时

今逢《晨报》第五周年纪念日，吾乃就“时”的观念，发生种种感想。“晨”为日之始，新鲜的朝气，清明的曙光，都随“晨”的时光以俱至。“晨”出吾人于长夜漫漫的暗域；“晨”导吾人于生活迈进的前途。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一朝最好是清晨。周为岁之满，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逝者未逝，都已流入“现今”的中间；盈者未盈，正是生长未来的开始。“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为“晨”为“周”，都是这大自然大实在流露出来的一体。

“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

“时”是什么东西？吾曾以之问于玄学，问于认识论，问于心理学，问于数学，问于物理学，问于天文学，都只能与吾以一部分的解答，不能说出他的真实的全体。有的物理学者说他与“以太”有关。但是“以太”云者，究为何物？仙乎神乎，百般捉摸，不能得其正体。近来物理学者努力的结果，已知“以太”云者，本无是物。欧洲有一种学问名为Chronology，译成国语曰编年学，曰纪年学，曰年代学，亦曰时学。我欲以“时”为何物，问之Chronology。但这不过是研究“时”的计算，并未涉及“时”的根本问题。心理学家又来告我，“时”是心造，因境而异。同一时间，欢娱则每恨其短，

痛苦则每厌其长；怀人则一日三秋，乐生则百年旦夕。地质学家从旁窃笑，谓史学者把几千几万年间的经过，分成上古、中古、近古诸期，其间盛衰兴亡，纷纭热闹，杳乎久矣，而在地质学者看去，这不抵一朝暮间的事。“朝菌不知晦朔，蟋蟀不知春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吾侪尽自懵着头过这朝菌蟋蟀的生活罢了。“时”的问题，不能研究，且亦不必研究。说来说去，言人人殊，“时”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

哲家者流，究“时”之义，竭虑殚思，不能得其象迹。乃有拟于空间以为说法者，谓“时”如一线，引而弥长，既被引者，平列诸点，有去来今。但以此喻说明“时”的递嬗，亦不合理。因此一线，既已引者，悉属过去；未曾引者，当在未来；现今之点，列于何所？我们知道，三世代迁，惟“今”为重；凡诸过去，悉纳于“今”；有“今”为基，无限未来，乃胎于此。如兹说法，消泯了“现今”，亦即无异丧失了人生的奥秘。凡诸过去，将于何托？凡诸未来，于何承接？此种说法，不能使人满足。我乃沈思，更得一义：既引的线，确属过去，未引的线，确在未来。然此线之行，实由过去，趋向未来，必有力焉，引之始现。此力之动，即为引的行为，引的行为，即为“今”点所在。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苟一刹那，不有行为，不为动作，此一刹那的“今”，即归于乌有；此一刹那的生，即等于丧失。本乎此理，以观历史，以观人生，有二要义，务须记取：“时”的引线，与空间异。引线于空间，可以直往，亦可以往返，我们可从北京来到上海，又可由上海返于北京。至于时间，则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我们能从昨日来到今日，不能再由今日返于昨日。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



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你不能旁观，你不可回顾，因为你便是引线前进的主动。你一旁观，你一回顾，便误了你在那一刹那在此不准退、只准进，不准停、只准行的大自然、大实在中的行程，便遗在后面作了时代的落伍者。于是另有一义，随之而起：凡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人物，都是一趟过的。无论是悲剧，是壮剧，是喜剧，是惨剧，是英雄末路，是儿女长情，都是只演一次的。无论是英雄，是圣贤，是暴君，是流寇，是绝代的佳人，是盖世的才子，在历史的旅途上，亦只是过一回的。该下的歌声，只能听得一次；马嵬坡前的眼泪，只是流过一回；乃至屈子的骚怨，少陵的悲愤，或寄于文辞，或寓于诗赋，百千万世的后人，只能传诵他们，吟咏他们，不能照原样再作他们。就是我们糊里糊涂一天一天的过去的生活，亦都为一往而不可复返。看到此处，真令人惊心动魄了。人生既是这样可以珍重的东西，那么，朝朝都有晨光，年年都有周岁，光阴似箭，一去不还，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欢天喜地的行动着，创造着过去。凡是遇在这一进不退一往不返的、只能见一面的、只能遇一遭的时的旅途上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弟兄，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握着手，欢天喜地的亲爱着、互助着，共赴人生的大路。我们不要迟疑审顾的误了好时光，更不要此猜彼忌的留下恶痕迹。机会不可复得，因缘永难再遇。我们在这万劫长流中，大家珍重，向前迈进，走此一遭，必能达到黄金世界的境域。

在空间论前后，前在我们的面前，后在我们的背后。在时间论前后，却恰与此相反。一说前日，便是指那过去的一日；一说后日，便是指那未来的一日。这样说来，后日却在我们的面前，前日反在我们的背后，日常云用，毫不觉异，此果何故？我尝细思，这等言语，很可以表示我们“时”的观念的错误，历史观的错

误，人生观的错误。寻常设想，总以为“时”的首脑在于古初，“时”的进行的方向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吾人只是立在一旁，屹然不动。回过身来，向着过去方面看，这太古的机关车带着这些未来连续不断的“时”的列车，滔滔滚滚的，似水东流，直向荒古方面奔去，所以误认过去的一日，转在吾前，未来的一日，反在吾后了。这种“时”的观念所产生的历史观、人生观，是倒退的，是静止的，是背乎大自然、大实在进展的方面的，是回顾过去的，是丧失未来的。要知“时”的首脑，不在古初，乃在现在，不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乃是向广漠无涯的未来奔驰。吾人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这“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作他的主动力，向前迈进他的行程，增辟他的径路的，不是笼着手，背着身，立在旁观的地位，自处于“时”的动转以外的。我们要改变这误谬的“时”的观念，改变这随着他产生的误谬的历史观、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倒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

在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本来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于今日，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虽以论坛权威如章行严、梁任公两先生者，亦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章先生则一面说从前衣服既由宽大而趋于瘦小，今则复由瘦小面返于宽大，以证史相的反复循环；一面又说唐碑不如魏碑，魏碑不如汉碑，以证人文的愈趋愈下，似为一种循环的而又退落的历史观。梁先生则虽犹回顾其《新民丛报》时代的进步的历史观面不忍遽弃，但细味其为文，行间字里几全为悲观的论调所掩蔽，全为退落的历史观张目，而于进步的历史观深致其怀疑。我本崇今论者，深惧此等论坛权威将为怀古论者推波而助

澜，用特揭出“时”的问题以与贤者相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复归于进步论者之林，与我们携手提撕，共到进步的大路上去，这是区区此文的微意。总之，我认“时”是有进无退的，“时”是一往不返的。循环云者，退落云者，绝非“时”的本相。即让一步，承认“时”的进路是循环的，这个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倒退的，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我们今人设若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安见不及古人？安见不能超越古人？即让一步，承认古人有非今人所能及的，有非今人所能胜的，他也只是在历史上过一趟的，演一回的，不能因为今人的崇拜与怀思，再来一次。我们只有随着这有进无退的“时”的流转，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要知此一趟的经过，此一回的演行，乃永久存在，永久传流，贯注于人类生活中，经万劫而不朽！”

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以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漂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达到，也是偶然的会。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究竟没有很大的价值。

我今就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稍有陈说，望我亲爱的青年垂听！

第一，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近来常听人说：“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我想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譬如天时，一年有一个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木枯黄，气象雕落，死寂冷静，都是他的特色。可是那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不是就从这个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么？一天有一个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种的尘嚣嘈杂，都有个一时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是从这寂寞的暗夜发见出来的么？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这样讲来，这寂寞日子，实在是有趣味、

有趣意的日子，不是忍苦受罪的日子，我们实在乐得过，不是耐得过。况且耐得过的日子，必不长久。一个人若对于一种日子总觉得是耐得过，他的心中，必是认这寂寞日子，是一种苦境，是一种烦恼，那就很容易把他抛弃，去寻快乐日子过。因为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勉强矜持的心，是靠不住的。譬如孀妇不再嫁，若是本着她自由的意思，那便是她的乐境，那种寂寞日子，她必乐得过到底；若是全因为受传说偶像的拘束，风俗名教的迫胁，才不去嫁，那真是人间莫大的苦境。那种寂寞日子，他虽天天耐得过，天天总有耐不得跟着。乐得过的是一种趣味，耐得过的是一种矜持。青年呵！我们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可带着丝毫勉强矜持的意思，必须知道那里有一种真趣味，一种真光明，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

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本来苦乐两境，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那个苦？那个乐？全靠个人的主观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标准的。我从前曾发过一种谬想，以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乐，受苦是人生本分，我们青年应该练忍苦的本领。后来觉得大错。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背着自然去做，不是勉强，就是虚伪。这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但是，求乐虽是人性的自然，苦境总缘着这乐境发生，总来缠绕，这又当怎样摆脱呢？关于此点，我却有一个新见解，可是妥当与否，我自己还未敢自信。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

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这一点一般人却是多不注意。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经是大苦；而在无事的时间，一切不正当的欲望，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疲敝陈惰的血分，周满于身心，一切悲苦烦恼，相因而至，于是要想个消遣的法子。这消遣的法子，除去劳动，便靡有正当的法则。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堕落在这里的人，都是不知道尊重劳动，不知道劳动中有无限的快乐，所以才误入迷途了。青年呵！你们要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作尊劳主义。这样讲来，社会上的人，若都本着这尊劳主义去达他们人生的目的，世间不就靡有什么痛苦了么，你为何又说要我们青年在痛苦方面活动呢？此问甚是。但是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大多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少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可能

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呵！

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人生的努力，总向光明的方面走。这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但是，世间果然到了光明的机运，无一处不是光明。我们在这光明中享尽人生之乐，岂不是一大幸事？无如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去援救他们，却自找一点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乐，偷去清洁，那种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种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旧时代的青年，讲修养的，犹且有“先忧后乐”的话；新时代的青年，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地步，能算尽了责任的人么？俄国某诗人训告他们青年说：“毁了你的巢居，离开你的父母，你要独立自营，保住你心的清白与自然，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你到那里去活动。”这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宝训，真是现代青年的警钟。我们睁开眼看！那些残杀同胞的兵士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残暴的事情么？杀人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杀人野兽么？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丑贱的事情么？卖笑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辱身的贱业么？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作罪恶的事么？他们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恶么？他们所受的刑罚，果真适当他们的罪恶

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陷于罪恶或是受了冤枉么？再看巷里街头老幼男女的乞丐们，冻馁的战抖在一堆，一种求爷叫奶的声音，最是可怜，一种秽垢惰丧的神气，最是伤心，他们果真愿作这可耻的态度丝毫不觉羞耻么？他们堕落到这个样子，果真都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废材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不得不如此么？由此类推，社会上一切陷于罪恶、堕落、秽污、黑暗的人，都不必全是他们本身的罪过。谁都是爹娘生的，谁都有不灭的人性。我们不可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远远的躲避他们。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潜藏着许多恶魔毒菌，但是防疫的医生，虽有被传染的危险，也是不能不在恶疫中奋斗。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彻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1919年3月14—16日《晨报》



##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象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望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去作我们的“少年运动”。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剷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的一生生涯，是向“少年中国”进行的一条长路程。我们为达到这条路程的终点，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

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概，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沈沈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既然是二十世纪的少年，就该把眼光放的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

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总结几句话，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1919年9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 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

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以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谨祝中国学生界的进步无量！

1921年5月4日《晨报》

## 黄庞流血记序\*

黄、庞两位先生的死，不是想作英雄而死，亦不是想作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无限的敬意！

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争斗史。最后的阶级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以下的空白怎样写法？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1922年3月23日《晨报》副刊

---

\* 黄庞是黄爱和庞人铨。黄爱，湖南桃源人。一九一九年肄业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参加过“五四”、“六三”等运动，曾两次入狱。一九二〇年回到湖南，与庞人铨等组织湖南总工会，任执行部主任干事。庞人铨，总工会的教育委员，劳工周刊及其他传单小册，多出他手，议论激烈。一九二一年四月，他们就反对第一纱厂由资本家集团的华实公司垄断而主张收归省有，

与其他六人一块被捕入狱。这一次湖南省长赵恒惕和资本家见工人声势浩大，没有敢杀害他们。出狱后，黄爱曾对慰问他的朋友说：“我的生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可以看出他们从学校出来后，实行“到民间去”，参加工人运动的坚决态度。

同年冬天，第一纱厂工人以沪汉纱厂为例，要求在年关时领年费一月，公司不允，工人遂宣言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工人三人，受伤的人很多。赵恒惕和省府官吏们受了华实公司经理五万元的贿赂，加上军阀财阀的阴险走狗的策划，黄、庞于一月十六日被捕，次日凌晨在浏阳门外就义。当时黄爱二十四岁，庞人铨二十五岁。赵恒惕诬杀工人领袖为宣布罪状事的布告是这样的：“本部迭据密报，有黄爱、庞人铨盛倡无政府主义，使劳工会各方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枝，勾结匪徒，乘冬防紧急，希图扰乱治安等情。本部派队究护该黄爱、庞人铨二名到案，诉据供认前情不讳，实为罪不容诛。除将该犯黄爱、庞人铨二名提案验明本身绑赴刑场立予正法外，合行宣布罪状，俾众周知。此布。”

这个布告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晨报》副刊刊登了黄庞被害的详细经过，题为《黄庞流血记》。大钊同志在前面写了这篇序言。

##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迴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

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坦荡平原，有时是崎岖险路。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的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得一种冒险的美趣。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



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1923年12月20日《新民国》第1卷第2号

## 自然与人生

### 一

有一天早晨，天刚破晓，我的小女<sup>①</sup>在窗外放出一群她所最爱的小鸡小鸭来。她便对他们说笑，表示一种不知怎样爱怜他们的样子。

一个天真的小孩子对着些无知的小动物说些没有意味的话，倒觉得很有趣味！

她进房来，我便问她为什么那样爱那些小动物？她答道：“什么东西，都是小的好。小的时候，才讨人欢喜，一到大了，就不讨人欢喜了。”

不讨人欢喜的东西，自己也没有欢喜，没有趣味，只剩下悲哀和苦痛。

一切生命，都是由幼小向老大，死亡里走。

中央公园里带着枯枝的老柏，对着几株含蕊欲放的花，显出他那生的悲哀，孤独的悲哀，衰老的悲哀。

### 二

迟迟的春日，占领了静寂的农村，篱下雄鸡，一声长鸣，活绘出那懒睡的春的姿容。

<sup>①</sup> 小女：指星华，作者的长女。

街头院内，更听不着别的声音，只有那算命的瞽者吹的笛子，一阵一阵的响。

“打春的瞎子，开河的鸭子。”这是我们乡土的谚语。

鸭出现了，知道春江的水暖了，瞽者的笛响了，知道乡村的春来了。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家家都有在外的人，或者关外营商，或者在边城作客，一到春天，思人的感更深，诸姑姊妹们坐在一团，都要问起在外的人有没有信来。母亲思念儿子，妻子思念丈夫，更是恳切！倘若几个月没有书信，不知道怎样的忧虑。

那街头的笛韵，吹动了她们思人的感怀，不由的不向那吹笛人问卜。

也有那薄命的女子，受尽了家庭痛苦，尝尽了孤零况味。满怀的哀怨，没有诉处，没有人能替她说出。只有那算命的瞽者，却能了解那些乡村女子的普遍心理，却能把她们的哀怨，随着他的歌词弦调，一一弹奏出来，一一弹入她们的心曲，令她们得个片刻的慰安。那么乡村里吹笛游街的瞽者，不只是妇女们的命运占卜者，实在是她们的痛苦同情者，悲哀弹奏者了。

### 三

我在乡里住了几日，有一天在一邻人家里，遇见一位和蔼的少年，他已经有二十岁左右了。

我不认识他，他倒认识我，向我叫一声“叔”，并且自己说出他的乳名。

沉了一会儿，我才想起他是谁来了。他是一个孤苦零丁的孩子，他是一个可怜的孤儿。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了。那时他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孩子。

他父亲死的时候，除去欠人家的零星债务，只抛下一个可怜的寡妇，和一个可怜的孤儿。

他的母亲耐了三年的困苦，才带着他改嫁了，因为不改嫁，就要饿死。

他的母亲照养他成人以后，他又归他本家的叔父母，不久便随他叔父到关外学习生意，如今他是第一次回家了。我问道：“你去看你的母亲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的母亲照养你一回，听说你回家了，一定盼望你去看她，你怎么不去看看她呢？”

他说：“怕我叔婶知道了不大好。”

唉！亲爱的母子别了多年，如今近在咫尺，却又不能相见！是人情的凉薄呢？还是风俗习惯的残酷呢？

#### 四

死！死！死！

自从稍知人事的时候，提起这个字来，就起一种恐怖心。

去年夏天在五峰避暑。下山的时候，瘟疫正在猖獗。路径四五十里，村里尽是哭声，村边都是新冢，死的现象，几乎把我包围了。

我当时在这种悲哀恐怖的境界里走，对于“死”的本质发生很深刻的思索。

死是怎么一回事？死真是可恐怖的吗？死了的人，还有什么悲哀痛苦么？这些问题都从我脑海的底下翻浮上来。

我当时的感想是：

“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才成无始无终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对于自然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真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

“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有苦痛的，生也是有苦痛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

人为什么都乐生怕死呢？这都是依恋的缘故。

物理上有一种“惰性”，人性亦然。由天津往上海迁居，对于故居，总是不免有些依恋，其实上海的新居，未必比天津旧居有什么苦痛。冬天早起，临行冷水浴，望见冷水总觉得有些战栗。跳入其中，沐浴顷刻，也还有一种佳境。出浴后，更觉得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人对着死依恋生，也是一样的心理。

赤裸裸的人生，总不要有所依恋，总不要穿上惰性的衣裳。

我们行了海水浴，行了春风浴，还要时时行自然浴。

死的地，死的岭，都是联络人生与自然的途径。

匆匆又是一年了。我再过昌黎的时候，去年的新冢，已经丛生了一层荒草，遥看那荒草里，仿佛又现了青青的颜色了。

东坟一个老妪，西坟一个少妇，都跪在地下哭。那种悲声，和烧纸的飞灰，似乎一样的高低上下。

啊！今日是寒食节了。

我细听她们的哭声，里边都有怨诉的话，大概都是说死者抛了生者去了，死者无知，而生者苦了。

这样看来，在死人前哭，不是哭死者，乃是哭生者；不是吊坟里的人，乃是吊坟外的人。那山前山后的野哭，不是死亡的悲声，乃是生活的哀调。

1920年6月20日《新生活》第38期

## 游碣石山杂记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世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蓊郁接天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缈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古诗有云：“而今再过经行处，树老花残僧白头。”重寄感旧之思。予以重来五峰，青山依旧，森树丛茂，不减当年，守祠人仍为前度刘郎，健干一如曩者，而同游者则易为子默，且仅一人。回首旧游，天涯零散，子衡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乱离身世，而予尚得汗漫到此，不胜今昔之感也已！

五峰在昌黎北十二里，仙人顶迤东，群山矗立，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五峰环峙，势若列屏。自东向北西历数：曰望海，曰

锦绣，曰平斗，最高曰飞来，曰挂月。昌黎祠在山腹，建自有明崇祯年间，本圆通寺旧址，积石叠起，扩其地基，敷筑庭宇，盛植花木，于虚无缥缈间，万树深深，拥空中楼阁。凭垣一眺，东南天海一碧，茫无涯际。俯视人寰，炊烟树影，渺然微矣。

圆通寺规模故小，明季关东边患起，蓟、榆一带，为辽东咽喉，京畿屏障，昌黎尤为榆关内之要隘。军务重镇之驻邑城者，游踪时来五峰。今昌黎祠内有二配像，复有四牌位：（一）署钦差巡抚山永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朱，（二）署钦命督师总率关辽兼制昌、蓟、通、保、登、津等处军务兵部尚书范，（三）钦差分守宣化府兵备道山西布政司参议朱，（四）署知昌黎县事蒋。心窃疑之，迨摩挲断碣，知是祠也，乃朱范等因昌黎二字而建，以五峰名胜，必因人始彰，故借文公为名山生色。而四氏之配享，则邑人士所建之生祠也。出祠沿西山坡南行，至挂月峰下，有一洞，石门半掩，苍苔满地，白云出入其中，额曰范公洞。有石刻像，是即祠中配享之范志完也，相传卒于山中，故邑人造像以志之。余闻之乡先生，满清之入关也，首攻昌黎，邑人悉数入城坚守之，围七日不破。虏急于据燕京，遂西行，奔之去。全邑民命，获以保全。朱范诸人，既握兵柄，自必与于此役。然则强臣重镇，虽不能摧败强敌，捍卫疆土，而当亡国之际，尚能死守孤城，厥功亦不可没。故谓数子皆明末遗老，鼎革后隐居于此，信有由也。顾吾以为数子者，或握兵符，或膺疆寄，或职亲民，果于戎马倥偬之际，卧薪尝胆之秋，尚忍荒嬉林泉，流连风景，则明之亡，庸岂无故，而数子者，又乌容辞荒职误国之咎。若至事不可为，满人已僭窃中土，始相率隐避，空山歌哭，借保明室衣冠，则数子者，殆亦不失为明季之伤心人也。后之游者，得毋兴故明河山之慨乎！

范氏名志完，中州人，予于祠壁见刻其游水岩长歌一首，颇



足记此山景物之一般，兹录于左：

### 游水岩歌(并序)

辛巳春日，予于北平谒孤竹而还，道经昌黎，瞻文公祠。次日，同郡丞冯诗吾蒋魁宇，访胜水岩，过中庵仙人台。东迤则为龙潭、瀑布泉，又东则为西五峰。层峦叠嶂，迴山尘寰。俯而视之，昌邑瀚海，较若列眉，诸峰环峙，若拱若卫，遂据此山之胜，因弄笔记之。

春朝访胜水岩边，桃柳迎风色正妍。偶延二客来翩翩，掀髯相谈意更玄。叠嶂堆里步踟蹰，行行且止共盘旋。山中老树不记年，松子森森似球圆。中峰再上半云烟，层峦相对两峰联。老僧引路视龙潭，上有仙岩下有川。石花层层密似笋，古松斜挂如画悬。龙潭迤东瀑布泉，银碗称来不用盘。把酒峰前杯觞传，椿头菽芽味正鲜。遥望五峰境如仙，二客乘马我腾颠，须臾相会五峰前，景色幽然别有天。诸峰错落如珠璫，三泉涓涓清且涟。松风鸟韵春管弦，石洞幽幽可参禅。昌邑城市灿如廛，瀚海汪洋列画船。登高览胜忆先贤，一僧孤立高峰颠。我欲往从解尘缘，佛骨一表法凛然。

文公案前置有枯松，枝作龙形。盖闻祠后有三泉，今仅存其东西二者，中泉正与祠宇相值，巍石壁立，有小泉突出石隙，可一尺。尤侗题壁诗云：“五峰清不断，引入白云中。春后山涯雪，秋空海上风。三钩菩提井(祠后有泉三口)，一尺大夫松(石线进松，长仅尺许，寺僧云已数十年矣)。怪石排如笔，森严拱巨公。”而范氏诗中，亦有“三泉涓涓清且涟”之句，则松与泉已久供诗人吟咏之资，泉水自石罅流贯入口，浸润松根，收天然灌溉之利。厥后泉忽涸而松亦随枯，工人伐木，辄加斲成龙形，置案上，为存一古迹也。

挂月峰东南角，层峦高耸，片石突起，作龟形，故名龟石。石上有印月痕，如弓湾然，相传每岁阴历八月十五夜，月华团圞，

如挂龟石上，此挂月之所由名也。

自文公祠东绕，出望海峰，下坡沿岭东走，为东五峰，山村四五家，果树环绕，不见屋瓦。山犬不惯见人，辄狺狺狂吠，逐白云出。时值秋梨正熟，与园主话片刻，竟由树摘数十枚赠焉，坚不受价，此种人惟于山陬间尚能遇之，久居都市者乌肯为此。予等坐石上濯足毕，乃踉跄寻故路。途次摘采山花，兼拾松子，不知夕阳已西下岭，倦游归去。长歌采薇，悄然有慕古之思矣。

水岩寺亦碣石胜境之一，在五峰西南五里许。予与子默唱三往，古寺荒凉，了无奇迹。惟正殿阶栏有二石柱，八角菱形，镌唐经文，摩挲久之，苔浸雨蚀，已模糊不克尽识，未署保宁元年，盖越代物也。寺东院有得月亭，每值夏季，游人麇集，地近城市，人迹甚杂，俗器侵染，其幽雅迥不若五峰远甚矣。

自邑城入山，东西二馒首山，犄角相持，如天然门户。东馒首山后为桃源山，旧为崔氏有。崔故昌邑望族，累代书香，名流辈出，崔子玉及其哲嗣伯振，均以能文著于时。广修文公祠记，勒碑铭壁，文字俱奇健不群，即子玉作也。录如左：

碣石苍苍，溟海茫茫，佳气孕灵，宜有磊落奇伟任大任者，崛起于其乡。孤竹子青风其杳如耶？相与二三同志，俯仰今古，潸潸下岷山之泪。客有指顾五峰，称道唐贤韩文公者，公家世邑乘有书。明季朱、范两公购置圆通禅院，建公祠。今春晓山贤裔，以妥神之余，大启尔宇，为谒山祠者游憩地。当夫山雨过檐，海月度岭，披云兀坐，手公遗文一编，朗诵数过，觉涛声万里，沸沸松岩间，时而壮公微言两道，正论格君，使有唐三百年来天下，如乍闻雷霆而复见日月；时复悲公磨蝎之运，遭际屯蹇而卒，气数不易乐道之胸，谗谤益昭永世之名。不禁酹酒阶前，拜首稽首，望我公翩然来下大荒也。同治十三年春崔树宝。

斯文虽寥寥短幅，足见其胸中蕴积，有奇气，匪俗士所能道

其只字。更于壁间见一绝句，题为《桃源山访崔子玉》，诗云：“寂寞遥天带晚霞，云深何处是君家。渔人未识桃源路，不问樵夫问落花。”知其相与过从者，亦为一时隐逸清高之士。名山得名士足迹往还其间，草木云烟，当时亦颇不寂寞。厥后伯振亦尝设馆山中，吾友刘允之，即出其门。高躅前修，杳不可复睹，伯振闻亦于近岁以病死。桃源山松梨故宅，近复展转以归他氏有。家山沦落，名士漂零，吾辈游人过其侧者，犹徘徊不忍去。而允之年来牢骚避世，执教鞭于碣阳成美学馆。课余之暇，时或于荒凉云树间，追寻陈迹，故山函丈，形影依稀，纵有松风泉石，亦岂足以塞允之之悲也！

桃源山今主为浙江陈氏，现在燕京，供职督府。闻以束钱四万串购得之。于梨园中构一居宅，颇幽雅。惟以移借道路，与山中人涉讼，恐不得久居此。信乎尘海深山，清浊异趣之扞格不相容也。余居山中，每入城，过陈家山（陈氏改为陈家山），辄羡叹不置，盖吾侪野人，久怀厌倦风尘之思，曩尝与同志抱买山之愿，而苦于无钱。噫！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空山净土，为朋辈拓隐之所。斯则吾与青山之缘遇何如，且当于吾与黄金之缘遇何如卜之矣！

碣石山中，猛兽绝少，惟傍晚则有狼狐等小兽出没，曩者亦尝有虎豹藏匿其间。数十年前，樵夫尚于平斗峰上得一死豹。近以人迹日多，兽类避去，故独行深山中，了无顾忌云。

余自山中访允之，再往始遇。盖余以京友函招，须西上，且当旋里一行，故匆匆立谈片刻，仅为子默介绍，恐其独处山中嫌寂寞也。迨自家返昌黎，复与子默、允之等入山一次，居成美学馆二日，备受杜瀛州夫妇之优遇。宗教家之诚恳与世，其爱慕宏感且不绝于余之心矣。惟此荏苒十日间，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孤

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首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土，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不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山中十日，游兴未尽。其中庵龙潭瀑布泉、仙人顶、石佛洞等处，则期以后日焉。

1913年11月1日《言治》月刊第6期

## 五峰游记

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

我们那晚八时顷，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到滦州车站。此地是辛亥年张绍曾将军督率第二十镇，停军不发，拿十九信条要胁清廷的地方。后来到底有一标在此起义，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

车站在滦州城北五里许，紧靠着横山。横山东北，下临滦河的地方，有一个行宫，地势很险，风景却佳，而今作了我们老百姓旅行游览的地方。

由横山往北，四十里可达卢龙。山路崎岖，水路两岸万山重叠，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而景致绝美。由横山往南，滦河曲折南流入海，以陆路计约有百数十里。

我们在此雇了一只小舟，顺流而南，两岸都是平原。遍地的禾苗都很茂盛，但已觉受旱。禾苗的种类，以高粱为多，因为滦河一带，主要的食粮，就是高粱。谷黍豆类也有。滦水每年泛滥，河身移徙无定，居民都以为苦。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虽有时受害，而大体看来，却很富厚，因为他的破坏中，却带来了很多的新生活种子，原料。房屋老了，经他一番破坏，新的便可产生。土质乏了，经他一回滩淤，肥的就会出现。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

方的旧生活破坏者，新生活创造者。可惜人都是苟安，但看见他的破坏，看不见他的建设，却很冤枉了他。

河里小舟漂着，一片斜阳射在水面，一种金色的浅光，衬着那岸上的绿野。景色真是好看。

天到黄昏，我们还未上岸。从舟人摇橹的声中，隐约透出了远村的犬吠，知道要到我们上岸的村落了。

到了家乡，才知道境内很不安静。正有“绑票”<sup>①</sup>的土匪，在各村骚扰。还有“花会”<sup>②</sup>照旧开设。

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了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是由陆路来的，约有八十里。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毙。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是碣石山的一部，离车站十余里，在昌黎城北。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

车不能行了，只好步行上山。一路石径崎岖，曲折得很，两傍松林密布。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筑在山上，大概窗前都有果园。泉水从石上流着，潺潺作响，当日恰遇着微雨，山景格外的新鲜。走了约四里许，才到五峰的韩公祠。

五峰有个胜境，就在山腹。望海、锦绣、平斗、飞来、挂月，五

---

① “绑票”：土匪将人绑去，向他家里要钱，钱到可以把人赎回；如不如期来赎，或是钱不足额，就把被绑的人杀了，叫作“撕票”。

② 乐亭有出“花会”的风俗，系一种赌局，有三十六门。每日出两次，由三十六门中圈出一门叫作“出会”，中者一文可得三十文。各村都有叫作“跑封”的人，把押会人的封和钱送到会局；中了的封，也由他把钱从会局带来交给押会的人。收封时，会局给他抽头，押中了时，会人给他抽头。各村男女小孩都如痴似狂的押会，荒废正业，败坏风俗；常有倾家荡产的人，妇女也有因输钱过多而被迫卖淫、自尽的。

个山峰环抱如椅。好事的人，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祠。下临深涧，涧中树木丛森。东南可望渤海，碧波万顷，一览无尽。我们就在此借居了。

看守祠宇的，是一双老夫妇，年事都在六十岁以上，却很健康。此外一狗、一猫，两只母鸡，构成他们那山居的生活。我们在此，老夫妇替我们操作。

祠内有两个山泉可饮。煮饭烹茶，都从那里取水，用松枝作柴，颇有一种趣味。

山中松树最多，果树有苹果、桃、杏、梨、葡萄、黑枣、胡桃等。今年果收都不佳。

来游的人却也常有。但是来到山中，不是吃喝，便是赌博，真是大杀风景。

山中没有野兽，没有盗贼，我们可以夜不闭户，高枕而眠。

久旱，乡间多求雨的，都很热闹，这是中国人的群众运动。

昨日山中落雨，云气把全山包围。树里风声雨声，有波涛澎湃的样子。水自山间流下，却成了瀑布。雨后大有秋意。

1919年8月30日《新生活》第2、3两期

## 从五峰致郁嶷信\*

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磴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羨煞也。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诗肃天问<sup>①</sup>函中，余不白。此致

宪章兄

弟 钊 顿首

---

\* 郁嶷，字宪章，作者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湖南澧县人，《言治》月刊主编，曾任北京朝阳大学教授。著有《郁嶷文集》。

① 肃：原文是草体字，疑为“肃”。天问：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



## 致若愚、慕韩信

若愚、慕韩两兄：

我到山中已将旬余，未能修函来告，实以交通不便之故。（此间离城十里许信到京只须一二日，惟此十里之许交通甚缓。）

我所居的地方名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楼，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兄等盍来此一游？夜间八时由京登车，次晨天明即到，车票三等票现金四元余即足到此，生活费甚简，弟可作主。东行二三站，即是北戴河山海关，大可一游。

弟 钊 白

1919年8月15日《少年中国》1卷2期〔会员通讯〕

## 关于《新青年》的一封信\*

适之吾兄先生：

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sup>①</sup>；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象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边的人被了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sup>②</sup>所以我们愈应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弟 大钊

---

\* 这封信过去不曾发表过。原稿没有署明发信日期，从信中所说的“从这回谣言看”与《新中国》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来推断，这封信大约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大钊同志在这封信里向胡适建议，主张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的人团结起来为文学革新奋斗，说《新青年》同人中既然多数不赞成办《新中国》，不办也好，劝胡适千万注意《新青年》的团结，可见这时《新青年》内部已发生了分裂现象。到了第

二年，胡适因不能容忍《新青年》变成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公开提出分裂《新青年》阵营的主张，分歧便越来越明显了。

- ① 《新中国》月刊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〇年八月，共出版两卷，每卷八期。
- ② 这里所说的从这回谣言看因《新青年》里边的人被摧残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公愤，是指当时发生的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谣言：是指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间流传的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因《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而被驱逐出校的谣言。据《每周评论》当时揭露，以封建“卫道”者自居的林琴南，在上海申报发表梦想小说《荆生》，含沙射影攻击陈、胡等人，并企图借武人政治的权威压制鼓吹白话文学，甚至唆使议员张元奇等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干涉北京大学的新思潮运动，要求撤换校长蔡元培，否则参议院将对傅提出弹劾案。林琴南的这种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愤慨，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新、旧思潮的极大关注。三月九日，《每周评论》特别转载了林琴南的小说《荆生》并加了编者案，以之公布于众，同时还从《晨报》转录了李大钊同志的《新旧思潮之激战》。随后，又发表了陈独秀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

## 旅行日记

昨晚八时三十五分由北京乘京奉通车出发，幸乘客不甚拥挤，余因得二三尺地以容身，车中灯光暗淡，众客多沉沉睡去，余则手一第三卷第二号《新青年》杂志以消旅闷，时亦在似睡非睡之间，但觉车轮轧轧之声与验票者之怪声狂吼常触耳鼓，最为可厌。盖余尝见日本车中验票者之一团和气，每入一车必鞠躬道歉；倘遇有睡熟之客，亦必低声附耳向之索票，惟恐有所惊扰于人，如吾国“票来！”“票来！”之声浪，含有最可憎恶之趣味者，殆绝无有。此虽小事，而足与旅客以不快之感者至多；彼其气焰，纯与仗官势之恶差悍役相类，绝不似营业者之照应顾客也。夜半，车抵天津，有新登车者互相争嘲，此种现象亦足令人伤心。同胞相与之际，毫无一种爱敬逊让之情礼，以相维系，长此相凌，将何以国！余未尝游过欧美，彼邦人士，相与之际视此何若，余不敢知；睹此又令人想起日本人之在电车，少壮者见老幼者、或携重物者来，必起而让之座，以与吾因争座每致互相怒骂、互相扭打者相较，吾人宁不愧死。尝闻张溥泉先生言，彼往欧美最喜看者是其社会；所谓社会者，非指素相认识之朋友，素相亲爱之家族而言，乃谓素不相识之人于萍水相逢之际，各有一定之情谊，相当之礼让。真正之社会关系，恒于此处见之。吾国则无有是。今观乎此，益觉其言之可思也。

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失败之地，白亚

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余推窗北望，但见丘山起伏，晓雾迷濛，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象，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正驰想间，曙光一线，滦州城已映入余之眼帘，更联类忆及辛亥之役，张绍曾将军拥一师劲旅，虎踞此处，与吴绶卿、蓝天蔚二将军谋取燕京，震撼根本，煌煌一电，足寒清廷之胆，而十九信条之颁布，遂为逊位诏之先声。此其遥助义军之声势者不少也。惜乎机事不密，绶卿既遭人暗杀，张君亦被迫去职，蓝君又不得不去兴京，此蓬蓬勃勃之北方民军之势，乃大受挫折，卒以三营之众为最后之牺牲，最后之纪念。此诚吾人今日思之犹有余痛者也。使吴、张、蓝三君之计划实现，则民国何至有癸丑之役，何用有西南之役，又何至有今日之局面也！厥后蓝君竟未一握兵权；张君虽曾任绥远将军，时袁氏称帝之阴谋，已见端倪。张君一日语人云：有某在，彼何敢称帝？为袁所悉，旋即解职矣。由是观之，张君之志，不可谓不大，其气亦不可谓不勇，惜于深沉二字，尚欠工夫。国家多难，老成相继雕谢，求足备干城之选者，能有几辈如张蓝其人者？正宜厚自修养，为国自爱耳。

抵昌黎，下车投大德增客栈。便饭毕，已八时顷，请店伙为雇骡车一辆，驱之入碣石山。桃杏梨花均已落尽，惟有苹果、海红之花，残余数株，点缀于万绿丛中，似专待此迟至之看花人者。先至隐仙庵，道士出为导引，遍览其祠观神堂等。庭前有牡丹数丛，桃梅一株，颇茁盛。由隐仙庵至五峰山下车，不能进，乃舍车攀石磴寻樵径而上，至山腹，约半时许，一路松风飒飒作响，与啾啾鏗锵之山鸟相应和，恰如山中之自然的军乐，所以慰安游人攀

登之疲倦，并助奋其进行之勇气者也。比至韩文公祠，汗已浹背。守祠人刘翁克顺，年已六九，不相见者三年于兹矣，渠尚能相识。彼于去岁，续娶一老媪为之作伴，故久居空山，亦不寂寞。翁媪为余用松枝烹茶，并煮米粥一盂，菜蔬则盐渍椿芽与酱腌鸡子而已，食之颇有清趣。余由东面登望海峰，以天气不甚清明，但见东南一带，茫茫无际，天水莫辨也。二时许，下山驱车返大德增栈，时投宿之客，纷至沓来，大概皆吾乡人之赴关外者，盖此时正归里商人赴东之季节也。间亦有女眷至，余询店伙，以彼女眷等何往者？则答以将往关东。今年乐亭一县，女眷之往东者不下数百人，其故以东省钱毛汇至家中，损失过巨，商人遂纷纷迁其眷属至东云。余闻之颇喜，盖东省商人，以吾永七为最多；永七之中，尤以昌、乐、临、抚人为众，是等县人之向来往东经商者，皆不携眷，所以终不能植深厚之根据于东省，今则渐渐觉悟矣。国人多一个定居东省者，即日本人少一个侵入东省者，斯不独一乡之幸也。明晨南归，尚有陆路八十里，余容续陈。

1917年5月11日《甲寅》日刊

## 关于出版蔡和森 《俄国社会革命史》的两封信

### 一\*

适之吾兄：

前者路过上海，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未遇。尊恙已痊愈否？念念。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如何？盼赐复。校中已决于九月十日举行开学礼，但上课恐须至下月了。

弟李大钊

### 二

适之兄：

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他的原稿送交先生，如能收入《世界丛书》，即希赐复，以便转达和森。

弟李大钊

---

\* 从此信信封上的邮戳看出，信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发出的，寄自北京石驸马后街三十五号，署名李守常。胡适之的收信地址是浙江西湖烟霞洞。

## 挽孙中山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子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sup>①</sup>，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夺，经济侵袭，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1925年3月，《孙中山哀思录》第三编

---

①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孙中山逝世后，大钊同志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右派竟要宣布开除李大钊同志等共产党人。一九二六年初，针对右派另立伪市党部的分裂活动，在翠花胡同八号举行了一次升旗典礼。大钊同志在题为《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讲中指出：“有人挥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喊出青白化的口号，来对抗赤化，反对赤化，似乎青白化与赤化是相反的东西。其实这是大错：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旗帜。”“中外人每起一种怀疑，说中国民众已废弃了国旗（指五色旗——引者）殊不知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是国民领袖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旗。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合工



农民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亦就是中国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征”。李葆华同志曾回忆说：这天父亲回到家里以后，向我们讲起同国民党右派的这场斗争，他说：“右派只讲青天白日，那怎么行！我们还要满地红嘛！”大钊同志在哀悼孙中山的这副挽联里，旗帜鲜明地阐释了当时党的主张，强调“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要为人间留正气”，而且要问何人继起革命？他回答：“亿兆有众，惟工与农。”

##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

——讲演记录

今天是追悼列宁同志及“二七”工友。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

列宁同志一生的事业，大家大概都晓得。现在只拿出一点来说：俄国自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据我由俄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须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关于其他事略，鲍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但是今日何日？就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演讲事情到汉口，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难过。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现在还有许多工友们在那里流离失所，保定监狱里还有工人同志，长辛店还有许多同志家属非常可怜，这些都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死，他们不是为自己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为争自由而死，与在军阀底下争自由，都是很壮烈的。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

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今日纪念会当中，有一位林祥谦同志，当时被军阀拿去，迫他开工，但他不肯，说：“非有工会命令，头可断而车不可开！”军阀遂将他的头砍下。又有一位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他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国民革命中，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京汉路流血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流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

“二七”被难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象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象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

列宁同志与“二七”工友皆已死去，然他们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

（张善铭、裕业记）

1924年2月16日《新学生》第14期

“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号”

## 列宁不死

列宁逝世，全人类的损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损失了一个这样重要的朋友，更使我们感伤无已！

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业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他曾说过：“苟能成就世界革命，即使俄罗斯民族蒙莫大的牺牲，所不敢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列宁的精神气魄，何等仁勇！何等悲壮！

这样一位仁慈忠勇献身于全人类的人，在他的生前不知蒙了多少怨谤，被了多少恶名；直到死后，大家才渐渐的认清了他的为人。可见，说出真理者之遭世侮辱，自古已然，而真理之终能昭著于人间，必恒在说出真理者之为举世所谤毁以后，亦凡为人类历史上的常例。

列宁为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维持其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

1924年3月30日

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刊行的《列宁纪念册》



第四辑

政论、学术论文



## 庶民的胜利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



与“大……主义”相反。欧洲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极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

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

## Bolshevism 的胜利\*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

---

\* Bolshevism, 今译布尔什维主义。

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 Hohenzollern 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兹基（Trotsky）<sup>①</sup>、郭冷苔（Collontay）<sup>②</sup> 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sup>③</sup>、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sup>④</sup> 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整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

---

① 陀罗兹基，今译托洛茨基。

② 郭冷苔，今译科伦泰。

③ 列卜涅西，今译李卜克内西。

④ 马客士，今译马克思。

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 就是俄国Bolsheviki(布尔什维克)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过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Bolsheviki是何意义？女杰答曰：“问Bolsheviki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 ①在东欧是Bolshevika的话，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Czar 的战争，是Kaiser 的战争，是Kings 的战争，是Emperors ② 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

①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② Czar, 俄国沙皇。Kaiser, 德、奥的皇帝。Kings, 国王们。Emperors, 皇帝们。

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 Bolsheviki 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 (Harold Williams) 的通讯，他把 Bolshevism 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 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 Bolshevism 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 Bolshevism 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 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

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 (Frederic Harrison) 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猛烈，不可能，反社会的，象 Bolshevism 的样子，须知那也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 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陀罗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 与世界平和》书中，也曾说过：“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似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

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他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书中的主义，是在陈述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体通篇，总有两事放在心头，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对于德奥的社会党，不惮厚加责言，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协助资本家的战争，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陀氏的责言，已经有了反响。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

## 祝黎明会

日本吉野、福田、今井诸博士，结合新派学者，创立黎明会。揭出三大纲领：（一）学理的阐明日本国本完成日本在世界文明进步中特有的使命；（二）扑灭逆着世界大势的危险的顽冥思想；（三）顺应战后世界的新趋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固充实。细察这三条纲领中包含的精神，就是主张公理，反抗强权，打破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完成日本国民的共同生活，使他与世界人类共同生活调和一致。现在这黎明运动的声光，已经照耀三岛的全境。想不到这沈沈黑暗睡死的东方，也有曙光一线了。

我们中日两国，本来有最亲切的关系。我们要想在世界人类中有点贡献，自然先要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在加入人类共同生活之先，东洋民族应该先有共同生活的关系才能完成这共同的使命。但是这种共同生活的关系，因为有一部分军阀的强权，在中间妨阻，不但不能发生，而且愈弄愈远。将来两国军阀的亲善，却愈引起两国民众的猜嫌。现在平和会议正在开议，我们东洋民族有许多对于世界文化进步的责任，对于世界共同生活的要求，都不能够作一致的主张，向同一方面共同努力。这真是莫大的遗憾。

因为少数恶魔的拨弄，同是东亚的民族反不能开诚见心，仿佛在黑暗的地方你猜我怕的一样。你想这样苦闷的生活，我们岂能长受。要知东亚的黑暗与光明，都是我们东亚人人共同享

受的。中国若是黑暗，日本不能独自光明。日本有了光明，中国不能常在黑暗。同此天地，同此日月星辰，只要有了光辉，我们都能认清这共同生活的道路。

黎明的曙光现了！东亚的晨钟响了！这些鬼鬼祟祟的恶魔，都该销声匿迹了！我们中日的民众，才能趁着这光华曙色，打个照面，行个握手，结一个联合，然后偕着我们东亚的兄弟们，偕手同行，加入世界人类的大联合。我祝日本的黎明。从今以后曙光灿烂。我祝中国的黎明，也快快大发曙光，和日本的黎明相映照。我祝世界人生的光明，也有我东方黎明的光辉，作他一部分的原素。进！进！进！黎明会！

1919年2月16日《每周评论》第9号

## 新 纪 元

新纪元来，新纪元来！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我们今日欢祝这新纪元，不是象那小儿女们喜欢过年，喜欢那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帖，恭喜的套话照旧说，新衣新裳照旧穿戴。那样陈陈相因的生活，就过了百千万亿年，也是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这样的新纪元，才有祝贺的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的，人口的增加没有限制，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一定的大小，若不能自节生殖，不是酿成疾疫，就是惹起战争。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所以强大的国家都要靠着兵力，扩张领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执着人种的偏见，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学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以足用了。从前的战争靠着单纯腕力，所以皇家、贵族、军阀、地主、资本家，可以拿他们的不正势力，驱使几个好身手的武士，作他们的爪牙，造出一个特别阶级，压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没法子可以制裁他们，只有受他们的蹂躏。从今以后，因为现代战争，要靠着工业知识，所以那些皇家贵族等等，一旦争斗起来，非仰赖劳工阶级不可。从前欺凌他们侮辱他们，现在都来谄媚他们，夺去他们的工具，把武器授与他们。他们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劳工阶级有了自卫的方法，那些少数掠夺劳工剩余的强盗，都该匿迹销声了。从前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下，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本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从今以后，生产制度

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从前尚有几个皇帝、军阀残存在世界上，偷着作鬼祟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们作鬼的契约，常备兵是他们作鬼的保障。他们总是戴着一副鬼脸，你猜我忌的阴谋怎么吞并、虐待那些小的民族。虽然也曾组织过什么平和会议，什么仲裁裁判，但在那里边，仍旧去规定些杀人灭国的事情。从今以后，人心渐渐觉醒。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美国威总统，也主张国际大同盟。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象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第3号

## 劳动教育问题

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 Democracy<sup>①</sup> 的颜色，都沿着 Democracy 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 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 Democracy 的时代。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 Democracy 的表现，因为 Democracy 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以致合理工作的生产者，反不得均当的分配，断断非 Democracy 所许的。应该要求一种 Democracy 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不但这个，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尚有灵的要求。一个人汗血滴滴的终日劳作，靡有工夫去没发他的知识，陶养他的性灵，他就同机械一样，牛马一般，久而久之，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没有什么区别。人但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物质的结果，是资本家莫大的暴虐，莫大的罪恶，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

---

① Democracy：今译民主，五四时期，也译为“民主主义”、“平民主义”等，或音译为“德谟克拉西”。

现代的劳工社会已竟渐渐觉醒，我们常常听见他们有“一日工作八时”、“一周工作四十时”、“假期休工不停给”种种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我们游惰性成的社会，必然是更表同情。可是他们的同情，未必和人家这种要求的本意一致。我们这些游惰性成的人，必以为少做点工，挪出工夫来可以去嫖去赌，去作些与人生无益有害的举动，岂不快乐。那晓得这省出来的一点时间，在人家正是工人的神圣时间，要拿他去读书，去看报，去补习技能、慰安灵性，非常的宝贵，那忍轻轻的把它抛弃呢？

凡是一个个人，靡有不愿脱去黑暗向光明里走的。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不幸生在组织不良的社会制度之下，眼看人家一天天安宁清静去求知识，自己却为衣食所迫，终岁勤动，蠢蠢的象牛马一样，不知道人间何世，这种侮辱个性、束缚个性的事，也断断非现在 Democracy 的时代所许的。因为 Democracy 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份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智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战后劳工生活改善的第一步，就是这种补助教育机关的设备。我们预知，战后欧美的书报机关，必将愈益扩张，愈益发达，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英国这次社会改革的方案中，也有改革村落生活的一条，打算各村均设一所大会堂，多设书报社，这真是应时的设施了。从前李石曾先生说过，欧洲有益人类



的学术文艺，都从工作中得来；倘不尊重工作，有甚么学说文艺，都不过供政治上的牺牲罢了。仔细想来，此话甚有道理。欧洲工人生活改善以后，必有新文明萌发于其中。象我们这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望关心社会教育、劳动问题的人注意！

1919年2月14、15日《晨报》

##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我且举一个近例，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来一场义和拳的大祸。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

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噫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

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的，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

还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抑制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1919年6月1日《每周评论》第24号

##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凡是世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里过人的生活，我们决不把他认作私有物，拒绝他人。但是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做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威尔逊这位书生，天天在那里对那些强盗说“正义”“人道”的话，组织“国际联盟”哪，希望“永久平和”哪，这真是对牛弹琴。只落得那些强盗们对他瞪眼，他自己也是对他们呕气，希望他的人灰心。

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

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象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人家为保障一国的强盗权利，还有退出和会的决心勇气，你为保障世界平和，贯彻自己的主张，竟没有退出和会的决心勇气。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常向我们说和我们有同种同文的情谊的日本人啊！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拚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依我看来，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吗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作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这话并不是我太刻薄，试一翻日本的移民史，那一处不是这几色人先到？除去这几色人还有什么人？——那背包卖药的还是第一等的——在这等地方的商人、绅士、官吏、军人，也都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淫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这又何苦呢！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民，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

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第22号

## 过激派的引线

昨天我接了一封美国朋友的信，中间有几句话，讲欧洲现在和议的情形和过激派的关系，虽然是激烈一点，却着实有理，等我把他写出来，请大家共阅。他说：

近日和议将开，惟协商国的守旧党，忽又一齐出台。既要德国偿还各国战费，又要割土让地，且极反对国际联盟的办法。威尔逊自到欧洲以来，也是到处“疏通”。十四条究竟几件能见实行，颇属疑问。吾意照这些顽固东西的办法办去也好，盖不如此，则过激主义将限于俄国及东欧一带，不能传布于英、法，顽固党又将延长其寿命也。

这话我想一点也不错。过激主义的是非，和过激的人行为的对不对，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过激主义种子，实在是因为社会上不满意的事太多，才生产的。既有这个种子，那社会上的一切不平、不安稳、不公道的事体，就是他的肥料。既加了肥料，又要他不生长，那可有点办不到。所以世界政府中的顽固党，都怕过激主义，但是都在那里培植过激主义。

还有一层，就是怕过激主义过甚的，动辄拿来安在不相干的人身上，这也是有一种最有力的引线。前几天听见几个与政府有关系的人，看了几篇思想新一点、议论希奇一点的文字，他们就动色相戒的说道：“你们不看见过激主义已经到我们国来了吗？”实在讲起来，现在我们国内最新的议论，不晓得跟过激主



义，还差几千里呢？再进一步说，他们这些怕过激主义的人，何尝知道过激主义是甚么一回事呢？不晓得过激主义是甚么一回事体，偏要拿来说人，岂不是“疑心生暗鬼”吗？

这种“疑心生暗鬼”的惧怕心，何以能为过激主义作引线呢？我晓得有位朋友，平常是不信过激主义的。所以对于过激主义的行动，他总不大看得起。后来听了这几位先生的议论，他说为开通他们这一班人起见，倒不可不译几本过激派的著作出来，给他们看。这种书果然译出，看得见的，可就不止那几位怕过激主义的人。

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号

## 阶级竞争与互助

Ruskin〔路斯金〕<sup>①</sup>说过：“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William Morris〔威廉·莫里斯〕<sup>②</sup>也说：“有友谊是天堂，没有友谊是地狱。”这都是互助的理想。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

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见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他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随着他的智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我们试一翻Kropotkin〔克鲁泡特金〕<sup>③</sup>的《互助论》(Mutual Aid)，必可晓得“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我们在生物学上寻出来许多证据。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

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

---

① 路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美术批评家、思想家，苏格兰人。

②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社会主义者。

③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我信这是必然的事实。

与这“互助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sup>①</sup>说”。

这个阶级竞争说，是 Karl Marx〔卡尔·马克思〕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他在《共产宣言》里说过：“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从来社会的历史都在阶级对立中进行。”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太古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凡过去的历史，社会的经济构造，都建设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很发达，一个人的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

---

<sup>①</sup> 阶级竞争，今译“阶级斗争”。

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手段。

有许多人听见这阶级竞争说，很觉可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常此争夺强掠残杀，必没有光明的希望。拿着阶级竞争作改造社会的手段，结果怕造不出光明社会来。所以对于此说，很抱疑虑。

但是 Marx 明明的说：“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采敌对形态者的最后。”又说：“人类历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会组织终。”可见他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是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他是确信继人类历史的前史，应该辟一个真历史的新纪元。

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

在那人类历史的前史时代，互助的精神并未灭绝，但因有与互助相反的社会组织，他在世间，遂不断的被毁。人类的真历史开始以后，那自私自利的恶萌，也不敢说就全然灭尽。但是互助的社会组织既然实现，那互助精神的火光，可以烧他，使他不能发生。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

致的改造。

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

1919年 7 月 6 日《每周评论》第 29 号

##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以力统属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

例如政治，从前是以君纲臣，以官治民，以中央统驭地方，是纵的组织。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各地方联合起来，抗制中央集权。

次如经济，从前是以富佣贫，以资主掠夺劳工，以地主奴役佃户，是纵的组织。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

次如社会，从前是贵劳心者，贱劳力者；贵君子，贱野人；贵阀阅，贱平民；贵男性，贱女性；是纵的组织。现在劳力者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劳心者阶级，野人阶级反抗君子阶级，女性阶级反抗男性阶级。

次如家族，从前是以家长统治家属，以父兄统治子弟，以夫纲妻，是纵的组织。现在子弟要脱离家长的势力，妻要脱离夫的势力，离开家庭，加入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就变为横的组织了。

---

\* 这篇文章，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时，杂志的总编辑因为怕招祸，不敢把它放在论说栏内，而作为“附录”发表。

这个变动的主因，就在经济上有了变动。从前的经济组织是纵的组织，所以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也都随着他是纵的组织。现在的经济组织，正在向变为横的组织方向进行，所以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也都随着他向横的组织方面进行。

看现今世界的趋势，纵的组织日见崩坏，横的组织日见增多扩大，就是中土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也从此发轫了。将来学生有学生的联合，教职员有教职员的联合，商界有商界的联合，工人有工人的联合，农民有农民的联合，妇女有妇女的联合，乃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在纵的组织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以后，下级的个性才得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由此看来，我们的解放运动就是打破纵的组织的运动，我们的改造运动就是建立横的组织的运动。

纵的组织的基础在力，横的组织的基础在爱。我们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纯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

1920年1月15日《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号

## 再论问题与主义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 31 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它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



Owen〔欧文〕<sup>①</sup>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 Fourier〔傅立叶〕<sup>②</sup>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欧文〕派与 Fourier〔傅立叶〕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 Noyes〔诺伊斯〕<sup>③</sup>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欧文〕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傅立叶〕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 Owen〔欧文〕主义者，又不是 Fourier〔傅立叶〕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

---

① 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②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68—1830):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③ 诺伊斯(1811—1886): 美国著作家，欧奈达村社的创立者，曾主张试图回到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

验，不把它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 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

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当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牌号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鸚鵡、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

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杀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新共和杂志》〕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词，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

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鸚鵡、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 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

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 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7月。

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

## 什么是新文学？

现在大家都讲新文学，都作新文学了。我要问大家：“什么是新文学？”

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

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

现在的新文学作品，合于我们这种要求的，固然也有，但是终占少数。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来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充塞满幅。长此相嘘以气，必致中干，种种运动，终于一空，适以为挑起反动的引子。此是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吾辈应速为一大反省。

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它们。

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在没有深厚美腴的土壤的地方培植的花木，偶然一现，虽是一阵热闹，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萎！

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



## 史 观

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

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即偶有重视王者、圣人、英雄、豪杰而崇之以为

具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神德者，亦皆认他们为聪睿天宣，崧生岳降，仰托神灵的庇佑以临治斯民。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康德之流，已既想望凯蒲拉儿(Kepler)、奈端(Newton)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而期其发见一种历史的法则，如引力法则者然。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厥后德国“西南学派”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

自康德以还，名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见者，既已实繁有徒，于是历史观亦衍类多端：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将此种依四种的分类法括而纳之：曰，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曰，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曰，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曰，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者，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昌盛而日趋衰落；或曰，社会的演展，乃如循于一环，周而复始；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野僇而日跻开明。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者，则曰，史之进展，必有动因。至于动因何在？则又言人人殊：或曰，在个人，如英雄、王者是；或曰，在社会，如知识、经济是；或

曰，在精神，如圣神、德化、理念是；或曰，在物质，如地理、人种、经济是；或曰，在神权，如天命、神意是；或曰，在人生，如社会的生产方法，或社会的知识程度是。

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例如火的发明，衣裳的发明，农业及农器的发明，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代，经社会上的几多人，于有意无意中发见、应用的结果积累而成者。旧史观则归功于半神人的燧人氏、神农氏等。若由新史观以为解释，则必搜其迹寻其因于社会全体的进化，而断定此半神人为荒诞的虚构。又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

思想的社会背景。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滴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而与史观以俱代。依据人生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社会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精神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进步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退落的或循环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楼，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譬如奈端，据以发明引力法则的苹果落地的事实，奈端之前，奈端之后，目睹苹果落地者，何止千百万人？而皆莫喻引力之理，今从史实，亦何足异？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

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

摘自 1920 年著《史学思想史讲义》

##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 Karl Marx 和 Friedrich Engels 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及(4)“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在(1)(2)两辞，泛称物质，殊与此说的真相不甚相符，因为此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例如历史上生物的考察，乃至因风土、气候、一时一地的动植物的影响所生的社会变动，均应论及了。第(4)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Seligman〔塞力格曼〕<sup>①</sup>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且仍之不易。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

---

<sup>①</sup> 塞力格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 1861—1939)，美国经济学家，著名的财政专家，《历史的经济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书的作者。

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按着思想界的新倾向去观察，人类的历史，乃是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含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于此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此种学说，发源于德，次及于意、俄、英、法等国。

唯物史观的名称意义，已如上述，现在要论他在史学上的价值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好，全靠所论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原因的问题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

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时代天才说解释这些史实的，还算是深一层的研究。Lessing〔莱辛〕<sup>①</sup>在他的《人类教育论》与 Herder〔海尔德〕<sup>②</sup>在他的《历史哲学概论》里所论述的，都过受神学观念的支配，很与思想界的新运动以阻力。象Herder这样的人，他在德国与Ferguson〔费尔古桑〕<sup>③</sup>在苏格兰一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的思想，犹且如此，其他更可知了。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 Huxley〔赫胥黎〕<sup>④</sup>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 Hegel〔黑格尔〕<sup>⑤</sup>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Hegel〔黑格尔〕限于“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

有些主张宗教是进化的关键的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固然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解释，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他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他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速的变动相适

---

①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文艺批评家、诗人。

② 海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德国作家、哲学家，著有《人类历史哲学》。

③ 费尔古桑(Adam Ferguson, 1723—1816): 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

④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英国生物学家，著有《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⑤ 黑格尔(1770—1831):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辩证论者。



合的道理。这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就是 Benjamin Kidd〔基德〕<sup>①</sup>的修正学说,亦只有很少的信徒。

此外还有历史的政治的解释。其说可以溯源于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sup>②</sup>,有些公法学者右之。此派主张通全历史可以看出由君主制到贵族制、由贵族制到民主制的一定的运动,在理想上,在制度上,都有个由专制到自由之不断的进步。但是有许多哲学家,并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亦包在内,指出民主制有时亦弄到专制的地步;而且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

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综观以上所举历史的解释方法,新旧之间截然不同。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好一点的,亦只在夸耀自国的尊荣。凡他所纪的事实,都是适合此等目的的,否则屏而不载;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此辈史家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

① 基德(1858—1916):英国社会学家,著有《社会进化》。

②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著有《诗学》。

慰藉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

这种历史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既已认定自己境遇的苦难，都是天命所确定的，都是超越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出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这个样子，那些永据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掠夺。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斯时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象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

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的生活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铜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为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

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序的变动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愉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

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人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旧历史的纂著和他的教训的虚伪既是那样荒陋，并且那样明显，而于文化上又那样无力，除了少数在神学校的，几乎没有几多教授再作这种陈腐而且陋劣的事业了。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只有公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这样程度的变动；因为在那里的教训，全为成见与习惯所拘束，那些教员又没有那样卓越的天才，足以激励他们文化进步上的自高心；而现今的公立学校又过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

##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

近几年来常常听关心世道人心的人，谈到道德问题。有的人说现在旧道德已经破灭，新道德尚未建设，这个青黄不接人心荒乱的时候真正可忧。有的人说，别的东西或者有新旧，道德万没有新旧。又有人说，大战以后欧洲之所应为一面开新，一面必当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这些话都很可以启发我的研究兴味，我于是想用一番严密的思索，去研究这道德问题。

我当研究道德问题的时候，发了几个疑问：第一问道德是甚么东西？第二问道德的内容是永久不变的，还是常常变化的？第三问道德有没有新旧？第四问道德与物质是怎样的关系？

以上诸问，都是从希腊哲学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道德心的存在却是极明了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我们遇见种种事体在我们心中自然发出一种有权威的声音，说这是善或是恶。我们只有从着这种声音的命令往善这一方面走，往光明一方面走，自然作出“爱他”、“牺牲”等等的行为。在这有权威的声音指挥之下，“忠信”、“正直”、“公平”诸种德性都能表现于我们身上。我们若是不听从他，我们受自己良心的责斥，我们自己若作了恶事，就是他人

不知，我们也自觉悔悟，自感羞耻，全因为我们心中有道德心的要求，义务的要求。这自然发现、自有权威的点就是道德的特质。自然科学哪、法律哪、政治哪、宗教哪、哲学哪，都是学而后能知的东西，决不是自然有权威的东西。惟有道德，才是这样自然有权威的东西。

但是这道德心究竟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呢？有人归之于个人的经验；有人归之于教育；有人归之于习惯礼俗；有人归之于求快乐、求幸福的念望；又有人归之于精练的利己心，或对于他人的同情心。这些都不能说明人心中的声音——牺牲自己爱他人的行为。

道德这个东西，既是无论如何由人间现实的生活都不能说明，于是就有些人抛了地上的生活，人间的生活，逃入宗教的灵界，因为宗教是一个无知的隐遁地方。在超自然的地方，在人间现实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源，就是说，善心是神特地给人间的；恶心是由人间的肉欲生的，是由物质界生的，是由罪孽生的。本来善恶根源的不可解，就是宗教发生的一个原因。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道德心、善恶心的不可思议，也苦过很多的哲人。这些哲人也都觉得解释说明这不可思议的现象，非借重神灵不可，所以柏拉图、康德之流，都努力建设超自然的灵界。直到十九世纪后半，这最高道德的要求之本质，才有了正确的说明。为此说明的两位学者，就是达尔文与马克思。达尔文研究道德之动物的起原；马克思研究道德之历史的变迁。道德的种种问题，至此遂得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 二

我们先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答道德是什么的问题。

人类的道德心不是超自然的，也不是神赐的，乃是社会的本能。这社会的本能，也不是人类特有的，乃是动物界所同有的。有些人类以外的动物，虽依动物的种类，依其生活状态的差异，社会的本能也有种种的差异。但是他们因为生存竞争，与其环周的自然抗战，也都有他们社会的本能。占生物界一大群合的动物生存竞争、天然淘汰的结果，使他们诸种本能——若自发运动，若认识能力，若自己保存，若种族蕃殖，若母爱本能等等——日渐发达。社会的本能也和这些本能有同一的渊源，为同一的发展。而在有社会的共同生活的动物，象那一种的肉食兽、很多的草食兽、反嚼兽、猿猴等类，社会的本能尤其发达。人类也和上举诸兽相同，非为社会的共同生活，则不能立足于自然界。故人类之社会的本能也很发达。

社会的本能也有多种。有几种社会的本能确是社会生活存续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本能，社会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存续。这种本能，在不与人类一样为社会的结合便不能生活的动物种属间，也颇发达。这种本能果为何物呢？第一就是为社会全体，舍弃自己的牺牲心。若是群居的动物没有这种本能，各自顾各自的生活，不肯把社会全体放在自己以上，他的社会必受环周的自然力与外敌的压迫而归于灭亡。譬如一群水牛为虎所袭的时候，其中各个分子如没有为一群全体死战的决心，各自惜命纷纷逃散，那水牛的群合必归灭亡。故自己牺牲，在这种动物的群合，是第一不可缺的社会的本能。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此外

还有拥护共同利益的勇气，对于社会的忠诚，对于全体意志的服从，顾恤毁誉褒贬的名誉心，都是社会的本能；都曾发见于动物社会极高度的发达的也很多。这些社会的本能，和那被称为至高无上灵妙不可思议的人类道德，全是一个东西。但是“公平”这一样道德，在动物界恐怕没有。因为在动物的社会里，虽有天然生理上的不平等，却没有由社会的关系生出的不平等，从而没有要求社会的平等之必要，也没有“公平”这一样道德存在的理由。所以“公平”只是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

这样看来，道德原来是动物界的产物。人类的道德，从人类还不过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时代，就是还没有进化到现今的人类时代，既已存在。人类为抵抗他的环境，适应他的周围，维持他的生存，不能不靠着多数的协力，群合的互助，去征服自然。这协力互助的精神，这道德心，这社会的本能，是能够使人类进步的；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他的内容也益为发达。

因为人类的道德心，从最古的人类生活时代，既是一种强烈之社会的本能，在人人心中发一种有权威的声音，到了如今我们的心中仍然有此声响，带着一种神秘的性质，不因外界何等的刺激，不因何等的利害关系，他能自然挟着权威发动出来。他那神秘的性质和性欲的神秘、母爱的神秘、牺牲心的神秘、乃至其他生物界一般的神秘是一样的东西，绝不是超自然的力，绝不是神的力。

正惟道德心是动物的本能，和自己保存种族蕃殖等本能有同一的根源，所以才有使我们毫不踌躇，立即听从的力量；所以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才能即时判断他的善恶邪正；所以我们才于我们的道德判断有强大的确信力；所以探求他的活动的理法，分解他，说明他，愈觉困难。



明白了这个道德，“义务”是什么，“良心”是什么，也都可以明白了。所谓义务，所谓良心，毕竟是社会的本能的呼声。然“自己保存”的本能，“种族蕃殖”的本能也有与此呼声同时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二种本能常常反抗社会的本能，结果这二种本能或得相当的满足；可是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不久归于镇静，社会的本能发出更强的声音，就是愧悔的一念。有人以良心为对于共同生活伴侣间的恐怖——就是对于同类所与的排斥或刑罚的恐怖——之声音。但是大错了。良心之起，对于他人全不知觉的事也起，对于四围的人都夸奖赞叹的事也起，甚至对于因为对于同类及同类间的舆论的恐怖而作的行为也起。可见良心的威力，全系自发的，非因被动的。至于舆论的褒贬固然也是确与人的行为以很大影响的要素，然舆论所以能有影响的原故，全因为豫先有一种名誉心的社会的本能存在。舆论怎样督责，假使没有注意褒贬的名誉心的社会的本能，当不能有什么影响。舆论作出社会的本能的事，是作不到的。

依了这样说明，我们可以晓得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

### 三

达尔文的理论可以把道德的本质阐发明白了。可是道德何以因时因地而生种种变动？以何缘故，社会的本能之活动发生

种种差别？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了。

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

我们先说宗教与哲学。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没有不随着他变迁的。上古时代，人类的生产技术还未能征服自然力，自然几乎完全支配人类；人类劳作的器具，只是取存于自然界的物质原形而利用之，还没有自制器具的知识和能力。那时的人类只是崇拜自然力，太阳、天、电光、火、山川、草木、动物等，人类都看作最重要的物件，故崇拜之为神灵。拜火拜物诸教均发生于此时。直到现在，蛮人社会还是如此。纽基尼亚人奉一种长食的椰子为神，认自己的种族是从椰子生下来的，就是一个显例。

后来生产技术稍稍进步，农业渐起，军人宗祝这一类的人渐握权力，从前受制于自然，现在受制于地位较高的人类了。因为这时的社会已经分出治者与被治者阶级，这时的宗教又生一大变化。从前是崇拜自然物的原形，现在是把自然物当作一个有力的人去崇拜他了。在希腊何美尔(Homer)的诗中所表现的神，都是男女有力的君长，都是智勇美爱的化身。因为生产技术与人以权力的结果，自然神就化为伟大的人了。后来希腊人的生产技术益有进步，商工勃兴，智勇美爱肉体的属性又失了重大的位置，有神变不可思议的万能力的乃在精神。因为在商业竞争

的社会里，人类的精神是最重大的要素，计算数量的也是他，创作新发明的也是他，营谋利益的也是他，精神实是那时商业社会人类生活的中心。故当时哲家若梭格拉的，若柏拉图都说自然界久已不足引我们的注意了。引我们注意的只是思想上及精神上的现象。这种变迁明明白白是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人类精神里有很多奇妙不可思议的现象，就象道德心是什么东西，善恶的观念是从何发生，柏拉图诸哲家也不能解释。由自然界的知识与经验不能说明，结局仍是归之于神，归之于天界。故当时多数人仍把道德的精神认作神，认他有超自然的渊源。

各国分立，经济上政治上全不统一的时代——就是各国还未组成一个大商业社会的时代，——尚有多神及自然神存在的余地。自希腊之世界的商业发达以来，罗马竟在地中海沿岸的全部建一商业的世界帝国。这种经济上的变动反映到当时思想上，遂以唯一精神的神说明当时的全世界及存于其中的疑问，使所有的自然神全归于消灭。驱逐这些自然神的固然是柏拉图及士多亚派哲学上的一神论，而一神论的背景，毕竟是当时罗马的具有绝大威力的生产技术，罗马的商业交通，罗马的商业大社会。

到了罗马帝政时代，大经济组织、大商业社会，正要崩坏的时候，恰有一种适合当时社会关系的一神教进来，就是耶稣教了。耶稣教把希腊原来的一神论吸收进去，把所有的势力归于一个精神，归于一个神。

罗马商业的大社会崩坏之后，从前各个分立的自然经济又复出现。中世纪的经济组织次第发展，耶稣教也不能保持他的本来面目，他的内容自然发生了变动。中世纪的社会是分有土地的封建制度、领主制度的社会，社会的阶级象梯子段一样，一

层一层的互相隶属，最高的是皇帝，皇帝之下有王公，王公之下有诸侯，诸侯之下有小领主，百姓农奴被践踏在地底。教会本来是共产的组合，到了此时这种阶级的经济组织又反映到教会的组织，渐次发达，也成了个掠夺组织、阶级组织。最高的是教皇，教皇之下有大僧正、僧正等，僧正之下有高僧，由高僧至普通僧民的中间还有种种僧官的阶级。百姓农奴伏在地底，又多受一层践踏。这种阶级的经济组织又反映到耶教的实质，天上也不是一个神住着。最高的是神，神之下有神子，有精灵，其下更有种种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又有恶魔。神的一族，恰和皇帝教皇及其隶属相照应；人在诸神之下，恰和百姓居社会之最下层相照应。人类的精神把地上的实物写映于天上，没有比这个例子再明白的了。

后来都市渐渐发达，宗教上又生一变化。意大利、南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荷兰诸国都市上的居民，因其工商业的关系，渐立于有权力的地位，对于贵族、僧侣有了自由独立的位置。随着他们对于社会的观念的变动，对于宇宙的观念也变了。于是要求一种新宗教。他们既在经济上不认自己以上的势力，又在政治上作了独立的市民、独立的资本家、独立的商人，立于自由的地位，他们觉着自己与宇宙的中间，自己与神的中间，也不须有中间人介绍人存在了。所以他们蔑视教皇，蔑视僧官，自己作自己的牧师，直接与神相见，这就是路德及加尔文所倡的新教。这样看来，宗教革新的运动全是近世资本家阶级自觉其经济的实力的结果。资本家是个人反映出来的，所以新宗教也是个人的。

美洲及印度发见以后，资本主义的制度愈益强大，工商贸易愈益发达，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没有了，几乎全是物品与物品的关

系了。一切物品于其各个实质的使用价值以外，又有一般共通抽象的交换价值。所以这时的人也互认为抽象的东西。因而所信的神也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又因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在这种惨烈的竞争场里，社会现象迷乱复杂的程度有加无已，人若想求慰安与幸福，除了内观、冥想、灵化而外，殆不可能。而资本家的个人的表象照映于精神界就成了一个绝大的孤立的神。十七世纪的哲学家，若笛卡儿、斯宾挪撒等都认神是有绝大精神的绝大体，能自动自考，就是这个原故。又因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达对于自然界的知识骤见增大，十七世纪间自然现象的不可解大概已渐消灭，但于精神科学尚未能加以解释。这时的宗教渐渐离开自然界和物质，神遂全为离于现实界的不可思议的灵体。基督教贱肉的思想，与夫精神劳动与手足劳动分业的结果，也加了许多许多的势子。这时的哲学家，若康德，则说时间的空间的事物是单纯的现象，没有真实的存在；若费西的，则只认精神的主观就是我的。实在都是受了当时物质界经济界的影响，才有这种学说。就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使每个人都成孤立，都成灵化，反映到宗教哲学上去，也就成一种孤立的抽象的精神。

蒸汽机发明以后，生产力益加增大，交通机关及生产技术益加发达，对于自然的研究益有进步。自然现象的法则渐为人智所获得，超自然的存在一类神秘的事遂消灭于自然界。同时人类社会的实质也因交通机关生产技术发达的结果，乃有有史以前、有史以后的种种研究。或深入地底，研究地层地质；或远探蛮荒，研究原始社会的状况。又得了种种搜集历史统计材料的方法，而由挟着暴力的生产过程而生的社会问题，更促人竭力研究人类社会的实质。以是原因，自然现象、人类社会都脱去神秘

的暗云，赤裸裸的立在科学智识之上，见了光明。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他就发生于现代了。

资本阶级固然脱出神秘宗教的范围了，就是劳工阶级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天天在工厂作工，天天役使自然，利用自然，所以他们也了解自然了。自然现象于他们也没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权威了。至于人类社会的实质，他们也都了解，他们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他们贫困的唯一原因，知道现在的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他们对于社会实质的了解，恐怕比绅士阀的学者还要彻底，还要明白。太阳出来了，没有打着灯笼走路的人了。

以上所论，可以证明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

#### 四

再看风俗与习惯。社会上风俗习惯的演成，也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物质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老人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在狩猎时代，食物常告缺乏，当时的人总是由此处到彼处的迁徙流转，老人在这社会里很是一种社会的累赘，所以常常被弃被杀被食。如今的蛮人社会也常常见此风俗。日本古代有老舍山的话，相传是当时舍弃老人的地方。中央亚非利加的土人将与他部落开战的时候，必先食其亲；因为怕战事一经开始，老人很容易为敌人所捕获，或遭虐待，或被虐杀；所以老人反以为自己的儿子所食为福，儿子亦以食其亲为孝。马来群岛的布尔聂伊附近，某岛中人遇着达于一定年龄的老人必穷追他，使他爬上大木，部落的青

年群集木下摇之使他落下，活活跌死。耶士魁牟的女子亦以把他比邻罹病垂危的老太婆带到投弃老人的地方，由岸上把他推下，为爱他比邻、怜他比邻的行为。到了畜牧时代、农业时代，衣食的资料渐渐富裕，敬老的事渐视为重要。而以种种经验与知识渐为社会所需要，当时还没有文字的发明，老人就是知识经验的宝库，遂为社会所宝重。近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一切事象日新月异，古代传说反足以阻碍进步，社会之尊重老人遂又与前大不相同。不专因为他的衰老就尊重他，乃因为他能终其生涯和少年一样奋斗，为社会作出了许多生产的事业、创造的功绩。因为他不但不拿他的旧知识妨害进步，并且能够吸入新思潮，才尊重他。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也和老人一样。在游猎时代，狩猎与战争是男子的专门事业，当时的妇女虽未必不及男子骁勇，而因负怀孕哺乳育儿的重大责任，此类事体终非妇女所宜，遂渐渐止于一定的处所，在附近居处的田地里作些耕作，在家内作些烧煮的事情。因为狩猎的效果不能一定，而农作比较着有一定效果，且甚安全，所以当时妇女的地位比男子高，势力比男子大。后来牧畜与农业渐渐专归男子去作，妇女只作烧煮裁缝的事情，妇女的地位就渐渐低下。到了现代的工业时代，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家内手工渐渐不能支持，大规模的制成许多无产阶级，男子没有力量养恤妇女，只得从家庭里把他们解放出来，听他们自由活动，自己谋生。一方因为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为妇女添出了许多与他们相宜的职业，妇女的地位又渐渐的提高了。这回欧洲大战（一九一四年的大战），许多的壮丁都跑到战场打仗，所有从前男子独占的职业，一时不得不让给女子，不得不仰赖女子，他们于是从家庭里跳出来，或入工厂工作，或当警察，或作电车司机人，或在军队里作后

方勤动，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这回大战停了，战场上的兵士归来，产业雕敝没有工作，从前的职业又多为女子所占领，男工女工的中间现在已起了争议。不过以我的窥测，这个争议第一步可以促女工自己团结；第二步可以促男女两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为阶级战争加一层势力；结果是女子在社会上必占与男子平等的地位。颇闻从法国回来的人说，战后的法国社会道德日趋堕落；男子游惰而好小利，女子好奢侈而多卖淫。忧时之士至为深抱杞忧，说欧洲有道德复旧的必要。但我以为此不必忧，这种现象全是因战争而起的物质变动的结果。欧洲这回大战，男子战死于战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社会上骤呈女子过庶的现象，女子过庶的结果，结婚难，离婚及私生子增多，卖淫及花柳病流行。物质上有人口的变动，而精神上还没认作道德的要求（如法国女子与华工结婚还为法政府及社会所不喜，就是一例），社会上才有这种悲惨的现象。在这个时期必要发生一种新道德，适应社会的要求，使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道德的要求。至于男子的游惰好小利，女子的奢侈，也是物质变动的结果。男子在战争时期中，精神上物质上都经了很多的困乏，加以生活难、工作难的影响，精神上自然要发生变动。游惰哪，好小利哪，都是因为这个原故。将来物质若是丰裕，经济组织若有相当的改造，精神上不会发现这种卑苦的现象。女子骤然得到工作的，自然要比从前奢侈些，也是当然的现象。固然战后的人口增加，或者加猛加速，女子过庶的不平均，或者可以调剂许多，而经济的组织生产的方法则已大有改动。故就物质论，只有开新，断无复旧；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



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耶士魁牟的女子本性上不能多产多生，所以他们的风俗就不以未婚的妇人产生及怀孕的处女为耻辱，所以在他们的社会多生多产的德比贞操的德重。女子贞操问题也是随着物质变动而为变动。在男子狩猎女子耕作的时期，女子的地位高于男子，女子生理上性欲的要求强于男子，所以贞操问题绝不发生，而且有一妻多夫的风俗。到了牧畜、农业为男子独占职业的时期，女子的地位低落下去，女子靠着男子生活，男子就由弱者地位转到强者地位，女子的贞操问题从而发生，且是绝对的、强制的、片面的。又因农业经济需要人口，一夫多妻之风盛行。到了工业时期，人口愈增，人类的欲望愈加复杂，虽因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数量增加，而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分配的方法极不平均，造成了很多的无产阶级。贫困迫人日益加甚，女子非出来工作不可。男子若不解放女子，使他们出来在社会上和男子一样工作，就不能养赡他们。女子的贞操，就由绝对的变为相对的；由片面的变为双方的；由强制的变为自由的。从前重“从一而终”，现在可以离婚了；从前重守节殉死，现在夫死可以再嫁了。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崩坏之后，经济上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贞操的内容也必大有变动了。家族制度的变动也是如此。狩猎时代及劣等农作时代，因土地共有共同耕作的关系，氏族制度才能成立。后来人口渐增，氏族中的个人自进而开辟山林，垦治荒芜的人所在多有，因而对于个人辛苦经营的地而，不能不承认个人的私有；既经承认了个人的私有，那些勤勉有为的人大都努力去开辟地面；私有的地而逐日增大，从前氏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就从

而动摇。到了高等农作时代，因为私有制度的发达，农业经济的勃兴，父权家长制的大家族制度遂继氏族制度而兴起。后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由农业时代入了工商时代，分业及交通机关日见发达，经济上有了新变动，大家族制度逐渐就崩坏。这个时期就发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小家族制度，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状态。可是到了现代，机械工业、工厂工业又复压倒了手工业、徒弟工业，大产业组织的下边造成多数的无产阶级，生活日趋贫困，妇女亦不得不出来工作，加以义务教育、儿童公育等制度推行日广，亲子关系日趋薄弱，这种小家庭制度，也离崩坏的命运不远了。

由此类推，可见风俗习惯的变动，也是随着经济情形的变动为转移的。

## 五

再看政策与主义。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Louis Boudin〔路易士·布丹〕氏在他的《社会主义与战争》里说了许多很精透的道理，我们可以借来说明一种政策或主义与物质经济的关系。他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历史，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少年时期，是奋进的时代，富有好战的气质。第二时期是成年时期，是全盛的时代，专务为内部的整顿，气质渐化为平和。第三是衰老时期，是崩颓的时代，急转直下，如丸滚坡，气质又变为性急好战的状态。这种变动，在英国历史上最易看出。由耶利撒别士即位到七年战争，二百年间，英国确是一个好战的国，东冲西突，转战不休。因为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方在少年时期，经了二百年间的苦战，才立下了世界第一商工业

国的基础。七年战争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确立,遂顿归平和。拿破仑战争全是别的原因,不是英国的资本主义惹起来的。直到这次大战以前,英国的资本阶级总是爱重平和,世界上帝国主义的魁雄不在英而转在德。美国独立所以成功,不全是因为美洲独立军的勇武,华盛顿的天才,英国不愿出很大的牺牲争此殖民地,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固然英国也未尝不欲得此土地,但因此起大战争,他们以为很不值得。当时英国政治家巴客大声疾呼,主张美国国民有独立的权利。表面的言辞说来很是好听,骨子里面也不过是亚丹斯密氏殖民政策的应用罢了。亚丹斯密氏主张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若行排他的贸易,不但于殖民地及世界一般有害,即于母国亦大不利。故母国应使其殖民地自由平等,与世界通商。美国所以能够独立的原故,毕竟是因为正值英国持平和政策的时期。以后英国在南非又承认波亚人组织的二共和国,也是这个原故。过了十五年,波亚人又与英国开战,二共和国就全为英国所压服了。那时英国的态度全然一变。最初波亚人与英国开战时候,英国正是正统经济学的国,自由贸易的国,满切士特(Manchester)学派的国,亚丹斯密氏殖民政策的国,新帝国主义的波浪还未打将进来。到了第二战争,英国已经不是从前的英国了,是新帝国主义的英国,是张伯伦氏新殖民政策的英国了。使英国的主义、政策起这样变化的经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从前的时代是织物时代,现在的时代是钢铁时代了。英国的工业当初最盛者首推织物,织物实占近世产业的主要部分。英国织物产业的中心,却在满切士特,满切士特的织物产业为世界产业的焦点,亚丹斯密氏的自由贸易主义,就以满切士特为根据,成了满切士特学派。郭伯敦之蹶起反对谷物条例,反对保护税,在自由平和一些美名之下,为新兴的商工

阶级奋斗，也是因为这个原故。

当时的英国既以织物类的生产为主要的产业，其销路殆遍于全世界，以握海上霸权、工业设备极其完密的英国，自无用兵力扩张的必要。且以低廉的价格出卖精良的货物，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自由贸易主义、平和主义、殖民地无用论，都发生在这个时代。以后各半开化国及各殖民地工业渐能独立，象织物类的单纯工业不须仰给于英国，英国要想供给他们，必须另行创制益加精巧的工业。恰好各后进国工业新兴，很需要机械一类的东西，于是英国的产业就由纺纱时代，入了钢铁时代了。英国销行世界的产物，就由织物类变为机械类了。英国的产业中心，就由满切士特移到泊明港了。泊明港是钢铁的产地，张伯伦是生于泊明港的人，所以张伯伦代表泊明港的钢铁，代表英国钢铁产业时代物质上的要求、经济上的要求，主张一种的新殖民政策、新帝国主义。张伯伦初次入阁的时候，自己要作殖民总长，大家都很以为奇怪；因为从前的殖民部是一个闲部，张伯伦是一代政雄，何以选这闲部？那里知道当时的殖民部已经应经济的变化，发生重大意义了。但是机械的贩卖，与织物类的贩卖不同；贩卖织物类只须借传教士的力量，使那半开化国和殖民地的人民接洽文明生活的趣味，就能奏功；而贩卖机械，则非和他的政府官厅与资产阶级交涉不可。那么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策略，就很要紧了。以是因缘，自由贸易的祖国，也变为保护政策的主张；平和主义的国家，也着了帝国主义的彩色。

德国的产业进步，比英国稍晚。英国正当成年时期，德国方在少年时期，好战的气质极盛，还没有到平和时期，又正逢着第二次的好战时期。最近十年内英德两国的产铁额大有变动。当初德国的产业仅当英国的什一；到大战以前，德国的产额已经超

过英国了。观此可以知道德国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魁雄的原因，也就可以知道这回大战的原因了。

综观以上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使当时新兴商工阶级打破封建制度束缚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国民文化主义；第二时期是使当时织物贩卖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自由主义、世界的人道主义；第三时期是使机械贩卖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帝国主义。有了那种物质的要求，才有那种精神的道德的要求。

## 六

总结本篇的论旨，我们得了几个纲领，写在下面：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本能是随着那种动物的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要求有所差异，断断不是什么神明的赏赐物。人类正不必以万物之灵自高，亦不必以有道德心自夸。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运命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四、新道

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从前家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是家族经济、国家经济时代发生的东西，断不能存在于世界经济时代的。今日不但应该废弃，并且必然废弃。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

1919年12月1日《新潮》第2卷第2号

##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 思想变动的原因

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

人类生活的开幕，实以欧罗细亚为演奏的舞台。欧罗细亚就是欧亚两大陆的总称。在欧罗细亚的中央，有一凸地，叫作 Tableland。此地的山脉，不是南北纵延的，乃是东西横亘的。因为有东西横亘的山脉，南北交通，遂以阻隔；人类祖先的分布移动，遂分为南道和北道两条进路；人类的文明，遂分为南道文明——东洋文明——和北道文明——西洋文明——两大系统。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露麻、印度、阿富汗尼士坦、俾而齐士坦、波斯、土耳其、埃及等，是南道文明的要路；蒙古、满洲、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迭拿威亚、英吉利、法兰西、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地利亚、巴尔干半岛等，是北道文明的要路。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迁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前者

因聚族而居，易有妇女过庶的倾向，所以成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的风俗；后者因转徙无定，恒有妇女缺乏的忧虑，所以成尊重妇女一夫一妻的习惯。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

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原来家族团体，一面是血统的结合，一面又是经济的结合。在古代原人社会，经济上男女分业互助的要求，恐怕比性欲要求强些，所以家族团体所含经济的结合之性质，恐怕比血统的结合之性质多些。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



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沈沈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不但中国，就是日本、高丽、越南等国，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组织和中国大体相似，也受了孔门伦理的影响不少。

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因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到了近世，科学日见昌明，机械发明的结果，促起了工业革命。交通机关日益发达，产业规模日益宏大，他们一方不能不扩张市场，一方不能不搜求原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驱着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沈静的大门。一六三五年顷，已竟有荷兰的商人到了日本，以后 Perry〔潘理〕<sup>①</sup>、Harris〔哈里斯〕<sup>②</sup> 与 Lord Elgin〔艾尔金〕<sup>③</sup> 诸人相继东来，以其商业上的使命，开拓东洋的门径，而日本，而中国，东洋农业本位的各国，都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日本国小地薄，人口又多，担不住这种压迫，首先起了变动，促成明治维新，采用了西洋的物

质文明，产业上起了革命——如今还正在革命中——由农业国一变而为工业国，不但可以自保，近来且有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势力了。日本的农业经济组织，既经有了变动，欧洲的文明、思想，又随着他的经济势力以俱来，思想界也就起了绝大的变动。近来 Democracy〔民主〕的声音，震荡全国，日本人夸为“国粹”之万世一系的皇统，也有动摇的势子，从前由中国传入的孔子伦理，现在全失了效力了。

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的基础较深，虽然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经济上的变动，却不能骤然表见出来。但中国人子有意无意间也似乎了解这工商经济的势力加于中国人生活上的压迫实在是厉害，所以极端仇视他们、排斥他们。不但排斥他们的人，并且排斥他们的器物。但看东西交通的初期，中国只是拒绝和他们通商，说他们科学上的发明是“奇技淫巧”，痛恨他们造的铁轨，把他投弃海中。义和团虽发于仇教的心理，而于西洋人的一切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文化上的冲突。

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虽曾用政治上的势力抗拒过几回，结果都是败辱。把全国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给人，

---

① 潘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美国海军准将，一八五三年率兵船四艘到达日本江户，与日本订立神奈川条约。

② 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1804—1878)：美国人，曾到中国任宁波领事。一八五六年任日本下田总领事，一八五八年在江户湾“宝哈丹”号船上与日本签订哈里斯条约。

③ 艾尔金(James Bruce Elgin, 1811—1863)：他在1857年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曾任英国的全权专使，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

割让给人了，关税铁路等等权力，也都归了人家的掌握。这时的日本崛起，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不但西洋的经济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别国。但日本以新兴的工业国，骤起而与西洋各国为敌，终是不可能；中国是他的近邻，产物又极丰富，他的势力，自然也要压到中国上。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经济上发生的现象，就是过庶人口不能自由移动，海外华侨，到处受人排斥虐待，国内居民的生活本据，渐为外人所侵入——台湾、满蒙、山东、福建等尤甚——关税权为条约所束缚，适成一种“反保护制”。外来的货物，和出口的原料，课税极轻，而内地的货物，反不能自由移转，这里一厘，那里一卡，几乎步步都是关税。于是国内产出的原料品，以极低的税输出国外，而在国外造成的精制品，以极低的税输入国内。国内的工业，都是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那能和国外的机械工业、工厂工业竞争呢？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在一国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社会的无产阶级，还有机会用资本家的生产机关；在世界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机会用资本国的生产机关。在国内的就为兵为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展转迁徙，贱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阶级的疾视。欧战期内，一时赴法赴俄的华工人数甚众，战后又用不着他们了，他们只得转回故土。这就是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现象，这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寻不着工作的现象。欧美各国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

果，所以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

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

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那一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那一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

第一、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联治主义和自治主义，也都是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打破随着君主专制发生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动，一方因为经济上受了外来的压迫，国民的生活，极感不安，因而归咎于政治的不良、政治当局的无能，而力谋改造。一方因为欧美各国 Democracy 的思潮随着经济的势力传入东方，政治思想上也起了一种响应。

第二、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如家庭问题中的亲子关系问题、短丧问题，社会问题中的私生子问题、儿童公育问题，妇女问题中的贞操问题、节烈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如承继遗产权利问题等)、婚姻问题——自由结婚、离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恋爱、婚姻废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都是从前大家族制下断断不许发生、现在断断不能不发生的问题。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

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从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现在因为经济上的压迫，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竟不能维持。而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他的崩颓破灭，也是不可逃避的运数。不但子弟向亲长要求解放，便是亲长也渐要解放子弟了；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负担，听他们去自由活动，自立生活了。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他们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抑且视为重累了。至于妇女，因为近代工业进步的结果，添出了很多宜于妇女的工作，也是助他们解放运动的一个原因。

欧洲中世，也曾经过大家族制度的阶级，后来因为国家主义和基督教的势力勃兴，受了痛切的打击；又加上经济情形发生变动，工商勃兴，分业及交通机关发达的结果，大家族制度，遂立就瓦解。新起的小家族制度，其中只包含一夫一妻及未成年的子女，如今因为产业进步、妇女劳动、儿童公育种种关系，崩解的气运，将来也必然不远了。

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

总结以上的论点：第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

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象征。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

##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 之唯物的反映

原人社会的经济情形，常与原人社会的文字书契以明著的反映。故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会情形，每能从文字的字迹演蜕之迹得着确实的证据。




















人类生存于宇宙之间，每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宇宙自然的法则的支配。原人的“秩序”、“恒久”的观念，大概得自太阳的出没和地球在太阳系中与其余诸星相保持的关系。远海的航舟，靠星位得以平安。至于画疆分野，亦须上考星位。中国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又云：“卿云烂兮，虹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可见云气的变幻，日月的运转，颇能与人以谐和、华丽、秩序、恒久的观念。



古代的刻石的记号，多作圆环形。此种情形，东西相同，几成为各部族的通象。由此可以断定人类实有些共通的观念与思想。但是这个观念何自而来？颇为考古学者所聚讼。有些有价值的考古学者说，这是天文的印象，即是太阳的记号。但这种推想，在纯粹的象征主义（特别是 Scandinavian<sup>①</sup>的例证），如 $\bigcirc$   $\bigcirc$   $\bigcirc$  等讲不通。更有些人说，在英伦三岛和印度寻出的记号，似是普通宗教上的象征主义，是一种神秘的键。由此说来，这种记号可

<sup>①</sup> Scandinavian〔斯堪的纳维亚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即北欧人，包括瑞典、挪威、丹麦、冰岛等国。

认为世界上原始宗教中的一个的表意的表示。此宗教流被甚广，如今在印度还有留存者。

但是这种宗教的解释，还有许多点未能说明。那些圆环每每接触的很巧，似是表明什么意义。将来这种奇特的记录必有愈益明了的一日。

在苏格兰 Ayr〔艾伊儿〕<sup>①</sup> 郡 Coilsford〔卡艾斯福特〕地方发见的石榷镌有记号。这种记号是绘画文字的起原。由绘画文字更进而为象形文字。上古时文字都象形。墨西哥的古文、埃及的古碑、中国古代的文字(如洪崖石刻，在今贵州永宁州)，马画马形，牛画牛形，都是象形。“日”字，篆文作, 外象体圆，内象日中黑影(古人有日中一黑影之说)。“月”字篆文作, 月缺时多盈时少，故象缺形。其中一画，象大地山河的影子(古人谓月中有大地山河的影子)。“气”作, 象云气低重的样子。“雨”作, 象落雨的样子。“山”作, “水”作(古文作三坎卦形)，“田”作, “目”作, 象目匡，儿象眉，象黑睛，象瞳子。“吕”作, 象背骨相连的样子。余如马、鸟、虎、犬、鹿、鼠都是象形。来、禾、米、瓜、韭、竹、草、林、木等亦是象形。心、耳、口、手、爪、户、皿、瓦、弋、弓亦都是象形。象形文字始于方圆，“环”字作, “中”字作, “日”、“月”等字皆形的变体。“國”、“田”等字亦是、的变动增易。因为古人图画始于、, 故文字亦始于、。

史传伏羲画卦，即是记号文字的开始。“天”字草书似三，坤字古文作, 即的倒形(西文谓伏羲画卦出于巴比伦楔形文字)。

Assyria〔亚西利亚〕<sup>②</sup> 人和 Babylonia〔巴比伦亚〕<sup>③</sup> 人的楔

① 艾伊儿(Ayr); 位于苏格兰西部。郡, 今译州。

② 亚西利亚(Assyria); 即亚述, 亚洲西部古国名。

③ 巴比伦亚(Babylonia); 亚洲西部的一古代帝国, 首都为巴比伦。



形文字，多刻在石碑、石柱或铜像上，Rosetta〔罗塞达〕（埃及的港市）的，刻三国语的楔形文字算是与世界终古了。

原人的记号，有结绳为符的，有刻在骨上的，有刻在贝壳上的，有刻在龟版上的，有刻在宝石上的，有刻在金类上的，亦有刻在木竿、木板上的。

古代中国传说，在神农时代结绳为治。在那个时代大概是因为渔猎时代网罟为用，而弋获的物品必须用绳缚之，所以将此观念推演而为结绳的文字。这种结绳的文字，如今虽不可考，然“一”、“二”、“三”等字，古文作“弌”、“弌”、“弌”，足以证明在渔猎时代于其所获物旁结绳以记数。结绳的文字不过是些方圆平直极简单的画数罢了。

古代 Peru〔秘鲁〕<sup>①</sup> 的 Incas（国王的称谓），结有色的绳为记录，各省分都有专官管治此事。每年将此等结果送存首都，以备存考。这种结绳的记录，叫作 Quipu（结）<sup>②</sup>。司此的官名曰 Quipu Camayas。他们所保存的记录，就是那个地方人民的统计。这结绳的文字，如用小绳绕一大纲上，或绕一木棍上，形成一组纓纒的样子。结的位置可以表示数目，由绳上的一小片的颜色表明人身的阶级，结绳文的解释很不容易。有人解释着，说红色意指战争，黄色指金，白色指平和或银，这不过是推测的事。太平洋诸岛的部族，亦有用此为记号的。

人类最初的家庭是森林，后来遇见了一个冰期，变更了气候，人类遂转徙河岸海滨去。

在森林附近生活的人，往往在木棍、木板上刻些记号，以当纪录，或以纪其杀人的数目，或将格言咒语刻于其上。战争用的

① 秘鲁(Peru)；南美国名。

② Quipu：(古代秘鲁人的)结绳文字。

斧枪柄上及马具上，都是刻记号的绝好处所。亦有些人种刻木作历书，Scandinavian〔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是一个显例。

埃及古文，以椰树每年生枝，即以椰树的叶表年数。中国以农立国，而周朝复以农开基（始祖为后稷），故以谷熟为年（《尔雅·释天》云：“周曰年”）。《说文》季字下云：谷熟也，从禾千声，年字从千，取稼穡众多的意义。《诗》：“岁取十千”，“乃求千斯仓”，禾年义相通，古代以有禾为有年。《诗》曰：“自古有年”，《春秋》云：“大有年”。又以禾熟有一定的期间，故借为年龄之年。期字《说文》作稭，释曰：“稭复其时也，从禾其声。”《唐书》曰：“稭三百有六旬”，是期与年同。《论语》宰我曰：“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以旧谷没新谷升为一期，正可以说明期字古文从禾的理由。歷字中有秝，歷与曆通用。歷有推往知来之义，故从二禾，取年岁众多之义，故称多年为歷年。

“燧”是取火的物具，亦称“夫遂”，又称“阳遂”，皆是取火的器具。《周礼》秋官司寇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又《考工记》：“金锡半谓之鉴遂之齐”，郑注：“鉴遂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礼记·内则篇》：“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表大觶‘木燧’。”“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左佩纷帨刀砺，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线纆、施鞶表大觶‘木燧’。”《淮南子·天文训》：“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淮南子·览冥训》：“夫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又云：“夫燧之取火于日，磁石之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综合以上所引的记载并解释，我们可以知道“夫燧”

是中国古代人取火的器具，最初是用木遂取火于木，后来入了铜器时代，便用铜锡各半制成的金属器亦名曰“遂”。同时又有名为“鉴”的一物，与之相伴，而被发明，与使用“遂”用以取火于日，“鉴”用以取水于月，此时一般人遂称取火于日的遂为“阳遂”，而称取水于月的“鉴”为“阴遂”。“阴遂”即是“鉴”，即是“方诸”。木遂的发明远在上古，后世传说有燧人氏者，钻火教人火食，这年代远不可考了。木遂必系摩擦木类以取火的器具，金遂的发明当在铜器时代。周秦之际，已入了铜器时代，金遂必是此时发生的。金遂想系借太阳光线反射的作用以取火的器具，比木遂一定便利的多。可是金遂只能在晴天时用，阴天则仍须用木遂。但自我们推想起来，在石器时代已经应该知道以燧石与金类相击得火的方法。何以到了周秦时代还只用那木遂、金遂的笨法子呢？我想这或者是专供祭祀时取明火、明水的法则，是习俗相沿颇不易改，是汉民族富于保守性的征象，断乎不会有并用燧石取火的方法而亦不知的事。

《论语》宰我说的“钻燧改火”，系指木遂而言。改火是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仲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一周，便是阅岁一周，这可见古代有以“钻燧改火”为历岁一周的记号的习惯了。

中国古代以“黄”色为重，其始祖为“黄帝”，亦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反映。《易》曰：“天玄而地黄。”《说文》：“黄，地之色也，从田，炗声。”中国宅域土壤为黄色，故黄亦训“光”，地之光即地之色；农业之民，土地为重，故崇地之黄色为正色。其首长亦取地的光色尚黄，其民即尊之为黄帝。

“主”字为“炗”字的古文，从火，象形从王，火盛貌，后世借为君主之主，别作炗字以代之。由唯物史观以察之，君主之义，亦

与用火有关。火为人类生活史上第一个大发明，故那时的人们对于精于用火者，即奉为君主。故有祝融氏、燧人氏之称，神农亦称炎帝，一号烈山。

人类当迁徙到海滨河岸的地方，依贝鱼以为食物。在那里生活的时间很久，遗留下所食的鱼、的贝壳堆积地上占很广的面积，这种堆积在每个大陆沿着河滨海岸都可以寻得。考古学者，称这种堆积为“贝陵”(Shell-heaps)，又称“贝冢”(Kitchen-Middens)。古代滨海的人民多喜用贝作货币的材料，地中海沿岸诸民族皆有用贝的遗迹，就是现今印度洋南太平洋诸岛人还多用贝。北美土人有一种“贝珠壳带”(Wampum belts)最初用作货币，后来有时以为历史的记录。这种带是用丝或皮带将白色的和紫色的贝壳串缀成的，有时白地紫画，有时紫地白画，Wampum即“白”意，普通白色的居多，而紫色的则甚难得。这种图案有时亦甚易解释，象那表明 Iroquois League〔易洛魁部族联盟〕<sup>①</sup>的带，就是以中心的腹部为统治民族，而以每个四方代表联合诸民族，用绳联成一气。最有趣而且精妙的贝壳珠带，是那在一六八二年 Lenni-Lenape〔连尼洛那破〕<sup>②</sup>的酋长订立“大约章”(Great Treaty)时纪那创立彭塞尔凡尼亚州的 William Penn〔威廉·宾〕<sup>③</sup>的友谊的，做的极其精致。带的中央是 Penn和首领酋长握手协商的形象。此物至今保存于 Philadelphia〔费城〕<sup>④</sup>的

---

① 易洛魁部族联盟：北美印第安人，现残居美国纽约州。

② 连尼洛那破：北美印第安人一个部族的自称，即德瓦拉尔人，住在德瓦拉尔河上游。

③ 威廉·宾(William Penn, 1644—1718)：英国政治家，一六八一年，经英皇卡尔二世授权，领有北美的大部分土地，建立殖民地，后得名“Pennsylvania”，今美国东部的一个州。

④ 费城(Philadelphia)：美国宾西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一个城市。

历史学会。

中国古代用贝为货币的遗迹，尤其彰著。《说文》：“贝，海介虫也。居陆名蚘，在水名蜃，象形。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现于经济上的用语，几全由贝字孳乳而成。足证在中国石器时代以贝壳为主要的货币（考古学者说，在那些贝陵里，除贝壳外，还有些木炭的屑片，并些石作的、骨作的器皿，可见那时已经用火，已经是石器时代了）。

许氏《说文》贝部所解的字如下：

贲 贿 财 货 资 赈 贤 贺 贡 贙 贙 齎 贷  
贡 赂 贖 赠 赐 贙 赏 赢 赖 负 贮 貳 賓  
賒 贙 贙 质 贸 賒 费 贙 賈 販 買 贵 贱  
賦 贪 贬 贫 赁 賒 购 贙

徐氏新添的字如下：

媿 賄 賚 賺 貼 賄 賄 賄

此外还有数字如 贼 寶 賣 積 贙 贙 實 亦都是经济上的用语。这些字不必都起于一时，是渐次孳乳的。

古代中国以贝为货币，还有更明显的例证。《说文》：“员，物数也，从贝口声。”《说文》：“口，回也，象回币之形。”金坛段氏释员字云：“从贝，古以贝为货物之重者也。”足证古代以贝为计算货物的标准。员，即是以贝计物的单位，与现今以圆计算货物的价值相类。《说文》：“毋，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贯象宝货之形。”是口已象两贝相并之形。《说文》：“贯，钱贝之贯也。”乃后来发生的字。《易》有云：“或锡之十朋之龟。”《诗·小雅》：“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汉书·食货志》说：大贝、壮贝、么贝、小贝，都以二枚为一朋，郑康成诗笺又说，五贝为朋，但都可以证明“朋”是二贝以上的一位。

殷的时代还在石器时代，故由殷墟发掘出来的殷代遗物中可得鉴定。而为货币的只发见些以石或骨仿造贝形的东西。依中国古代经济上的用语多从贝的事实，可断定贝在中国古代曾经通用为货币。依此更可以推断这些以石或骨仿造贝形的东西，确乎亦是当时流行的货币。

殷墟古器物中，不但绝无金属铸造货币，即金属器物，亦可以说未曾发见。再查发掘物中的龟版文字，迄今所能辨读者多为贝字，或从贝的字，至于金字或从金的字则未有一，由此可以断定殷代尚为贝币通用时代，尚为石器时代。

有人说，据一部分的发掘物，解释当时的社会状态的全体，这种方法不无危险，但在今日舍此更无确实的证据。而且是等发掘物实从曾为殷朝的都城的地方发掘出来的，据以推测当时的社会状态的一般，亦没有很大的危险。再从较为可靠的一部分的《尚书》和《诗经》中亦可寻出些旁证，证明殷周二代的不同。《尚书》中的《商书》五篇，虽有贝字及从贝的字，而金字及从金的字一个亦没有。有金字从金的字，自《尚书》中的《周书》及《诗经》开始。《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不说金玉，而说贝玉。《诗·大雅·棫朴篇》：“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却说金玉，不说贝玉了。又考《商书》中全不见金属器物的名称。至于《诗经》则金属器物的名称数见不鲜，例如《关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臣工》：“庠乃钱镈，奄观铎艾。”足证周代已有金属制的乐器、农器，已入铜器时代了。

《说文》云：“古者货币而宝龟”。《礼记》说“诸侯以龟为宝”，《史记·平准书》说“人用莫如龟”，《汉书·食货志》亦说“货谓布、帛及金、刀、龟、贝”，更以《易经》“锡之十朋之龟”来相参证，足见古代中国有以龟为货币的事实。杜氏《通典》，说神农时代

已用龟为货币,《汉书·食货志》亦说“秦并天下,凡龟贝皆不为币”,可知龟贝用作货币,自石器时代已然。直到秦并天下早已入了铜器时代的时候,才不用作货币了。

近年以来,出土的龟版日多,此项发掘物皆镌有象形文字,大都出于河南。河南为殷代故墟,故可认为殷代遗物。中外人士藏拓而研究之者,亦日益众。观此则龟版为用,在当时或不仅为币,以之为种种记录亦未可知。

由渔猎时代到畜牧时代,兽皮亦是一种重要财货。贵族间的馈赠礼聘都用兽皮,婚礼亦用犍皮纳征。

由“家”、“半”二字,可以推断古代中国的家庭农业经济团体的意味很重。盖豕所以产肥料且以供食品,牛则事运转,都是农业上必须的家畜。

牛在原始社会亦为重要的财产。英文称资本为 Capital, Capital 本训为头,故称首都亦云。经济学者有认此为古代用牛为货币——至少为重要的财产——的证据者。《说文》:“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又“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依我解释,这二字都可证明牛在中国古代社会为重要财产,因为牛在农业经济社会是主要的家畜,故中分物件为半从牛,物亦从牛。

羊在中国古代社会为最美的食品,故养字从羊。因此一切吉祥美善的名辞,都从羊,如“美”、“善”、“羨”、“祥”等字都是。

汉武帝铸币,镌马形于其上,希腊古币,镌牝牛形,足见于原始社会有以家畜为货币的。地中海沿岸的人民使用的银币,有作鱼形的,印度洋沿岸的人民使用的铜币,有作海藻形的,足证该地古代有用鱼用海藻作货币的遗迹。

入了铜器时代,有用兵器或农器作货币的事,印度洋沿岸的

人民所用铜币亦有作刀形者，中国古代称钱为刀，齐铸法货犹作刀形，因在当时社会部落的战争很烈，兵器为人人所必须的物品，故能作交易的媒介。

农业盛行的时代，有以农器为货币者。中国的钱字初见于《诗经·臣工》“庠乃钱镈”，《毛传》云：“钱铍也。”铍字，《尔雅·释器》作耒，郭注云：古锹字，《方言》云：“耒，谓今锹也。”足证钱为一种农器，在农业社会，农器为人人必需的物件，故亦能用为货币。

到了纺织技术发达的时代，有以布或帛作货币的。中国古代钱谓之布货，幣的“幣”字即是帛。

中国古代的文字书于竹帛；竹书在先，帛书稍后。竹书经后人所发掘者，西晋时有汲冢竹书，南齐、北宋均曾有掘地得竹简、木简的事实，最近清光绪末年英、法人在甘肃燉煌附近发见石室藏有古代简牍很多，考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考》，释帛简都在新莽（纪元二十三年）以前，纸简都在两晋（纪元四百一十九年）以后，又《汉书·艺文志》各书目，以篇计的十有七八，以卷计的十有三二，而以卷计的，又概为汉代中叶以后的著作。又考《史记》、《汉书》，可知那时公私文牍率用竹简或木简，足证纸未发明以前先用竹木，次用帛。

从文字上考察，“简”、“策”、“篇”皆从竹，系竹书时代所造的字。策与册同，册系象形字，册在兀上为典，亦系象形。“方”、“版”、“牍”皆系木书，初竹木并用，故曰“载在方策”。后竹帛并用，故曰“垂诸竹帛”。用木时有尺牍一语，用帛时便改称尺素。素即是缣，素竹木书以“篇”计，帛书始以“卷”计。

《史》称：“后汉蔡伦造纸，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和帝元兴元年，奏上之，自是莫不从用焉，天下咸称蔡侯纸。”后



汉和帝元兴元年，为西历纪元一百零五年，然《前汉书·外戚传》有所谓赫蹏书者，应劭以为薄小纸，或者蔡伦以前已有纸的发明，因蔡伦所发明的更为精良便利，故能通用于社会了。

帛书虽较竹书后起，而帛价贵，不如竹木易得。故必有竹帛并用的一时期。当时写字的人，或系一种专门的职业，在竹木上用刀刻或漆书，在帛上用笔墨书，这种专门业者必刀笔并用，故古有“刀笔吏”。到了纸发明以后，书法才渐渐普及了。

纸是中国人的发明已经成了史学上的铁案了。今且假定纸的发明者为蔡伦，那么自纪元一百零五年中国已有了纸的发明了。但纸是何时输入到欧洲去的？这一段史的事实，却很有关系。我在英人 Cyril Davenport〔赛瑞·达文波〕<sup>①</sup>著的 *The Book,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书史》〕里找出一段纪载很可以供史学家考证的资料。现在把他的大要，引译于此：

“在第八世纪的中叶——纪元七百五十一年在中国与波斯交界的地方起了部族的纷争。这些纷争的部族中有乞援于中国者，然中国的援兵竟败于 Samarkand（土尔其斯坦的首都）。亚拉伯人的首长把中国的俘虏带回到那城中，这些人里有熟于中国人的造纸术的，亚拉伯人和波斯人就从这中国俘虏学得造纸术，后又由亚拉伯人传入了欧洲。”

西文 Paper 一语本来并不是纸，此语实源于 Papyrus。Papyrus 是生在尼罗 (Nile) 河岸的一种很好看的芦苇的内皮，或用护膜或用尼罗河泥粘结起来，用软笔书字于其上，但质很脆弱，很易破碎，把许多 Papyrus 联结起来，很长，故须卷成卷轴方易藏置，西书亦以“卷”(Volume) 计，即源于此。“Volume”是从“Vol-

<sup>①</sup> 赛瑞·达文波(1848—1941)：大英博物馆书籍装帧负责人，著有名作《书史》。

vere”一语转化而来，即“卷起”(to roll up)之意。又 Bible 一语，本从希腊语 *βυβλος* 而来，即芦苇的内皮之意。

造纸术由亚拉伯人输入于欧人，大约在十字军兴的时顷。中世末期欧洲得了两种新发明，一是造纸术，一是印刷术，遂以召起文艺复兴的大运动。

古代有一期为母系时代，昔人亦有言及者。亢仓子曰：“凡蓬氏之有天下也，天下之人，惟知有母，不知有父。”故姓从女生。《舜典》云，别生分，类生姓也。《传》曰，姓者生也。释文女生曰姓。姓谓子也。《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古代的姓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姑、妫、姑、妘、姻、始、姪、嫪、姚等皆是。昔人的解释都说是“居于姚墟者赐姓姚，居于嬴滨者赐姓嬴，居于姜水者赐姓姜，居于妫水者赐姓妫”。这是因为后世有因居赐姓的事而生的推测，绝非当时的事实。我以为地实因人而得名，不是人因地而得姓。倘是人因地而得姓，何以地名水名都从女旁？既是地名水名都从女旁，必系那个地方因居于其地的人的姓而得名无疑。例如姚墟，必系因有姓姚的人居住才名为姚墟，不是那居于姚墟的人因为所居的地方名为姚墟，才姓姚的。嬴滨、姬水、姜水、妫水亦然。由此可以证明那时的社会实为母系制，故生子从母姓，故为姓的字都从女边。种种地名，亦系因有某姓的母系氏族居住该地而命名。

中国的姓颇与图腾(totem)近似。J. G. Frazer(詹姆士·弗莱采)<sup>①</sup>氏解释图腾的起原，取感生说(Conceptional Theory)，中国的感生传说颇为不少，兹举数例于下：

<sup>①</sup> 詹姆士·弗莱采(1854—1941)，英国民族学家、宗教史家，著有《金枝》十二卷。

《帝王世纪》：“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感，生少昊，是为玄囿。”

《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母曰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

《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峤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帝王世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

《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郑玄月令注》：“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

《帝王世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苕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以上都是感生的传说，远古且无论，即以三代的祖姓而言，相传禹姓姒，祖载夙昌意，以蕙苴生。殷姓子，祖以玄鸟子生。周姓姬，祖以履大人迹生。这固然亦是荒渺的传说，但在原人社会对于生育的理实，不能了解，而在女子妊娠的时期，精神上尤易发生异状。或偶遇一种事实或梦见怪异景象而生感动，因疑诞生的事，与此偶遇的事实或梦见的景象有特别关系，这是感生观念的由来。

图腾制，同图腾者不相结婚。中国古时亦有同姓不婚的习惯，亦足以证姓与图腾有相类似。

图腾 (totem) 一语，原系由美利坚印度人 Ojibway [奥几波

威)族<sup>①</sup>的 *todem* 一语转化而成。或曰 *totam*, 或曰 *todayn*, 或曰 *adodam*, 都是此语。其语源为 *ote*, 即家族或部族之义。

女权的衰落, 大约起于畜牧时代。而男性的优越, 实大成于农业经济时代。因为畜牧时代男子出外游牧, 寻得水草丰沃的地方, 便携女子以同往, 定居于其处, 而女子遂以渐次远离于母系团体了。到了农业经济时代, 男子便专从事于农作, 在经济上占优越的地位, 女子遂退处于家庭以内, 作些洒扫的琐事, 现在从文字上亦可以看出是等痕迹。“男”, 《说文》: “男, 丈夫也, 从田力。言男子力于田也。”“妇”, 《说文》: “妇, 服也, 从女, 持帚洒扫也。”男女的分工, 并男女地位的优劣, 于此均可概见。

乾父坤母男尊女卑的观念与伦教, 均成立于此时。“女”象人跪形, 音与如同。“如”, 《说文》: “如, 从随也。”《白虎通》: “女者, 如也。”又曰: “妇者, 服也。服于家事也。”《大戴礼·本命篇》: “女子者, 言如男子之教, 而长其义理者也, 故谓之妇人。妇人者, 伏于人也。”晏从女, 从日, 段玉裁曰: “女系日下, 阴统于阳也。妇从夫则安。”这都是男子在经济上占了优越地位以后发生的文义与解释。

女权消失以后, 便发生了掠夺与买卖两种婚姻。看那奴字从女, 便知有女子被掠夺而为奴隶的事。婚字从女, 从昏, 便知掠夺女子必在昏时。娶字从女, 从取; 嫁字, 从女, 从家, 便知嫁娶是女子为人所取携离家适人的事, 都可以认出掠夺婚姻的痕迹。

古代婚礼有纳采、纳币、纳鴈等事, 皆含有身价的意味。纳鴈的风俗, 或云古宾主相见, 皆有贄。鴈是大夫所执的贄, 婚礼

<sup>①</sup> 美利坚印度人 Ojibway 族; 奥儿波威族是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 分布在北美拉吉夫连河上游。印度人, 今译印第安人。

有撮盛之例，故士婚礼用鴈，实系越一等用大夫所执的贄。或云用鴈，系取不再偶之义。以我观之，前说颇近理，是古代买卖婚姻的遗迹。

《孔子家语》曰：“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农业起，婚礼杀于此。”《毛诗正义》曰：“东门之杨，传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则秋冬嫁娶正时矣。”古代交易都在物资丰富的期间行之，买卖婚姻的时期，亦因经济上的理由而有定限。印度、希腊、日耳曼、斯拉夫族的买卖婚姻多由晚秋至冬季间行之。中国古代的婚姻时期，亦似在秋冬之交。《周礼》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殆因农业经济社会交易物品，必在秋收冬藏之际，婚姻既含有买卖的性质，故亦在同时举行。且妇女在农家亦有其必要的工作。农忙既毕，女家始肯令之适人，而在农隙举行，可以不至妨及农事。

以上所征，虽零散无纪，要足以证从文字语言上，亦可以考察古代社会生活的遗迹，并可以考察当代社会生活的背景，实在当代社会的经济情状了。

1920年《北大讲义》

##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今天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兄弟得乘这个机会来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大概讲讲，实在非常荣幸。

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我固然不能说了解他，我并且不敢说对于他有什么研究，不过乘这机会同各位谈谈。

大家现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是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现在已经有个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这会，想必可以引起大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兴味。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深奥。根据我所知的，提出他学说中的两大原理：

第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

第二，现代经济组织之趋势。

在从前，大多数的人根据统计学立论，提出生产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既然如此，那么，说到分配，一定也是三方面。于是资本家利用这样好听的理论，实质上从劳动者的手中劫去所得。我们且看，地主得着“利润”，劳工得着“工银”，外面看起

来，好像很公平似的。其实，“资本家得了劳动结果，劳动者仅仅得了他们劳动结果的一部分！”好，从马克思起，揭破了“此中秘密”，他详详细细地讲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

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劳动的分量”。譬如两件东西，说他们俩的原素相等，意思就是说他们俩的劳动分量相等。例如八时间的工作，便等于八时间的劳动分量。“劳动量与劳动力不同”。例如多少煤的生产等于多少劳动量，而在生产此煤时所需之力，则为劳动力。又如工作十点，须有能够工作十点之力，而此十点工作则为劳动分量。

物品的价值是什么？物品的价值，就是劳动分量。被资本家劫去的便是这个。例如工人工作一天十点钟，十点钟的工作等于十点钟的劳动分量，资本家仅仅从这劳动分量中拿出一部分给工人，维持他们的劳动力，其余都归自己所得。我且再拿机器作个比方，可以使我们更明白一点。比方：我们去问一个工程师，一副机器得多少钱维持他的生命，倘若说要十吨煤维持他的生命，这个意思就是要拿十吨煤去维持他的劳力，除掉拿这十吨煤——煤之价值由于劳动分量——去维持他的劳力外，他所生产的都被资本家得着。这正如劳动者作十点钟的工，除拿五点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命外，其余五点的工作，都被资本家劫去一样。这被劫去的五点工作，便是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要想劫夺的东西！以上所讲，即为“马克思剩余价值说”。

在这资本家靠着资本主义的组织情形之下，劳动者仅仅得着一部分，而资本家则劫去剩余价值，这层已经说过。现在且讲剩余价值之来源。

马克思把资本分成两种：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变资本，

只能保存其原价；可变资本，除此之外，还可另生价值。Adam Smith〔亚当·斯密〕<sup>①</sup>称不变资本为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为流动资本。马克思同 Adam Smith〔亚当·斯密〕的分类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不同者，马克思所说的不变，不是资本的形状不变，乃是他的价值不变，Adam Smith〔亚当·斯密〕所说的不变，乃是形状不变，如机器。至其所谓流动资本者，包含着两部分。他把他包含进去的这一部分，就是形体虽变，而仅能保持其原有价值者。马克思把这部分归并在不变资本内，此为马克思与 Adam Smith〔亚当·斯密〕分类不同之点。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不变资本，在生产程序中，或者不如可变资本之重要。可变资本，除维持劳力外，更能发生新的价值。新的价值之发生，完全靠着可变资本。拿什么去维持劳力？资本家这样：从劳动分量内拿出一部分给工人，去维持他们的劳力。于是劳动的结果，全被资本家劫夺。资本家又利用这生产须靠资本的理论，可变不变的混状，拿他们的障眼法，暗中把劳动所得的结果完全掠夺。我们知道，资本家总是说，生产须靠他们的资本。但是资本又是什么？资本，她是劳动的结果！因为社会上有了私产制度，于是他们也永有资本。他们有了资本，于是也有机会去劫夺劳动的结果。资本这个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如何重要，最可靠的只是劳动者的劳力，因为他能产生新的价值。

有许多人讲，劳工既然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的。不错，可以这样说。但是要晓得，资本是劳动的结果，资本神圣是因劳动神圣而来。所以这神圣，应该属于劳动者，而不应该属于资本家。——说到这里，资本家的秘密，我们又可从马克思的学说中

---

<sup>①</sup>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著有《原富》。



把他揭破。

我们不妨再说一说资本家取利的方法。资本家取利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劳动的时间，一是减少劳动的工银。增加劳动的时间，便是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例如劳动者一天作八点钟的工，只要三点的工作即足维持他的生命，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为五点。倘若要作十二点，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为九点。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利润就越大。所以资本家极力的增加劳动时间。一方面，资本家想极力的增加时间，可是一方面，劳动者想极力的减少时间。在英国，劳动者有九时运动；在世界，劳动者有八时运动。八时运动现在多已成功，近来又有六时的运动。六时运动为资本家产业家所倡出，因为他们觉得六时工作于他们更有利。在现在机器时代，机器工作，可以日夜不息；人去工作，总有疲倦的时候；拿精神疲倦的人去作工，结果生产减少，生产减少，这是于资本家大不利的。所以资本家把昼夜分为四段，教劳动者换班工作，每人只作六点钟的工，自然精神很好；精神好，自然生产多；生产多，自然于资本家有利；于资本家有利的事，他们自然愿意作了。

资本家利在增加劳动时间，劳动者利在减少劳动时间，这层已经说过。但是资本家还有一个法子，是于他们有利的。什么法子？减少工银，减少劳动者生活费。他们利用妇女儿童，雇他们来作工，给他们很低廉的工银。有许多国家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定了一种工厂法，限制工作。但是资本家依然雇用妇女儿童，骗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从此，更可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揭破了资本主义下之秘密。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一方面资本家骗取剩余劳动；一方面却又有一种新趋势。什么新趋势？“资本集中”。资本集中于少数

人的手中，于是资本家获利更厚，而小产业因此凋敝倒闭者亦复不少。从前在小产业中可以作事的人，既然受了大资本家的压迫，渐渐不能自存，于是小资本家亦不得不去劳动，而变为“无产阶级者”。大都市发生的大产业一天多一天，失业的“无产阶级者”也一天多一天，于是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者”齐集资本家之下，而形成社会上的两大阶级：

“有产阶级  
无产阶级”。

我们知道，从前的劳动者很少集合的机会。自经资本集中，大产业发生之后，于是劳动者得着集合的机会。他们集合的地点，便是资本家的大工厂，他们有了“阶级自觉”，大家联合起来，和资本家作战，和资本家竞争。——这样发达的资本家，他们自己却产生了可以致其死命的敌人——无产阶级——这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

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生命；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局面。在这卵壳尚未打破的时期，是一种进化现状。到鸡子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到了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可。打破卵壳，是革命的现象，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革命的现象。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意革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革命乃是我们更大的途程”。鸡子在卵壳里，长了眼睛，长了头，长了毛，既然非打破这壳不可，那么，“社会主义”到了他羽毛丰满的时候，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

不可。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从马克思学说理论方面讲，虽然有人说，资本、土地、劳力为生产的三要素，但马克思则以为一切生产都从劳力，都是劳动结果。资本、土地都是从劳力生的，都是劳动结果。如水，如煤，他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水一定要从海里搬到这地，才有价值；煤一定要从矿里搬到这地，才有价值。怎么去搬？靠劳力。所以一切价值都靠劳力，变地变形而生产之。在从前，虽然一切生产都靠劳力，但分配起来，纯由资本家作主——我们简直可以说，“从前没有分配”。

再从事实方面讲，在资本主义下，才发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生，便要去推翻资本主义。这可以说，“资本家自己产生了致其死命的东西”。

与资本家相对的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当然是处于不平的地位。到现在他们有了觉悟，有了“阶级自觉”，去集合全世界的劳动阶级，成一“全世界劳动阶级的经济组织”。

有人说，中国劳动阶级没有经济的组织，不能同世界的劳动阶级联合。但我想这不尽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受了外国资本家的影响，华工又散在全世界，不能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重要。——不过有一点可惜，就是我们东方劳动者，没有“阶级自觉”，常常拿很低廉的工银替人作工，因为这个原故，各国劳动者很不高兴，美国已经排斥黄色人种，法国也把华工渐渐地送回。在俄国的华工，现在倒还没有遣送回国。我们想想，世界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都有一种对垒了的趋势。一些小产业受资本家压迫而变成无产的，他们都有集合的地点，他们却找得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但是中国的劳动者，情形就不相同，他们

既没有集合的地点，更找不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国内的小工业，因受外国资本家经济势力的压迫，渐就凋敝，无以为生。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以至于流离失所，散而之四方，不晓得什么地方可去工作，可去集合。国内是这种情形，有这么多的无产阶级，我们再从全世界着想，还能说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吗？倘若还说与社会无关，恐怕不甚合理吧！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呵！你们联合起来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说过，现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他们都有了觉悟，有了“国际组织”。他们为什么要有国际的组织？因为资本家想压制劳工，极力的增加时间，减少工银，劳工反对这种办法，遂以“同盟罢工”为武器起而与之抗；倘若他们没有“国际组织”，资本家便可利用这点去雇用别国的工人，这样，“同盟罢工”就会失败。譬如日本工人罢工，华工就可过去破坏，这便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国际组织”。

“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不是没有。有“第一国际大会”，“第二国际大会”，“第三国际大会”。“第一国际大会”，到普法战后消灭了。“第二国际大会”，很有马克思的精神，但是欧战一起，里头的会员大多数弃其主义而从事于战事，名虽存而实亡。“第三国际大会”，曾在莫斯科开会，很能承继“第一国际大会”，而有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的精神，比较的还算进步一点。

近几年来，劳动界的势力渐渐地大起来。英国共产党已经受了“第三国际大会”的命令，而加入国内的劳动党。世界的劳动者，现在差不多渐渐地都联合起来。他们的势力一天巩固一天，革命的时期也一天逼近一天。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中国，有现在的这种情形，也不能不说这是受马克思

的影响。

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第一集，在他生时刊行。二、三、四集，是恩格斯替他刊行。我们要去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仅仅地读过一遍就不容易。有一个德国人讲，“一个人，倘若他不到五十岁，要说他能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这一定是骗子。”而以我要说我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有了什么研究，当然不能。不过稍微知道一点，乘这第一次讲演的机会，来与诸君谈谈。希望诸君听过这次讲演马克思学说大体之后，能够引起点兴趣，去研究他的学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这是我最盼望的。

1922年2月21日、22日、23日《晨报》

署名李大钊讲，黄绍谷记。

## 今 与 古(其二)

宇宙的命运,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

有一派人,对于现在的一切现象都不满足,觉得现今的境象,都是黑暗、堕落、恶浊、卑污;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风俗、诗歌、文学等等,全是今不如古。他们往往发伤时的慨叹,动怀古的幽情,说些“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话,遐想无怀、葛天、黄、农、虞、夏的黄金时代的景象,把终生的情感心神,都用在过去的怀思。这一派人可以叫作怀古派。

又有一派人,对于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以为过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现在,古人的劳绩,都遗赠于后人。无限的古代,都以现今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今为胚胎。人类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加,一切今的,都胜于古的,优于古的,即如诗歌艺术,今人所作,亦并不劣于古人,所谓无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这一派人可以叫作崇今派。

崇今派与怀古派间，往往发生激烈的论战。欧洲当十七世纪顷，关于今古优劣的比较，亦曾引起文学上的战争，此争绵亘约百年间，在法如是，在英亦如是。

今古的激战，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众热烈的兴趣。长于此等论战的人，又将其范围推广至于智识。许多人以今古的争论，为文学史上的枝节问题。首先以此等论争，为有更广的关系而唤起人们的注意者，厥为孔德（August Comte）。

今古的争论，在思想上实有相当的意义，这是对于文艺复兴的衡轭一部分的反抗。崇今派立于攻击者的地位，想令批评主义由死人的权威解放出来。他们争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今的人犹能与显烈的古人抗衡否，抑或在智力上实劣于古人？这还包含着更大的问题，就是：自然已否竭尽其力？他是否久已不能再生脑力与元气等于他曾经产生的人们了？人性是否已经疲竭，抑或他的势力是否永存而不尽？

崇今派的战士，主张自然的势力，永远存在，直接反对人类退落说，此说所以不能见信于人。崇今派的贡献独多，智识上的进步说获有一个最初的明确论证，实为今古的争论所唤起的结果。

今古的激战，虽自十七世纪初叶开幕，而在十六世纪末叶，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战士，首先跃起作崇今派的先驱。其人为谁？即鲍丹（Jean Bodin）是。

鲍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Theory of Golden Age）。主张黄金时代说者，大抵以为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化美俗良，德福并茂，真是人间的天国；后来日渐堕落，由

金时代，降而为银时代，而铜，而铁；这就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此说盛行于欧土中世神学者流，鲍丹独起而否认之。鲍丹认自然永是均一，拟想自然能在一时代产出黄金时代说所指的那个人那个境遇，在别一时代便不能产生他们，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鲍丹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由人的意思造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教界，时时刻刻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cil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了！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他们昧然指为金为银的时代的人，全去禽兽未远，由那个状态慢慢的演进，才有今日的人类生活、社会秩序。古人的发明，固然值得我们的赞誉，但今人亦有今人的新发明，其功绩与古人的一样伟大而重要。有了航海南针的发明，才能成就周航地球，世界通商的事业，由是而世界一家了。他如地理学天文学上的进步、火药的发明、毛织业并其他实业的发展，都在在与全世界以极大的影响，即单就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而论，已足以抗颜古人而无愧。

继鲍丹而起者则有倍根(Francis Bacon)，倍根对于古人表相当的尊敬，并且熟于古人的著作，但他认古人的权威，于科学进步上，是一致命的障碍。故亦努力于解除古人权威的衡轭。他以为真理不是于任何时的好机会中可以寻得的，真理的达到，



全视经验与他们的经验所受限制之如何，在他们的时代，时间与世界的知识均极有限而贫乏，他们没有千年的历史足当那个名称，不过是些传说与口碑罢了。除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境界与国家，他们全不熟悉。在所有他们的系统与科学的想象中，难有一个单纯的经验，有助益人类的倾向的。他们的理论，是立在意见上的，从而科学在最近两千年间静止的停留，而立在于自然与经验上的机械的艺术，则渐长而增高。

倍根指出Antiquity<sup>①</sup>一语迷误的义解，他说我们称为古代而那样常与以崇敬者，乃为世界的少年时期，真值得称为古代的是世界的老年与增加的年代，就是我们现在生于其中的年代。论世界的年龄，我们实是古人，那些希腊人罗马人比我们年少得多；如同我们看重一个老年人，因为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比一个青年人的大。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盼望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得到比由古代所得者更多的东西，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知识的储藏为无量数的考察与经验所增积，时间是伟大的发明者，真理是时间的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

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三大发明，是古人所不知道的。这些发明，变更了全世界的情形，先文学，次战争，最后航海，引起了无数的变迁，影响及于人事，没有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再大的。或者航海及未知地的发见，与倍根以感印者，比与鲍丹者多。

倍根认地球通路的开辟，与知识的增长，为同时代的产物。此等事业，在今世，大部分业已成就，较近的学术，并不劣于从前两个学术上的时代——希腊人的时代、罗马人的时代。希腊、罗马及现在，是历史上三大时代，希腊、罗马为世界上文教法度最昌明的国家，但在那些时代，自然哲学亦未有何进步。在希腊是

---

<sup>①</sup> Antiquity: 古代。

道德的政治的空想吸收了人们的精神；在罗马是沈思与努力都耗用在道德的哲学上，最大的智力，都贡献于市民的事务。在第三期，西欧民族的精力，又都为神学的研究占去了。古初实在有些最有用的发明，到了冥想与理论的科学的开始，这等有用的事业就停止了。在过去的人类史上，许多事物的进步，是迟缓的，不定的，偶然的；人如能觉察过去的发明的错误而求所以免除之，现在很有确固的进步的希望。

培根认循环说为知识发展上最大的障碍，每致人们失所信赖与希望。进步之不确定与不继续，全因偏见与错误妨人致力于正轨。进步的艰难，不是起于人力所不逮的事物，而基于人类的误解。此误解耗费时间于不当的目的。妨阻过去的过失，即是创辟将来的希望。

但他的新时代将来的进展是否无限，他于此未加研考。

今古论战的舞台虽在法兰西，而此问题实为一个义大利<sup>①</sup>人所提起。此人为谁？就是那首著名的描绘当时叙事诗人讽刺诗（*La Secchia rapita*）的作者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他喜于暴露他的时代的偏见，而倡言新学说，他因为攻击 Petrarch〔彼特拉契〕<sup>②</sup>，Homer〔荷马〕<sup>③</sup>，Aristotle〔亚里士多德〕诸人，在义大利招了很大的诽谤。最早的古今人功绩的比较，发见于“Miscellaneous Thoughts”〔《杂感》〕，这是他在—六二〇年刊行的。他说此问题是当时流行的争论事件。他对此争论，于理论的空想的实用的各方面，立一透彻的比较，与以公平的裁断。

---

① 义大利；今译意大利。

② 彼特拉契（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著名诗人。

③ 荷马：古希腊诗人，相传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他根据口头流传的短歌编成的。

有一派人，主张艺术依经验与长久的功夫能致完善，所以现代必有此利益。塔桑尼对于此说，首先加以批评，他说此理由不甚坚固，因为同一的艺术与学问，不永是不间断的为最高智慧所追求，而有时传入劣者手中，所以渐趋退落，甚且至于消灭。例如罗马帝国衰亡时的义大利，当时有很多世纪，觉艺术降在平凡以下了。换句话说，只有假定没有连续的断裂，此说当可承认。

他作出一种比较，以明他不是任何一方的拥护者；他许古人以星星点点的优越，同时今人在全体上远胜于古人；他所考察的范围，比那些自限于文学艺术的争论者广，文化的物质方面，甚至于服装，均在他所考察的范围内。

他所著的“Thoughts”〔《杂感》〕一书，被译成法文，此书恐已为白衣士罗伯(Boisrobert)所及知。白氏是一位剧学家，以曾参与创立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为人所知。忆一六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此学院既成，他即刻当着那些集众讲出一段议论，猛烈的恶口的攻击Homer〔荷马〕，这一段议论，在法兰西煽起了争论，并且引起特别的注意。Homer〔荷马〕自经塔桑尼攻击以后，成了崇今派集矢的特别鹄的。他们以为，假如他们不信任Homer〔荷马〕的主张能够贯彻，他们便可以得到胜利。

当文艺复兴的时期，希腊人罗马人的权威，在思想界极其优越。为便于促进自由的发展，此权威非大加削弱不可。倍根及其他诸人，已经开始了此种伟大的运动，以期廓清摧陷此等虐力。但是笛卡儿(Descartes)的影响愈益严重，愈益坚决，他的态度，愈趋于不易调和的程度，他没有一点象倍根的对于古典文学的尊敬，他颇以忘却幼年时曾经学过的希腊文自夸，他的著作的感化力，乃在对于过去严格的完全的打断，并一个完全不借重于古人的组织观念的系统。他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发明的基础上，

期望将来智识上的进展。从而他认知这个智力的进展，将有很远的效果及于人类的境遇。他最初名他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以“一个可以提高人性到完全最高度的普遍科学的设计”。他视道德的物质的改进为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倚赖。

根据世界现今是较为高龄较为成熟的见地，是认对古人独立的态度，已经成了很流行的观念。倍根、笛卡儿并许多受笛派影响的人们都是这样。

巴士库儿(Pascal)是一位科学家而改信笛派的理想者，表示的尤其明显。他说：当那么多的世纪间，人类的全联接，应看作一个单独的人而不断的生存，不断的学问；在他的生活的每一阶段，此普遍的人，为他在从前的阶段曾经获得的智识所惠利，而他现在是在老年时期了。

对于责笛氏以对古代思想家不敬的人们，他曾为答辩；说他拒否他们的权威，便是还他们以模仿的敬礼，便是按照他们的精神，做比那些一味奴隶的随从他们的人们好得多。巴氏又说：待遇我们的古人，比他们所示以待其先辈者益加隆敬，待遇他们，以一种他们值得受自我们的不可信的隆敬上；因他们未曾对那些在他们上享有同样利益的人们，与以那样的看待；天下宁有比此还不公平的事么？

巴氏亦承认我们应该感念古人，因为我们在知识的增长上能优于他们。他们已达于一定的点，使我们能以最少的努力跻于最高的程位。所以我们自知我们立在较高的平面上，少艰难亦少荣誉。

最优越的崇今派，便是那些同化于笛派理想的人们。白衣士罗伯的议论出世后好些年，圣骚林(Desmaretsde Saint Sorlin)又起来作崇今派的战士。那时他已成了一个梦想派的基督教

徒；这也是他痛恨古人的一个理由。他和白衣士罗伯同是劣下的诗人；他说基督教的历史，贡给些文辞，比那些曾为 Homer〔荷马〕及 Sophocles〔沙福克里士〕<sup>①</sup>（希腊悲剧诗人）所论的，很可以感动一个诗人。他有几首诗，是战胜 Homer〔荷马〕的示威运动。约在同时，在英兰亦有一首叙事诗响应圣骚林的争论。

圣骚林已略知此问题含有更广的范围。他说：古代不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有学问，那样的富裕，那样的堂皇，如同现代一样；现代实是成熟的老年，正如他是世界的秋，得有所有过去世纪的果实与战利品，并有力以判断先辈的发明经验与错误而利用之，古代的世界，是个只有少许的花的春。固然，“自然”在一切时代都产生完全的事业，但他（自然）关于人的创造，却不是这样，这必须要改正，那些生于最近时的人们，在幸福与知识上，必超过以前的人。他的话里，含有两个要点。一为自然力永在的断言，一为现代比古代有益，正如老年之于幼稚一样的观念；这是倍根诸人所曾经论过的。

圣骚林拥护今人的挑战引起了白衣卢（Boileau）拥护古人的迎敌。圣骚林濒死之前，很郑重的以为今人战的责任托之于一位青年；此位青年名叫帕劳耳（Charles Perrault）即此可以看出今古的争论如何激烈了。

路易十四王朝时的法兰西，一般的气压，很于崇今派有利。人们觉着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与罗马帝国最初的皇帝奥加士大（Augustus）的时代比美的，没有什么人发出“我生不辰”的叹声。他们的文学的艺术家，若 Corneille〔高乃依〕<sup>②</sup>、若 Racine

① 沙福克里士（公元前 495—405），希腊悲剧诗人。

②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始人，著有悲剧《勒·熙德》、《贺拉斯》等名作。

〔拉辛〕<sup>①</sup>、若Molière〔莫里哀〕<sup>②</sup>合于他们的嗜性，那样的强烈，所以除了第一位，他们不愿给他们以别的等位，他们不耐听那希腊人罗马人进到不能达到的优越的断言。Molière〔莫里哀〕说：“古人毕竟是古人，我们是现今的人。”这可以表示当时一般的感情了。

一六八七年帕劳耳以《路易大王的时代》的名称，印行他的诗歌。现代的启蒙，优于古代，是他的论旨。

帕氏对于古人取比圣骚林更为有礼的态度，而其批评论尤巧。他说：希腊罗马的天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很好，或者可以使我们祖先崇为神圣，但在现今，柏拉图宁觉可厌了；而那不能模仿的Homer〔荷马〕，设若生于路易大王的朝代，当能作更好的叙事诗。在帕氏诗中，有确认自然的永远势力在每一时代产生同等才能的人的语句。

《路易大王的时代》，是一个简短的信仰宣言。帕氏接续着又发表一篇彻底的著作，就是《古人与今人的比较》，是在一六八八——一六九六年间以四部分出现的，艺术、雄辩、诗歌、科学及他们的实际的应用，都详加讨论了。他以二人对话的形式，发表这个讨论，这对话的人们，一为热心拥护现代的战斗，他作崇今的论战；一为拥护古代的献身者，他是一个明知难以否认他的反对者的议论，犹且顽强的固执他自己的见解。

帕氏认智识与时间经验以俱展，完全不是必须伴随古代的；最近的来者，承袭了他们先辈的基业，而加上他们自己的新

---

① 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法国名悲剧作家，著有《安德洛马克》、《费德尔》等作品。

②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创始者，著有《可笑的女才子》、《伪君子》、《吝啬鬼》等。

获得。

这后人较善、来者胜今的前提，似与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不相容：在智识上、艺术上，我们优于黑暗时代的人们，这固当承认，但你能说第十世纪的人们，是优于希腊人与罗马人们么？塔桑尼已经涉及此问题，帕氏答此问题曰：“一定不能”，因为联续中常有断裂的原故；科学与艺术，同于河流，他的进路的一部潜流于地下，忽而开发奔流，向前跳跃，其丰沃与在地下跳跃一样。譬如长期的战争，可以迫制人民们蔑视学问，把所有他们的元气都掷于自保的益觉迫切的必要，一个无知的时期，可以延续，但随着平和与福祚，知识与发明，将重行开始为进一步的发展。

他不主张今人在才能上或脑力上有何优越，在《路易大王的时代》中，他确认自然不朽的原则；自然犹且产生象他曾生过的人们一样伟大的人，但他不能产生更伟大的人，非洲沙漠的狮子，他的凶猛，在我们今日并与在亚历山大大王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时代，最善的人，在气力上是平等的，但他们的功业与作品，是不平等的，若与以同等的势便的情形，最近的是最好的，因为科学与艺术，都靠知识的积聚；知识必然的与时俱增。

但此论能用之于诗歌与文学的艺术么？诗歌与文学的艺术界，是交战者（帕氏亦包在内）最有兴味的范域。此可证明现代能产生些诗家文学家，其优越不亚于古昔先师，但此能证他们的事业一定超于古人么？此驳论逼得帕氏不得脱逃，而帕氏答复，则颇巧妙：娱人心情是诗歌与雄辩的职分，而欲有以娱之，必先有以知之，是否洞察人心的奥秘，比洞察自然的奥秘较为容易么？或者洞察人心的奥秘，费时较少么？关于人心的情感与念望，常作出些新发见，只以 Corneille〔高乃依〕的悲剧而论，你在那里可以寻得比古代书籍的更微妙更细致的关于野心仇怨与嫉

妒的映绘。在他的《比较论》的结尾，他宣言今人的普通的优越的时候，他为维持平和起见，论到诗歌与雄辩，暂作一个保留。

帕氏的讨论，陷于缺乏体现完全的进步的观念，他不只专注意知识上的进步，但他不注意将来，对于将来，没有什么兴味，他受最近的过去知识上的发展感印甚深，故他几不能悬想再有更益向前的进步。他说：“试读英法的报章而一察那些王国的学院的出版，将使你信最近二十年或三十年内，在自然科学界作出的发明，比遍有学问的古代的全期都多，我自己想很幸的知道我们所享的幸福，考查所有过去的时代，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切事物的生长与进步，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种事物没有受过一个新的增加与光荣的，我们的时代，在些种类上，曾达到完全的绝顶，从有些年间以后，进步率很迟，想到差不多没有很多的事物可以使我们妒羨将来的时代是很可喜的。”

对于将来的冷淡，即是关于将来的怀疑，是上述语句的注释，而与世界已达于他的衰老时期的观念相合，故吾言帕氏的智识进步的观念，尚不完全。

于法兰西以外，英国亦忽然起了今古的论战。

一个神学家名叫黑克威尔 (George Hakewill) 刊行了一本六百页的书，以诘责当时普通的错误——宇宙衰朽的错误。他并他那呼吸在十六世纪气压下的书，全为人所忘却，他虽刊行了三版，而除些神学家外，难能引起多人的注意。著者的目的，在证明在世界的政府里，上帝的权威与天命。这与当时流行的见解不相容，当时流行的见解，就是物质的宇宙、天体、原子，均渐趋于衰朽，并那人于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各方面，正在退落的见解。他的议论多获益于读鲍丹、倍根诸人的书，可见他们的思想，已经激动神学家的精神了。



一个今古间的比较起于衰朽说的拒驳，与自然力确固的问题，起于今古间的比较，一样是自然的结果。黑氏反对过分的推崇古代，正为此说可以助世界衰朽说张目。他所讨论的范围，比法国争论者的较广，他所争论的范围，不止含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并及物质与道德。他求所以证明精神上物质上没有衰朽，并那现代基督教国的道德，大优于异教时代的那些国家，基于基督教有社会的进步，在艺术上知识上亦有发展。

黑氏亦如塔桑尼研考一切艺术与科学，断定今人在诗歌上与古人相等，其他诸事，亦都能超越古人。

他认退落说可以腐瘠人的元气，世界普遍衰朽论，销沈了人的希望，钝滞了人的努力的锐利。他的言外的意思，是改良世界的努力，为我们对于后人所该尽的义务。

他说：“于是我们不要为世界定命的衰朽的虚影所阻拦，以使我们既不后顾那些可敬的先辈的楷模，又不向前预为后人谋。如我们先辈有价值的预为我们谋者，使我们的子若孙，亦以预为之谋者颂祝吾辈。如何的世代将以延续于我们，尚未确定，亦如未来的世代之在前世之于那些先辈一样。”

黑氏想他生在世界的末年，但他不能延长多久，是一未决的问题，但他有一个考虑可以慰安他自己并读者，就是世界的终结，尚未临近。

自然不衰朽，人类不退落，固可确认了，但那世界的终结，不依自然法，并那人类文化的发长，任在何顷，均可为神的命令所斩断的学说，其足以销沈人的希望，钝滞人的努力的锐利的影响，亦并不小。

黑氏持论的意义，在把阻碍进步学说的退落说，弄成一个特别研究的问题。他的书揭明此说与关于今古争论间的密切关

系，不能说他与鲍丹、培根诸子关于文明进步的理论有所增益。他所企图的历史的普通综合法，全与他们的相等。他说明知识艺术的历史与此外一切事务，如同纵览一种循环的进步；他说他们都有一个发生、滋长、繁荣、废落与萎谢，于是经过一个时期后，又有一个复苏与再兴，以此进步的方法，学问的光明，由一民族传到别一民族，由东洋而希腊，由希腊而罗马，既已为蛮人所不见者千有余岁，而又为 Petrarck〔彼特拉契〕及其当代人所复活。黑氏所陈循环进步的观念，颇与培根所指摘的循环说相近。

培根及十七世纪的思想家，自限其过去进步的观察于知的范围内，而黑氏对于古代的仪容道德，不惮与以攻击，能预见这社会的进步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要来到十八世纪阵头的。这是黑说值得我们注意之点。

黑氏的书出世以后，我们又得到格兰威尔 (Glanvill) 所著的《加的过度》(Plus ultra)，又称《亚里士多德时代后知识的发展》；此书于一六六八年出版，宗旨在拥护成立未久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该会在当时颇受攻击，谓为有害于宗教及真实学问的兴趣。格氏愤古典派对于皇家学会的压迫，乃起而树拥护的旗帜；他说他对于无名的罗盘针的发明者的感佩，比对于一千个亚历山大与恺撒、一万个亚里士多德的感佩还深且多。在这几句话里，可以看见他的精神了。

他说皇家学会的职分，就是企图人类的设计，置在自然的最深底蕴那样低，达到宇宙最上层那样高，扩张到广大世界的一切变化，目的在普遍人类的惠利。那样一种事业，只能以不能知觉的度数，慢慢的进行。这是一个累代的人均与有关的事业，我们自己的时代，只能希望作一点点，以移去些无用的片屑，预备些材料，安排些东西，以备建筑。我们定须寻求与蒐集，观察与考

验，为将来的时代预储一个积聚。

神学的考虑，曾经重压过黑氏的思想，而格氏则显然未为所困惑。看了二人的不同，便可以看出这四十年间世界进行的经路了。

斯普拉特 (Sprat) 是一个牧师，他于格氏的书出世以前不久，出版一本《皇家学会史》。他认科学可以扩张于世界，此事全靠西方文化扩张其地域，基督教国的文化亦可扩到其他文化国及半开化国，他希望将来的改宗者，可以有青出于蓝的优越，希腊人胜过他们东方的先师，现代欧人从罗马人承受了光明，而幸福繁昌，倍于古人所遗留于他们的。

皇家学会建立于一六六〇年，科学院建立于一六六六年，使物质的科学，在伦敦与巴黎很流行。各阶级，都为此流行的情感所激起，若骑士，若圆颅党，若牧师，若清教徒，都联合起来，若神学家，若法律家，若政治家，若贵族，若世爵，都夸扬倍根哲学的胜利，倍根播的种子，终究成熟了。那些建立与赞美皇家学会的人们，对倍根有完全的信用。考雷 (Cowley) 上皇家学会的赞歌，可以名为赞扬倍根的赞歌，亦可以说是人类的精神，由权威的束制解放的圣歌。

我们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我们不要学着唱那怀古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歌，应该朗诵着耶马孙的名言：“你若爱千古，你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

1923年2月《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

##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 人生态度的影响

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第一，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纪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史学的影响于人生态度，其力有若此者。因此有一班学者，遂谓史学的研究日趋严重，是人类的精神渐即老成的征兆。在智力的少年时期，世界于他们是新奇的，是足以炫夺心目的，使他们不易起热烈的研究世界的过去的兴味。生活于他们是一个冒险，世界于他们是一个探险的所在，他们不很注意人间曾经作

过的事物，却注意到那些将来人类所可作的事物。为的是奋兴他们，历史似应作成传奇小说的样子，以燃烧他们的想像；无须作成哲学的样子，以启悟他们的明慧。这样的奋往向前欢迎将来的少年精神，诚足以令人活跃，令人飞腾，然若只管活跃，只管飞腾，而不留心所据的场所是否实地；则其将来的企图，都为空笔，都为梦想。本求迈远腾高，结局反因蹶于空虚的境界，而不能于实地进行一步。而在有训练与觉醒的老成的精神则不然，他们很知道世界给与吾人以机会的俄顷，必有些限制潜伏于此机会之下以与之俱。这些限制，吾人必须了喻，有时且必须屈服。所以他们很热心的去研究过去，解喻人生，以期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去照彻人生经过的道路，以同情于人类所曾作过的事而致合理的生活于可能的境界。史学的研究，即所以扩大他们对于过去的同情，促进他们的合理的生活的。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进，一样可以寻出一种新世界，供他们冒险的试验。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

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从前史学未发达的时代，人们只是在过去的纪录里去找历史，以为历史只是过去的事迹。现代的史学告诉我们以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这些过去的纪录。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本着这种史观所编的历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伯、世爵这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民对于所遭的丧乱，所受的艰难，是暴虐，是篡窃，是焚杀，是淫掠，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臣罪当诛，天王明圣”，无论其所受的痛苦，惨酷到如何地步，亦只能感恩，只能颂德，只能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

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本身。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捨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出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自然，随着史学研究的利益，亦有些弊害影响到我们心性上的。例如治史学的人，临事遇事，常好迟疑审顾，且往往为琐屑末节所拘，不能达观其大者远者，这不能不说是随着史学研究发生的弊害。但若稍窥哲学的门径，此等弊害，均能以哲学的通识达观药之，稍一注意，即能避免。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

摘自1924年5月著《史学要论》

# 社会主义释疑

(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讲)

今天是苏维埃俄罗斯革命成功的六周年纪念，又是本校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的成立日，所以我在此要与诸位作几句谈话。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不明白，有许多怀疑地方。这种怀疑，实在是社会主义进行上之极大障碍。现在所要说的，就是要解释这几种怀疑。

一、社会上有些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因此他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不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上到了大多数是穷的，而那少数的富人也就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

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二、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人民就要发生总工



的现象，因此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施行。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象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从前乌托邦派托莫斯·莫阿，他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劳动是最苦而可怕的，所以主张强迫工作。因他目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是那样黑暗，所以发生这种观念。一般人以为工作是苦事，亦是拿现在生活下的眼光，去观察那将来的社会，其实社会主义实行后的社会的劳动，已和现在的社会的劳动不同了。

如莫理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美感的社会主义。他常说：工作能使精神感觉愉快，这就是“工作的喜悦”。即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比如烹调，自己弄的东西，总比别人弄的好吃，倍觉津津有味。这都是因为自己经过一番工作，含有一分愉快之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永享不到工作的愉快的。

莫理斯最赞美的，是欧洲十四世纪的艺术品，而最鄙视的是现代的艺术品。因为十四世纪的艺术品，都是那时代能感觉着“工作的喜悦”的工匠作出来的。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

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

工作的喜悦的，那里有象现在劳动的劳苦，有怠工现象发生！

三、又有一般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的自由，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动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正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前边已经说明白了。

但是社会上的人有一种惰性，这也是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人不可不先注意的。

1923年9月7日下午于上大

1923年11月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研究历史的任务

我们研究史学，第一先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史？

在中国能找出许多关于史的材料来，什么《史记》咧、《汉书》咧、《三国志》、《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西洋也可以找出什么《罗马史》咧、《希腊史》咧……等等的书。这类的书，就是史吗？

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这不是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

吾人研究有生命的历史，有时须靠记录中的材料。但要知道这些陈编故纸以外，有有生命的历史；比如研究列宁，列宁是个活人，是有生命的。研究他，必须参考关于列宁的书籍。但不能说关于列宁的书籍，便是列宁。

明白了这点，那历史和历史材料的异点，便可以知其大概了。

我们再讲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英文的史字 (History) 是问而知道的意思；德文的史字 (Geschichte) 是事体的意思。发生事件而记录起来，这是史学的起源。

从前历史的内容，主要部分是政治、外交，而活动的事迹完全拿贵族当中心。所以福理曼 (Freeman) 说：过去的政治，就是

历史，历史就是政治。他把政治和历史认成一个，不会分离。

这样解释历史，未免失之狭隘。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他说历史就是政治，其余如经济、宗教、伦理、美术的种种生活，能说不算是人类的生活吗？可以把它们放在历史以外吗？

及后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

他把人类生活，作成整个的解释，这生活的整个便是文化。

生物学当然是研究生物的，植物学当然是研究植物的，人类历史也当然是研究人类的生活，生活的全体——文化的了。但文化是整个的，不可分离。譬如这座楼，可以分出楼顶楼身和基础来。假使基础摇动，楼身楼顶全得摇动。基础变更，楼身楼顶也得跟着变更。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他说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

他不但发明文化是整个的，他并且把历史和社会的疆域分开。他说：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他又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

至于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希腊的历史学家后世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陀德(Herodotus)已经告诉过我们，

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

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

据此，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故书篓中，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但同是一个事实，人人的解释各异。比如实存的孔子过去了，而历史的孔子，甲与乙的解释不同；乙与丙的解释又不同；昔人与今人的解释又不同。人人解释既然不同，他整理以后，找出来自以为真确的事实，当然又不同了。

须知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是活动的、进步的，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并且还要吾人去改作重作。信手在我们中国历史里边找出几个例来看：

一、在中国历史神话期中，说我们的衣服器具有许多是半神的圣人，给我们在一个相距不远的时代一齐造出来的。这样记录，我和在座诸君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或者都以为是真实的。现在我们若拿新的历史眼光来看，知道那些记录完全是荒谬的。现在借着科学的知识，发明一种新机器，也得费若干年月；在那蒙昧时代，怎能这样迅速！

据人类学家，考察人类的起源，是因人从前有四条腿，和别的动物一样。女性的人，怕他的孩子被他兽残杀，乃习用其前足抱子而奔。人是这样渐渐的进化，才成了用手用胸用两足走路的动物。人类渐渐的站起来用足走路以后，腹部因蔽体的毛稀薄，感畏风寒，乃渐取树叶遮盖；后来旁的地方怕受风寒，也会想法去遮盖了。这就是衣服的起源，由树叶到衣服的进步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月！

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渐进于游牧的生活，由游牧的生活而进于畜牧生活，而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的生活，机器工业的生

活，这里边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不会一时得到的。我们现在根据进化论去解释这些记录，比在数十年前的观念已大不同了。

二、中国古代的姓，如妘、姁、姬、姜等字，都从女旁，这些字何以都从女？前人的解释，多谓人因地而得姓。例如某某的母居姜水，故姓姜；某某的母居于妘水，故姓妘。但由我来解释，不是这样。我以为妘水、姜水的地方，是因人而得名的。因为有姓姜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姜水；有姓妘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妘水。姜、妘的姓都从女旁，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母权时期，所以子从母姓。我们再就社会的现状观察，姓张的村子，叫张家村，姓李的庄子，叫李家庄；都因所在的姓氏而得名，决不是因为住在张家村才姓张，住在李家庄才姓李的。那些妘水、姁水、姬水、姜水的名称，也因为古代的人，好临水而居，那水也就各因其姓氏而得名了。

我们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

三、就近二十年来，河南所发现的古物，更可以断定旧日史书的虚伪。中国经济学上的名词多从贝，如货字、買字、贾字等都从贝。按历史学家考察，最古的时期中经过一种靠贝为生活的时期。中国旧史的记录的：中国在太昊、神农时，已有金属铸造货币。但现在按河南发现的龟板文字，一为考察，那些上面所刻的字，并无从金边的字，而只有从贝的字。果然当时已是用金器时代，何以不能发现一个金字？

中国古书固然伪的很多，然在较为可靠的《书经》的《商书》篇，亦是说：“具乃贝玉”，当时贝玉并称，而不说具乃金玉。果然当时已有金属制品，何以在殷代以前，不发现一个“金”字？

到了后来《诗经》上才发现许多“金”字，往往“金”“玉”并称，

便有“金玉其相”一类的话了。

就此可断定，旧史所纪是虚伪的。在殷代以前，还是靠贝的生活，还是石器时代；殷代以后到了周朝，才入了铜器时代，才有金属的制品了。

这样的例，举不胜举，我们按这许多例，可以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是可以改作重作的，是必须改作重作的。但是我们所改作的重作的，就敢断定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吗？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了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

希腊历史学家格罗忒（Grote）出，又有人说，他的希腊史比希罗陀德的好，第一因为希氏缺乏批评精神；第二因为希氏喜欢什么，便注意什么真实。但我们要说公平，他所注意的未必是对，在希罗陀德时代，能够得到那样结果，已经很难的了。我们不能因见了格罗忒，便来菲薄希罗陀德。格罗忒的《希腊史》，果然就是最完全的吗？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真实的罢了。

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

从前的孔子观念，是从前人的孔子观，不是我们的孔子观。他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亦是他们自己的释迦观，耶稣观，不是我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他们本着迷信为孔子、释迦、耶稣作传，辉

皇孔子、释迦、耶稣为亘古仅有天纵的圣人，天生的儿子，说出许多怪诞不经的话。我们今日要为他们作传，必把这些神话，一概删除。特别注重考察他们当时社会的背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若何关系等问题。历史原是有生命的，不是僵死的；原是进步的，不是固定的。我们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的改作重作，的确是我们应取的途径了。

以上的话，归结起来：记录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

- 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
- 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1923年11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重 版 后 记

一九五九年，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编选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传播马克思主义著称，并且勇敢地领导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伟大斗争。他在长时期的革命活动中，留下了不朽的论述和诗篇。把这些著作从文学的角度编一个选集，对于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诞生，对于了解中国革命或向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学习，都是有意义的。

关于李大钊同志早年的写作情况，《言治》杂志的主编郁嶷先生在《送李守常留学日本序》中有一段记载：

余与君虽聚从六载，而相与为文字交，则自今春始。盖往者日敞心力于校课，无暇及是；属毕业伊尔，同人组织北洋法政学会成，金议创《言治月刊》，抒发蕴蓄，且征进德。君翩然起众人中，偕余朝暮经画。首期出版，海内日报杂志，转录迨遍，尤以君文为最。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作，而君则振翰莘莘，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贻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

这是李大钊同志在读书时代开始发表写作时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说他的文章当时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造意树义，首先以民生为念，“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引起了国内的广泛注意。

郁嶷先生又说李大钊同志那时的文章，是“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汨汨”，“箴贬贶蒙，鼓舞群伦”。这虽然讲的是李大钊同志早年写作的情况，但我们看到，在他以后的诗文里，也一直有着“箴贬贶蒙，鼓舞群伦”的特点。而且，由于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解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所以他的文章也一直表现了“感慨悲歌”的文风。

十月革命以后，他找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正确道路。他在大学的讲台上宣传唯物史观，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許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历史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文章。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也解放了文体，用白话写作，并且写了新鲜活泼的白话诗和很多富于战斗性的杂感。从建党直到牺牲，他的论著偏重于研究当时中国革命问题，阐释社会主义和党的政策，也有一些学术性的著作。无论是诗歌、散文、杂感或论文，都是他在革命活动中出于战斗的需要而写作的，因而成为革命历史的丰碑，这是他的著述和一般诗人、作家不尽相同的地方。

一九五九年，从报刊杂志搜集的李大钊同志的遗作，总计三百五十余篇，其中有的还只有题目而没有原文。这次修订选集时，我重新统计了一下，迄今所发现的他的遗作，共计四百三十余篇。这当然还是一个不完整的数字，还有待于今后继续搜集。

李大钊同志用过的笔名，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有：李钊、守常、李大钊、李守常、孤松、剑影、明明、冥冥、常、钊、T.C、S.C.生、L.S.C.生、L.C.C.生、猎夫、琴华等等。

李大钊同志留下来的手稿、墨迹极少，也没有留下一篇日记。书信（包括报刊上发表的和原信）已发现的一共也只有十几封。这些情况显然与其他诗人、作家或革命家也大不相同。这

是由于他本人的革命生涯和在他牺牲以后所遇到的动乱年代造成的。首先是北洋军阀反动政府逮捕他的时候，他被抄了家，他的藏书、手稿及衣物，劫掠一空。河北乐亭故乡曾存有一木柜他年轻时代的文稿及家书，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的搜查、封门的恐怖中也被烧掉了。抗战以前，星华在北京还保存了她父亲的一本旧体诗稿、一首长诗、一封从昌黎五峰山寄出的家书，以及一九三三年出殡时的一些照片、挽联，还有一本用麻纸订的亲友捐款登记簿（上面有鲁迅捐款五十元，与鲁迅日记一致）等等，她在临去延安时寄存在友人家里，解放后也都再也找不到了，只找回抗战以前我们自己买的一本故宫影印的《岳麓寺碑》和一本刘半农编的影印《初期白话诗稿》，其中收有李大钊同志的一首白话诗《山中即景》的墨迹。选集中的《山中即景》手迹，就是根据这本《初期白话诗稿》复制的。遗失了的那本诗稿，我记得是一般学生作文用的红格稿纸，这部诗稿以及出殡捐款登记簿、照片、挽联等等所遇到的命运，仍然是在北平沦陷期间被焚毁。

一九六五年发现了李大钊同志生前没有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原稿，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俄罗斯文学与革命》。这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他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原稿。它是从胡适的藏书里被发现的。在胡适的档案里，还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一个誊清稿，用的是印有“新青年原稿用纸”字样的十六开绿格竹纸，是用毛笔抄写的。看来是《新青年》编辑部的人抄的，准备发表这篇文章而结果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介绍俄国诗人们站在社会革命运动的斗争前列的光辉事迹，颂扬他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文末说：

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俄罗斯青年乎！其何以慰此血迹淋漓、颜色惨淡之诗神？其何以报彼为社会牺牲之诗人？

“今也赤旗飘扬”几个字，大概就会把胡适吓得面无人色，七窍出火，只能把它贬为“抽屉文学”了。这次修订选集时，收入了这篇不曾发表过的文章。最近还在白坚武的《惺菴日记》原稿中发现了大钊同志从未发表过的两首白话诗，一首是《山中即景》的第三首，一首是《悲犬》。这是意外的新发现，也收入了这个选集。至此，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大钊同志的诗一共有二十七首。

李大钊同志从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到最后为革命牺牲，在大约只有十七个年头的的时间里，写了那么多的诗文专著，他的勤奋努力，他热爱祖国和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而极力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竟要把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李大钊同志也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还定调子说，“李大钊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窃取了中央文革大权的那个“顾问”的唆使下，狂犬吠日，甚至要把他诬蔑为“叛徒”。说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冠以“激进的”三个字，很有一点欺骗作用；而加上这个形容词，他终于还是逃不了是一个“民主派”——“民主派”的别名就是“走资派”。“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甚至要把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第一个走上敌人的绞刑架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也要打成“民主派”和“叛徒”。然而，他们越是这般猖狂，越是用极“左”的手法策划反革命阴谋，恰恰

就更加暴露了他们是一伙人民的敌人。读者请看看一九七五年七月以“上海复旦大学”名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以下简称“党史”)这个绝好的反面教材,就可以了解“四人帮”为了大造反革命舆论,是如何地任意篡改历史了。在这本反革命“杰作”里,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春秋笔法及“换头术”之类,不一而足。它把“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卑劣手法和卑鄙面目暴露无遗。在这本“党史”里,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不见了,只字不提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抹杀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甚至连早已是历史常识的东西也一笔勾销了。在这个“党史”里,李大钊同志被极力加以歪曲。与此相反,叛徒江青却不仅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而且被大吹特吹为社会主义时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的“文艺革命旗手”。这部“党史”可算得是“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影射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卑鄙、最拙劣的杰作了。

比如,谁都知道李大钊同志在建党以前就以传播马克思主义著名,而且在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代表无产阶级一方。李大钊同志从昌黎五峰山寄出一封给胡适的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驳斥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谬论,旗帜鲜明地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可是“党史”中对这场论战是这样写的:

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一九一九年五月,胡适约请美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杜威来“讲学”。七月,他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这种宣传标志着旧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但是胡适却把他的黑货冒充“新文化”用来欺骗群众。

我在这里完整地、一字不差地抄了这段话，请读者看看。“党史”的伪造者指出，胡适是提倡杜威的改良主义的，说他发起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又说胡适发表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可是谁是胡适的挑战的回答者和驳斥者呢？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又是谁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呢？在这里，代表无产阶级一方的“李大钊”不见了，被一笔勾销，故意抹杀了。难道一场论战，只讲资产阶级一方，不提无产阶级一方，就能标志出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吗？在这种描绘中，一场重要的论战化为乌有，似乎它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四人帮”一刀砍掉了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一方；而且竟还把历史上有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旧的新文化运动”。这难道不比胡适用他的“黑货”欺骗群众更胜一筹，也更为拙劣吗？

又如，谁都知道李大钊同志忠诚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曾经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在形成北伐大革命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次国共合作中，他是我党的首席代表，有一张很流行的李大钊同志与孙中山先生步出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的照片，可以说明当时的历史实况。此后，他负责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方领导国共两党的工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这本“党史”中，连李大钊同志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字也被勾掉了。“四人帮”竟又一刀砍掉了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一方的首席代表。他们显然是有意要把李大钊同志从历史中抹掉。

仅仅举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四人帮”是怎样为篡党夺

权蓄意篡改和伪造历史了。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伪造历史，这样愚蠢地否定历史常识，就象他们曾经把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篡改为林彪和毛主席会师一样的荒唐可笑。但这种伪造历史的伎俩，并不能使“四人帮”得到好处，而只能使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无法掩饰地败露在人们面前。他们的骗术，也不可能不是短命的。

李大钊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驳斥“四人帮”的这种诬蔑的最好论证，就是李大钊同志本人的历史和他的遗著。这个诗文集也足以揭穿“四人帮”的谎言。这里特别选了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另一篇是这次修订中增选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此外，当然还有其它的有关重要文章，比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因为文章长，专门性大，这个集子里就不选了。前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后一篇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李大钊同志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演会的演讲记录。李大钊同志在这篇演讲中向青年们通俗易懂地说明马克思是怎样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而且他指出，中国的劳动者比各国无产阶级受资本家的压迫还要厉害。又说：“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意革命，但是我们也知道，革命乃是我们更大的前途。”“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李大钊同志是在代表哪个阶级说话，他为什么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难道这不是十分明白的事吗？

李大钊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研究，他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他的这种心境，他在这篇讲演中还说：

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



产生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的学说的，真正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时说，

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斯诺：《西行漫记》）

毛主席的亲切回忆，对“四人帮”诬蔑李大钊同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最有力的驳斥。一切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总是目空一切，硬把自己吹成是“天马行空”，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者”、“旗手”，张春桥及其同伙不是把他的谬论吹成是什么“张春桥思想”，而且是什么“第四个里程碑”吗？何等地荒唐！何等地无耻！

我在这里还要补叙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李大钊同志受陷害，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开始了。“四人帮”横行时期，在一次有那个“顾问”在座的中央文革的小范围的会上，有人提出是不是要砸李大钊的墓？那个“顾问”考虑一下，回答说：“不必去砸了，今后不要再提这个人就是了。”有人又问：“为什么不要再提他？”“顾问”先生宣布说：“因为他是叛徒。”原来如此。这位“权威”在另外一个场合还煞有介事地说过，他“手里有材料”呢。这次宣判，是参加过那个小会的一位记者同志亲眼目睹的。随后不久，住在西山万安公墓李大钊同志墓地附近的一位老太太，有一天忽然看到来了一帮暴徒，刹那间就把李大钊同志和他的夫人的墓地砸了，墓碑倒地，暴徒们呼啸而去。且不说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同志由于宣传过李大钊或与李大钊有亲属关系而受

到残酷迫害或株连，甚至当年李乐光同志搜集的李大钊的文章的全部抄稿及其它档案材料，至今还下落不明。这是被焚毁了呢？还是由于被盗？

时间还将继续考验一切。人民是最有权威的。群众才是真正的批评家和鉴定家。我相信，一切鬼魅魍魉终会在真理的阳光下自我崩溃。

李大钊同志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已经牺牲半个世纪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也就是在他被捕的第三天，北平《晨报》报导他在敌人法庭上的态度时说：

闻李大钊受审问时，直认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但否认最近对北方有何密谋。

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同一天《世界日报》也有报导证实李大钊的被捕，并说到他受审讯时的情况：

李着灰长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这些报导一致描述了李大钊同志一贯崇信真理的权威和他在反动派的迫害下无所畏惧的坚定态度。

他在狱中的自述中，历历叙述了他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立志从事革命的抱负。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的供词中没有半句损伤党的荣誉的言词；他谈的是国民党的工作，而并未谈共产党的工作。他人讲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国家，以

求民族的独立与自主，曾与孙中山先生交往，参与国民党活动，并且声明一切由他负责，希望不要株连其他爱国青年；对于有关党的秘密，隻字未提。他的身体，因备受酷刑而遭到严重摧残，但敌人的审讯丝毫也没有能够使他屈服。反动报纸说他“迷信共产，遭受极刑”，“识者无不为之惋惜”，而这恰恰说明了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贞不屈。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来营救他，他坚决拒绝。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耗费革命力量。现在，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再受损失。”<sup>①</sup>当时报纸上还报导，他“在狱中二十余日，绝口不谈家事”。

李大钊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丝毫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一心为革命，临危不惧的共产主义战士，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四人帮”及其爪牙，企图把他在狱中的供词找来做文章，想从里面找出“叛徒”的证据来，也只能是枉费心机而已。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反动政府与北伐中途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华公使团三方的阴谋勾结下，判处了李大钊同志“绞刑”。在血腥的“四·一二”事变之后只有一个星期，南北议和，一时甚嚣尘上，北洋军阀政府极端仇恨就在它身边燃烧的革命火种，于是由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在帝国主义间谍的配合下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并且与司法部门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对李大钊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所谓“军法会审”。审判是秘密进行的。上午十时

---

<sup>①</sup> 见《李大钊抗日史略》（1949年8月苏南新华书店《烈士传》）。

在京师警察所开庭审判，当天下午就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后院，用从西方进口的、中国从来也没有的绞架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和与他同时横罹惨祸的十九位青年战友。李大钊同志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他面对反动军警作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杀死了我，就杀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

和他同时牺牲的十九位烈士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他们是：谭祖尧、邓文辉、路友于、张挹兰（女）、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莫华、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

李大钊同志说过：“自由之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sup>①</sup>他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浇灌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自由之花，他献身于人民革命事业，流尽了自己的鲜血。

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的灵柩在宣武门外的浙寺里停放了六年，无法安葬。一九三三年，在党的安排下，经过北京大学朋友们的帮助，将他葬在西山万安公墓。出殡时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和公祭。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打散了游行队伍，捣毁了祭坛，许多革命青年遭到逮捕。

万安公墓当时也并不乐意接受象他这样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公墓的老板、资本家蒋某，起先以李大钊同志“死于非命”为由，拒绝卖给一块墓地；后来经过几次交涉，勉强同意了，但只能把他葬在公墓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理由仍然是“死于非命”，所以不能卖给“正穴”。

<sup>①</sup> 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0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在出殡时，党组织给李大钊同志送来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和碑文。当游行队伍被打散，和尚道士都跑了之后，一辆上面用旧棉袄和花圈覆盖着石碑的大车，加入到继续前进的灵柩和家属坐的马车的行列，到了万安公墓。因为在蒋介石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的石碑是不能在墓地公开竖立的，他的朋友们遂临时出主意将这块石碑作为墓志铭埋在他的墓中。这块当年被视为最危险的刻有镰刀斧头的石碑，至今还掩埋在野草丛生的墓地下面，是前去扫墓凭吊的人们所看不到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也曾受同人委托，起草了一篇碑文，碑文中说：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对死者寄予同情而对于反动军阀统治表示义愤的碑文，在风凄雨横的一九三三年也绝不能被允许公开发表。所以刘半农先生虽然起草了这篇碑文，也没有能够用。于是只刻了一块由刘半农先生书写的仅有死者的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墓碑，竖立在李大钊同志的墓前。

读者如果要了解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在理论上和革命活动上的全部贡献，除了这部诗文选集，还需要阅读他论述中国革命的一些方面（如农民问题、妇女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对俄国革命的介绍、评价孙中山等等）的重要文章。这个集子偏重于从文学的角度编选，同时注意满足一般读者了解他的要求。要从李大钊同志的遗作中比较全面地了解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

绩、他的革命精神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质，我想这样一个选本对读者是有益的。

目前我们的国家在党中央的战斗号召下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今年欣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又是李大钊同志九十诞辰，在这样的时刻，将《李大钊诗文选集》献给广大青年读者，这不仅是为了纪念革命先驱者，我们还希望它能够起到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以建设一个向着共产主义美好理想前进的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这次修订，增选、调整了一些篇目，加了一部分注释，凡外文人名均用方弧号注明译音，原文一律不加删改，并又根据能找到的原书刊重加校勘。因为初版并未广泛发行，很多人不知有过这本书，所以这对读者仍然是一本新书。这本书的编选和修订，是在星华的合作和帮助下进行的。她曾与李大钊同志同时被捕，我所了解的大钊同志的一些往事，大都是她讲的，或同她一块进行调查的。她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郁愤成疾，双目失明。去年十二月，她的病情恶化，竟没有等到这本书的问世，她就与世长辞了！这对我们自然是终生的遗憾。

北京市委党校的袁谦、杨芹、李美瑞等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霁云、李启伦同志，曾先后帮助我们校勘原文，谨致谢意。

这本书在编辑工作上的缺点和粗疏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贾 芝 1979年1月16日写

1980年1月2日校补